新 阶 级

密洛凡·德热拉斯著

（供內部参考）

世 界 知 識 出 版 社

194
统一书号：3003－667
定　价：0.78 元

新　　阶　　級

（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

密洛凡·德热拉斯著

陈　逸　譯

（供内部参考）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3年·北京

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New York, 1958

根据美国弗雷德里克·普雷格出版公司1958年第十次印刷本譯出。

·供內部参考·

新　阶　級

(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

〔南斯拉夫〕密洛凡·德热拉斯著

陈　逸　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0.78元

1963年2月第一版　1963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張$6\frac{3}{8}$·字数141,000

統一书号 3003·667

序

书中所叙述的一切本是可以用其他方式表达的；这一切可以写成一本当代革命史，一本专提意見的文献，或者一个革命家的自供。上述內容已經在本书中略为提到。不过，纵或这里的有关历史、意見和回忆的綜合并不完全，总能反映出我是如何努力以尽可能簡短的文字对当代共产主义作尽可能周全的描繪。有些特殊的或涉及技术方面的問題可能被忽略了，但我相信，这反使主要部分更簡单，更完全。

在本书中，我力求不涉及我个人的問題。但我的环境是凶險的，最好也不过是凶吉不可知，因此，我不得不在匆忙中草率地表达我个人的观察和經驗；我希望有一天能有机会对我个人的情况作更細密的檢查，这将可能补充，甚或改变我的一部分結論。

我不能描述我們当代世界这个慘痛历程中冲突的所有方面。我也不能假装知道共产主义世界以外的世界，那是我未曾生活过的世界，这可以說是我的幸运，也可以說是我的不幸。所以，当我說及我自己这个世界以外的世界时，我只是为了要把我自己的世界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加以比較，使它的眞相更清楚。

书中所写的一切几乎都在别些地方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过。不过，这里或許会有一种新味道，新色彩，新心境和一些新思想。事实上，仅仅这一些东西就足够珍貴了。每个人的經驗都是独特的，值得让其他的人知道。

讀者請不要想在本书中找到什么社会哲学或其他的哲学，即使是在我所作的概括性的陈述中也找不到。我的目的只是陈示共产主义世界的眞相，尽管我发現有时不得不加以概括，但是，我并无意通过概括性的理論化陈述去解釋共产主义世界。

在我看来，本书中的材料以置身局外的观察方式来提供，是最适当的方法。本来，我的前提和結論都可以由統計数字、权威言論和重要史实的引述来巩固和证明。不过，为了使本书簡明扼要，我宁願尽可能少用統計数字和引证，而通过演繹或归納的論证来表明我的观察結果。

我认为我的方法对于陈述我个人的經驗以及对于我的工作和思維的方法都是适当的。

我成年以后，走过了一个共产党人所能走的整个路程：从权力阶梯的最低級爬到最高級，从地方性組織走进全国性組織以至国际組織，从眞正共产党的形成和組織革命直到所謂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在这段时期中，沒有人會强迫我拥护共产主义，也沒有人强迫我反对共产主义。我是完全根据我个人的信念非常自由地决定一切的。尽管我是从迷梦中觉醒了，不过，我并不屬于那些突然觉醒的一群。我是从本书所陈述的逐步构成的事实眞相和結論中逐漸地、自觉地醒过来的。当我对于当代共产主义現实愈来愈疏远时，我就愈来愈接近民主社会主义的观念。尽管本书的首要目的不在追溯我个人思想的演变，不过这一演变也反映出来了。

我认为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观念来批評是多余的，因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間就存在了各式各样的平等和博爱的观念（而当代共产主义是标榜这些观念的），这些观念是爭取进步和自由的战士們一貫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批評这些基本的观念不仅是錯誤的，而且是无效和愚蠢的。追求平等和博爱的斗爭

本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

尽管对共产主义理論的詳細批評是需要的和有用的，但我并沒有把重点放在这上面。我把全部心神集中在对当代共产主义現实的描繪上，只有在必要时才涉及理論。

要在这部如此簡短的著作中把我个人全部的观察和体驗都写出来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把最緊要的部分写出来，在必要时还得用概括性的陈述来表达。

生活在共产主义世界以外的人可能觉得书中所述一切都很陌生；但在生活于共产主义世界中的人看来，那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我并不想在对共产主义世界現实及其观念的描述这件事上求得特殊的功劳和荣誉。书中所描繪的現象和观念，仅仅是我所生活的世界中的眞相和观念。我是那个世界的产儿。我曾对那个世界有所貢献。而現在我是那个世界的批評者之一。

这种不一致只限于表面。过去我曾为一个較好的世界而奋斗，而現在我仍在为一个較好的世界而奋斗。我的奋斗并不一定能产生它所希望的結果。然而，我个人行动的一致性却存在于这个长期不断奋斗的过程中。

目　录

第一章 起 源

一

虽然在西欧近代工业发展以前，現代共产主义还处于潜伏未动状态，但推溯其根源，却由来已久。共产主义的两个基本观念为“物质的第一性”和“变化的实在性”，这两个观念借自現代共产主义萌芽前不久的思想家們。但随着共产主义的日漸得势，这两种基本观念却反而愈来愈不占重要地位。这是可以了解的，因为共产主义已經得势，現在要想按照它自己的观念来改造世界，而且漸漸不想改变它自己了。

辯证法与唯物論，即世界的演变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是古典的馬克思共产主义的基础。然而这些基本观念，却并非創自共产主义理論家，如馬克思、恩格斯等。他們不过利用这些观念編織成为一个整体，于是无意中就成了新世界观的基础。

“物质的第一性”这一观念乃借自十八世紀的法国唯物論者。早期的思想家，包括古希腊的德模克利特在內，曾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这一观念。至于由矛盾对立面的斗爭而引起的“变化的实在性”这一观念，即所謂辯证观，則系由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而来，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曾以不同的方式表示过这种观念。

馬克思思想与在它以前的同类理論家之間的不同，我不想在此詳加論述。我在这里必須指出的是，在黑格尔提出“变化的实在性”时，他仍然保留一个不变的最高規律，即“絕对观念”。分析到最后，如黑格尔所示，在人类意志之外，仍有些不变的

規律在主宰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本身。

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尽管重視"变化的实在性"，但仍然认为客观或物质世界的規律是不变的，而且与人类无关。馬克思断定他能发見主宰生活和社会的基本規律，正如达尔文发見主宰生物的規律一样。无論如何，馬克思确曾闡明一些社会規律，尤其是关于这些規律如何在工业資本主义初期发生作用的問題。

这一事实纵然确实无誤，我們也不能只凭这一点就认为現代共产主义者所揚言的馬克思发見了所有的社会規律之說是正确的。并且，更不能像以法国的拉馬克和英国的达尔文的发現为根据来繁殖家畜那样，认为根据他們的意图来改造社会的办法是正确的。人类社会到底与动物或无生物不能相提并論。人类社会是由不断作有意識活动的个人与团体合成的，它是一直在生长与变化着的。

在当代共产主义的自吹自擂中是含有专制主义种子的；当代的共产主义者虽未把共产主义視为唯一而絕对的科学，但至少被认为是基于辯证唯物論的最高科学。这种自負的根源，我們可在馬克思的思想中找到，虽然馬克思自己并未料到。

誠然，当代的共产主义并不否定客观或不变的規律的存在。但一經得势，它对于人类社会及个人的行动，却完全不是这回事，它所用以建立权力的方法，与其理論所指示者不同。

共产主义者从只有他們知道主宰社会的規律的大前提开始，推得一个过于簡单而不科学的結論，即这一所謂的知識使他們有权力和专权来改变社会并管制其活动。这就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主要錯誤。

黑格尔曾說普魯士的君主专制是他的"絕对"观念的化身。同样，共产党人則以为他們代表了客观的社会要求。但共产党

人与黑格尔却另有不同之处，这也正是共产党人与君主专制的不同：专制君主自视之高并不及共产党人，其自视之絕对也不如共产党人。

二

黑格尔大概曾为从他的发見所可能得出的結論而感到不安。举例說，如果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那末他自己的思想以及他所要求保存的社会又将怎样呢？因为他是一个由皇室任命的教授，自然不敢公开主張应該根据他的哲学来改造社会了。

馬克思与黑格尔的情形不同。在年青的时候，他曾积极参加过 1848 年的革命。他从黑格尔的思想所引出的結論走向极端。整个欧洲为了到达新的、更高的阶段，不是在作流血的阶級斗爭嗎？根据馬克思的解釋，这不但表示黑格尔理論的正确，并且因为科学已迅速发見客观的規律，包括可实施于社会的規律在內，所以哲学的体系就失去其意义，无所用之了。

当时在科学上，哲学家康德的实证主义，曾作为研究方法而取得优势；英国的政治經济学派，如斯密、李嘉图等，也正大行其道；而在自然科学方面，划时代的規律日有发見；近代工业正依据科学技术开辟其出路。这时候，資本主义年青时期的伤痕，一方面显示其本身的苦难；另一方面也是无产阶級斗爭的开始。显然，这是科学統治的开始，甚至支配到社会，同时，这也是要求消灭資本主义所有权观念的开始，因为，它已被視为人类幸福与自由的最后阻碍。

得出一个偉大結論的时机已經成熟。馬克思的勇气和知識都足以表达出这个結論，但是他却沒有可以凭依的社会力量。

馬克思是一个科学家和思想家。就科学家而言，他确有重要的发見，尤其是对于社会学。就思想家而言，他使現代史上最初发生于欧洲、現在傳布于亚洲的最巨大和最重要的政治运动有了意識形态的基础。

但是，正由于馬克思是一个科学家、經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以他幷沒有想到建造一个包含一切的哲学或意識形态的体系。有一次，他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即我不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他的偉大的科学天才，使他比前輩的社会学家如英国的欧文和法国的傅立叶要优越得多。而且因他幷不主張有包罗万象的意識形态或自己的哲学体系，所以使他显得比他的后继者优越。这些后继人物大多都是理論家，科学家的成分极少，如普列汉諾夫、拉布留拉(Labriola)、列宁、考茨基和斯大林。他們主要的願望便是想根据馬克思的观念建立一种体系，尤其是那些缺乏哲学素养而更沒有哲学的天才的人更作如此想法。后来，这些馬克思的后继者便有以馬克思的学說作为固定而包含一切的世界观的趋势，幷自以为对馬克思的全部工作的继續应負厥責，而且认为馬克思的全部工作实际上已經是完整的了。科学逐漸让位于宣傳，結果則宣傳逐漸以科学的姿态出現。

在馬克思的时代，馬克思认为不需要有什么哲学。他的最亲密的朋友恩格斯曾說，由于科学的发展，哲学已經死亡。馬克思的論文幷不都是具有独創性。所謂科学的哲学已成了当时的一般風尙，在康德实证主义与費尔巴哈的唯物論出現以后，尤其如此。

所以对于馬克思之不需要有什么哲学幷且不认为有建立一种哲学的可能，我們是不难理解的。令人难以理解的倒是，为什么馬克思的后继者們却要把他的思想造成无所不包的体系，成为一种独特的新哲学。他們虽然不承认有任何哲学的需要，但

在实际上他們造出自己的教条，以此为“最科学的”或“唯一科学的”体系。在举世热心于科学、幷因科学而使日常生活和工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他們不得不是唯物論者，幷自以为是“唯一”科学观点和科学方法的“唯一”代表，在他們代表了一个社会阶层之后更是如此，但事实上这一社会阶层是与当代一切被接受的思想相冲突的。

馬克思的思想是受到当时的科学气氛、他个人对科学的傾向，以及他要使工人运动多少具有一个科学基础的革命願望的影响的。馬克思的門徒所受到的是另一种环境和另一种动机的影响，于是馬克思的意見便变成了教条。

倘若欧洲工人运动的政治需要不要求有完整的新的意識形态，那末，尽管馬克思在經济学和社会学两方面的研究都具有极高的科学和学术地位，自命为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辯证唯物論，就将被遺忘，就将被当作不是特别深刻而有創造性的学說而被舍棄。

馬克思哲学的力量，不在于他的科学要素，而在于它与群众运动的联系，尤其是它的着重于社会变化的客观性。馬克思学說一再地說，現存世界之所以会发生变化，只是因为它不得不变化，因为它本身含有与它自己相矛盾和使它本身毁灭的种子；而且工人阶級需要这种变化，也有力量影响其发生。由于这个哲学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扩大了，于是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就产生了一种錯觉，以为这个哲学是万能的，至少在方法上如此。在幷无同样情形存在的国家中，如英国和美国，其工人阶級和工人运动虽然頗有势力，但这一哲学的影响与重要性，是微不足道的。

作为一种科学来說，馬克思的哲学幷不重要，因为它主要是根据黑格尔的哲学和唯物思想。但作为新的、被压迫的阶級的思想，尤其是作为政治运动的思想而論，它有划时代的作用，最

初在欧洲，以后在俄国和亚洲，它提供了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制度的基础。

三

馬克思认为，通过两个基本阶級，即資产阶級和无产阶級的革命斗爭，无产阶級可以取資本主义社会而代之。他之所以认为有此可能，显然是因为在当时的資本主义制度之下，貧富的悬殊日甚，形成社会上相互对立的两极，而这个社会又常常发生周期性的經济危机。

分析到最后，可見馬克思学說的产生是由于工业革命，或工业无产阶級要求改善其生活的斗爭。伴同工业革命而来的群众的极端貧苦与凄慘对于馬克思的影响极大，这不是偶然的。他最重要的著作《資本論》就有关于这方面的許多重要而动人的記述。作为十九世紀資本主义特征的連續发生的經济危机，以及当时的貧困現象与人口的迅速增加，显然使馬克思相信只有革命是唯一的解决方法。不过他并不认为所有各国必将发生革命，尤其是在民主制度已成为社会生活的傳統的那些国家。他在一次談話中曾列举荷兰、英国和美国作为例证。但就整个馬克思的思想来說，却使人觉得他的基本信念乃是认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他相信革命，宣傳革命；他是一个革命家。

馬克思的革命思想本是有条件的，并不是适用于全世界的，但到了列宁手中，却被說成为絕对而普遍的原則。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可能是他最独断的著作)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些原則，而且与馬克思所认为的关于在有些国家可以避免革命的意見显然不同。列宁說，英国已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可以避免革命的国家，因为在第一次大战时，英国已成为一个

軍国主义的国家，因此英国的工人阶級除了革命以外，已无可选擇。列宁的錯誤，不但是在于他不知道"英国的軍国主义"只是一种暫时的、战时的发展現象，并且他更沒有預見到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經済的进步。他也不了解英国工会运动的性质。列宁过分重視他自己的或馬克思主义的、宿命論的科学思想，而对于比較高度工业化国家中工人阶級的潛能及其客观的社会作用却极少注意。列宁虽然表面上否认，但实际上他却自以为他的理論和俄国革命的經驗是可以普遍适用于全世界的。

根据馬克思的假定及其关于这一問題的結論，革命当首先发生于高度工业化的資本主义国家。馬克思认为，在革命成功后，即在社会主义的新社会，可以获得一种新的自由，这种自由的水平比既有的所謂自由資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更高。这是容易理解的。馬克思虽排除各种形式的資本主义，但是他却是自由資本主义时代的产儿。

馬克思认为，資本主义不但将为更高的經济和社会形式，即社会主义所代替，并且还要为人类自由的更高形式所取代。社会民主党人发展了这一論点，他們有理由自认为是馬克思的继承者。在这方面，他們与那些把馬克思的思想当作自己思想的源泉，即认为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取代資本主义的共产党人有同样的权利。但是这两派馬克思的信徒，即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在援引馬克思理論作为他們的思想基础时，却只有一部分是对的。因为他們引用馬克思的理論的目的，就是为了維护他們的实际行动，而这种行动却起源于已經改变了的不同的社会。并且，他們虽然都是依据馬克思的理論，但社会民主党的运动与共产党的运动却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但在政治与經济的进步难以展开以及工人阶級社会力量微

弱的国家中，就逐渐有从馬克思学說中推出一种体系和教条的需要。而且，在經济力量与社会关系还沒有够得上推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如在俄国以及后来在中国，对馬克思的革命理論的采用和加以教条化就更为迅速而完全。那里的工人运动，其重点尤在革命。在这些国家中，馬克思主义日趋强盛，到了革命的党派获得胜利以后，便成为压倒一切的理論。

在像德国这一类国家，那里政治經济的进步程度使革命成为不必要，則馬克思学說的民主与改良部分就比革命部分更占优势。工人运动也在反教条的意識形态与政治趋向的影响下着重于改良。

在前面一种情况下，工人运动与馬克思的关系加强了，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在后面一种情况下，工人运动与馬克思的关系則减弱了。

社会的变化与理論的发展使欧洲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激烈的派别对立。大体說来，政治和經济条件的变化是与社会主义理論家的观点的变化相一致的，因为他們各用其党派的見解来相对地解釋实际情况，也就是說，他們的見解常常是不完全而有偏見的。

例如俄国的列宁和德国的伯恩施坦就是两个极端，而社会和經济方面的各种不同的变化，以及工人运动的各种不同的"实在性"，都通过这两个极端反映了出来。

原来的馬克思主义差不多已不复存在。在西方，馬克思主义已告死亡，或正在死亡之中；在东方，則由于共产主义統治的建立，馬克思的辯证观与唯物論只剩了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渣滓，并且不过是用以巩固权力，維护暴虐并侵害人类的良知。尽管在东方各国中，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被舍棄，但它被当作严格的教条使用并且日益有力 在东方，它已不止是一种思想，而是

一个新的政府，新的經济制度和新的社会制度了。

尽管馬克思使其弟子們有这种发展的动力，但他原沒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发展，并且也并不希望有这样的发展。历史已經背棄这位大师，也背棄了其他那些企图解釋历史規律的人們。

然而自馬克思以来，社会发展的性质是怎样的呢？

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在工业革命已經开始的国家，如英国、德国和美国，公司組織及壟断企业已經开始成立。到了二十世紀初，这一发展臻于极盛。霍布孙（Hobson）、希法亭（Hilferding）等曾对这一发展作过科学的分析。列宁根据他們的著作作了政治的分析，写成他的《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但事实证明，其所述大多却不正确。

馬克思关于工人阶級日趋貧困的理論，本是根据上面这些国家的社会現象所作的推論，但日后并未实現。不过正如塞东—华生（Hugh Seton-Watson）在他所著《从列宁到馬林科夫》①一书中所說，这种貧困現象，在东欧农业国家却大体无誤。因此，馬克思在西方的地位至多不过是一个历史学家和学者，而在东欧却等于一个新时代的先知。他的学說具有动人的力量，仿佛一种新的宗教。

根据現今法国作家莫洛亚（André Maurois）所著《英国史》的南斯拉夫版所述，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說提供的西欧的情形是这样的：

> “当1844年恩格斯訪問曼徹斯特的时候，他看到有三十五万工人聚居在潮湿污秽而搖搖欲墜的房屋中。他們呼吸着一种类似水与煤相混合的空气。在矿場中，他看到半裸的妇女，她們的生活有如最下等的拖車子的牲畜。儿童

① 弗雷德里克·阿·普雷格（Frederick A. Praeger）出版公司，紐約1953年版。

們整天在黑暗的隧道中过活，他們被雇担任开关原始式的通風設备，以及其他困难的工作。在花边工場中，剝削甚至及于四岁的儿童，其工作实际上等于并无报酬。"

恩格斯还活到能看見与此完全不同的英国的情形，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在俄国、巴尔干以及亚洲和非洲还見到比这更为可怕、更为貧困无望的現象。

技术的改进使西方国家无論在哪一方面都发生了广大而具体的变化。它促使壟断組織的形成，而且使世界被划分成了先进国家和壟断組織的势力范圍。这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十月革命的由来。

因为这些先进国家的生产迅速增加，并且取得了殖民地的資源和市場，所以工人阶級的物质地位大为不同。要求进行改革、改善物质生活的斗爭，以及要求政府采用議会形式，成为比革命理論更实际有用的东西。所以在这些地方，革命就被視为无意义而不切实际了。

在尚未工业化的国家，尤其是在俄国，其情形完全不同。他們感到陷于一个两难的境地；倘若不起而实行工业化，那就无法再继續在历史舞台上积极活动，而成为先进国家与壟断組織的俘虏，結果趋于灭亡。但是本国的資本，与代表此資本的阶級及政党，又力量薄弱，不足以解决迅速工业化的問題。因此，在这些国家中，革命就成了必要，成了国家的重大需要。而只有一个阶級，即无产阶級，或代表这个阶級的革命政党，可以担当这个任务。

其原因是，这里有一个不变的規律，即每一人类社会及其所屬的每一个人都想要增加生产，使之完善。但在他們努力的时候，却不免与其他团体及个人发生冲突，于是为了生存就彼此发生斗爭。在生产日趋增加与扩張的时候，常遇到自然的和社会

的阻碍，如个人的、政治的、法律的以及国际的习惯与关系等。由于必須克服这些阻碍，所以，社会——当时代表社会生产力量的某群人——必須消除、改变或毁灭存在于其内外的各种阻碍。阶級、政党、政治制度及政治观点都反映着运动和停滞这种連續不断的状态。

沒有一个团体或国家願意让生产落后到使它足以威胁到生存。因为落后的意义便是灭亡。人决沒有自甘灭亡的，他們要不惜一切牺牲以克服那些阻碍其經济生产与生存的困难。

环境、物质条件及知識的水平可以决定使生产发展和扩大的方法、力量和手段，从而也是左右其社会后果的决定性因素。无論如何，发展和扩大生产的需要，不管他們标榜何种思想旗号或社会力量，并不只凭个人；因为人們需要生存，社会和国家为了达到他們所求取的目的，就有必要寻求当时认为最适合的領袖与思想。

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就在壟断資本主义的时代，从工业发达的西方移植到工业落后的东方，如俄国与中国。这也就是社会主义运动正在东方和西方发展的时候。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运动首先是統一和集中于第二国际，最后乃分裂为改良的社会民主党与革命的共产党，后来发生了俄国的革命，組織了第三国际。

在那些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实現工业化的国家，其所以发生共产主义革命，是有特殊的民族理由的。原来，早在馬克思主义者出現于十九世紀末叶以前，革命运动在半封建的俄国已有半个世紀以上的历史。而且，又有国际的、經济的、政治的迫切而特殊的具体原因要求革命。基本原因——对工业化的迫切需要——在发生革命的所有各国，如俄国、中国和南斯拉夫等都是普遍存在的。

在馬克思以后，欧洲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但是唯物的和馬克思主义的，而且在思想上具有相当程度的排它性，这可以說在历史上是必然的。反对它們的有旧社会一切势力的联合，如教会、学校、私有財产、政府，更重要的还有欧洲各国在面对欧洲大陆上不断发生的战爭威胁下早就发展出来的巨大的权力机构。

无論是誰，要想把世界作根本的改变，首先就必須对世界从根本上"正确无誤"地加以解說。任何新的运动在思想上必然是排它的，尤其是在只有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如果运动一旦成功，那末这种成功的事实更使这种思想和信念增强。虽然"冒險的"議会手段与罢工的成功，使改良主义的趋向在德国及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中的势力增强了，但俄国的工人非經流血的清算，就不能使其地位有絲毫改善，所以他們无可奈何，只好进行武力革命，以免于絕望与餓死。

但东欧的其他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馬尼亚及保加利亚，它們并沒有根据这一规則行事，至少是波、捷、匈三国。它們并未經过革命，共产主义制度乃是苏联軍队强加于它們的。它們甚至也并未迫切要求进行工业改革，至少是并未要求用共产党的方法，因为有些国家已經达到改革了。总之，在这些国家中，革命乃由外国刺刀与武力机关从外面及上面加在它們身上的。除了工业最为发达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外，在其余几国中，共产主义运动的势力是微弱的。直到苏联在大战时期进行直接干涉及1948年2月发生的政变以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运动极类似左翼社会主义运动和議会社会主义运动。因为共产党在这些国家中势力微弱，所以共产主义的实质与形式乃不得不与苏联相同。苏联把它的制度加在它們身上，当地的共产党也欣然接受。它們的共产主义势力愈弱，它們就愈加

要模仿（甚至包括形式）苏联“老大哥”的极权主义的俄式共产主义。

至于像共产主义运动势力較大的法国和意大利，因在工业方面要努力赶上其他工业发达的国家，于是就遭遇到社会上的困难問題。但是因为这些国家已經过民主和工业革命，他們的共产主义运动就与俄国、南斯拉夫及中国大不相同。所以，在法国和意大利沒有革命的机会。因为他們生活在政治民主的环境中，即使共产党的領导人也不能完全除去对議会政治的幻想。于是对于革命的前途，他們只好多仰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的援助，而不能靠自己的革命势力。他們的党徒以为他們的領导人是为了克服貧困而奋斗，就天眞地相信党所斗爭的目标是更广大更眞实的民主。

現代共产主义的思想是随現代工业的創始而发生的。在工业发展已达到其基本目标的国家中，共产主义便告死亡或被消灭了。共产主义只在工业不发展的国家得以发展滋长。

共产主义在落后国家的历史任务已經决定了革命的道路与性质，并且必促其实現。

第二章 革命的性質

一

历史告訴我們，在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其他政党也都不滿現状，最显著的例子是俄国，除共产党外，使共产主义革命成功的还有其他政党。

然而，只有共产党是旣反对現状而又坚决一貫地支持工业化运动。实际上，这是从根本上摧毁旣有的所有权关系。在这一方面，其他的政党沒有如此激烈。沒有一个政党"热心工业"到那种程度的。

为什么这些政党在它們的綱領中一定要具有社会主义的內容呢？其原因不那末明显。在帝俄的落后环境中，資本主义的私有財产制度不只显得不足以迅速完成工业化，而且事实上在阻挠工业化。俄国的資产阶級是在一个极端强有力的封建关系依然存在的領域中发展起来的；同时这个原料丰富、市場广大的国家一直是在其他比它先进的国家的控制之下。

由于历史条件的影响，工业革命在沙皇統治下的俄国不得不姍姍来迟。在欧洲国家中，俄国是唯一沒有經过宗教革命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国家。它同欧洲中世紀时的城市国家沒有一处相似。落后，半封建，君主专制，政府集权，有些地方的无产者人数激增，俄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卷入近代資本主义漩渦，而成为世界各国大銀行中心攫取其經济利益的目标。

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說，俄国大銀行的資本有四分之三是外国資本家的。托洛茨基也在

他的《俄国革命史》中强调这一点。他指出，外国資本家握有俄国工业資金的40%，在某些重要工业上的百分比甚至比这个数字还要高。就南斯拉夫来說，在南斯拉夫最重要的經济部門中，外国人有决定性的势力。这些事实的本身并不說明甚么。但是，它們表明，外国資本家用他們的权力来阻止这些国家的进步，他們把这些地区当作他們所需要的原料和廉价劳力的供应地，結果使这些国家不会进步，甚至还开始衰落。

在这些国家中，凡是負有要发动革命这一历史任务的政党在对内政策上不得不反对資本主义，在对外政策上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

再就內部的情况說，本国資本是軟弱无力的，并且大部分是外国資本的工具或附屬物。因而，对工业革命眞正有兴趣的并不是資产阶級，而是从日益貧困的农村中走出来的无产阶級。就像消除殘酷的剝削是那些已經成为无产者的人們的生死大事一样，工业化运动是那些即将成为无产者的人們的生死大事。代表这两类人的运动必然是反資本主义的，那就是說，在观念上、口号上和諾言上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除非革命的政党能控制国內一切資源，特别是那些因实行严厉的剝削和使用不人道的方法而遭群众痛恨的本国資本家的資源，否則，革命党就不能认眞地計划实行工业革命。同时，革命党还得对国外資本家采取同样的对策。

其他政党不能采用类似的政綱。它們不是想恢复从前的旧制度，就是想保持既得利益；或者最多也不过是謀求逐步地和平发展。甚至那些反对資本主义的政党，如俄国的社会革命党，都想把社会拉回到古时农人的田园生活。甚至像俄国的孟什維克这类社会主义的政党，也只不过是想用激烈的手段推倒自由資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孟什維克党人的观点是，为了达到日后

的社会主义，就必須先充分地发展資本主义。然而，事实上，問題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这些国家中，复古或者加速資本主义的发展都行不通。在特定的国内外条件限制下，两者都不能解决这些国家进一步发展的迫切問題，即工业革命問題。

只有既主張进行反对資本主义的革命又主張迅速推行工业化运动的政党才有成功的希望。此外，很明显，这个党必須确信社会主义。不过，由于这个政党必須在既有的一般条件下，以及在工人运动或社会主义运动中活动，所以在意識形态上，这样的一个政党必須凭借两点，即近代工业必定会产生而且是有用的，以及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信条。这种观念已經存在，只須稍加修改就行了。这种观念就是馬克思主义——它的革命的一面。于是，它与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結合起来，或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結合起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后来，随着革命的发展以及工业先进国家在組織上的变动，这个党又必須与欧洲社会主义的改良派分手。

革命和迅速的工业化的不可避免，曾造成巨大的牺牲和采用暴力手段，这就不只需要諾言，而且对人間天国到来的可能性要有信心。革命和工业化运动的信徒和其他人的行动一样，循着阻力最少的路綫前进，他們常常离棄已确立的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教条而另辟途徑。可是，他們并不能完全摒棄馬克思主义的教条。

資本主义和資本主义关系是适当的、而且在特定的时間內也是不可避免的形式与技术，社会可以通过它們表达其需要和願望，以謀求生产改进与扩大。在英国，在十九世紀的前五十年中，資本主义使生产有了改进和扩大。正像英国的工业家为了扩大生产而不得不摧毁农民的利益一样，俄国的工业家或資产阶級就不得不成为工业革命的牺牲品。参与人和形式并不相

同，但規律却完全一样。

不論是在英国或俄国，社会主义总是不可避免地被用作口号和誓言，被当作一种信念和高尚的理想，并且在事实上被作为一种特别的政府形式和所有权形式，这种形式将便利工业革命并且使生产作可能的改进与扩大。

二

所有历史上的革命都是在新的經济或社会关系已开始抬头、而旧有的政治制度已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唯一障碍时才发生的。

所有这些革命都是要摧毁旧有的政治形式，并为旧社会中早已成熟的新的社会力量和关系开路。在某些革命中，革命者甚至要求得多点，例如，雅各宾党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中曾試图以武力建立新的經济和社会关系，但是他們不得不失败并且很快被消灭。

在从前所有的革命中，武力与暴力主要是作为后果、作为新的但早已得势的經济和社会力量与关系的工具而出現。即使在进行革命时，武力与暴力超出了适当的限度，然而最后，革命的力量总不得不被导向一个积极的并且可以达到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恐怖与专制也許在所难免，但只是暫时的現象。

一切所謂資产阶級革命，不論是由于下层的支持而取得成功，例如由群众参加的法国革命，或是像德国俾士麦时代的来自上层的政变，都必然以政治民主告終。那是可以了解的事。那些革命者的任务主要是摧毁旧的专制政体，建立一种将能适合現有經济及其他需要的政治关系，特别是适合商品自由生产的需要。

当代共产主义革命完全是另一种不同的革命。它們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新的或社会主义的关系在經济中早已存在，或者因为資本主义已經“过度发展”。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的发生正是因为資本主义不够发达，或者因为这个社会沒能力使自己工业化。

在法国，在革命开始以前，資本主义早已存在于法国的經济領域內，社会关系上，甚至公众的良知中。这很难和俄国、中国或南斯拉夫等国的社会主义相比。

俄国革命的領袖們是明白这一事实的。当革命还在进行时，列宁曾于1918年3月7日在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說：

“……資产阶級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資产阶級革命来說，还在旧制度內部，新的經济組織就逐漸形成起来，它逐漸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任何資产阶級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了它所应做的一切：它加强資本主义的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却处在完全另外一种情况中。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資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

“社会主义革命和資产阶級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資产阶級革命时，現成的資本主义关系的形式已經具备了；而苏維埃政权，即无产阶級政权，却沒有这种現成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包括一小部分工业上层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展的資本主义形式。”①

我引述了列宁的話，但我还可以引录任何一个共产主义革

① 見《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7—78頁。——譯者

命領袖及其他許多作者的話来证实一項事实，即新社会中并无既定的关系存在，不过总有人必須来建立这种关系，而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須由“苏維埃政权”来建立。如果新的“社会主义”关系已在共产主义革命趋向胜利的国家里有最充分的发展，那就无須环繞“建設社会主义”而作那么多的保证，論证和努力了。

这一事实导致我們发现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矛盾。如果一个新社会所需要的条件还未充分具备，那末，是誰要革命的呢？再則，革命又怎么可能呢？新的社会关系既然在旧社会中尚未成形，革命又如何能維持下去呢？

过去从未有任何革命或政党把建立社会关系或新社会作为自己的任务。然而，这正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首要目标。

共产主义革命的領袖們虽不比其他的革命領袖更熟知支配社会的規律，他們却发现，在有可能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实行工业化也是可能的，特别是当他們使社会的改造按照他們的意識形态上的假設进行时，更有此可能。革命在“不利的”条件下取得成功的經驗证实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建設”也证实了这一点。这就加强了他們的幻觉，以致他們自以为深知社会发展的規律。事实上，他們是先为一个新社会設計一幅藍图，然后动手去建造，不对的地方就加以修改或廢棄，务求一切尽量合乎他們的計划。

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工业化作为一种不可避免而合理的社会需要，便和共产主义的完成工业化的方式結合起来了。

革命与工业化虽在平行的軌道上齐头并进，然而，不論是前者或后者都不能在一夜間完成。在革命成功后，必須有人肩負工业化的责任。在西方国家中，这一任务是由从专制的政治鎖鏈中解放出来的資本主义經济力量担当的，但在发生共产主

义革命的国家中并无类似的經济力量存在，所以只得由革命机构本身来担当，也即由新政权，由革命政党来担当。

在以前的革命中，在旧秩序被推翻后，革命的武力和暴力便成为經济上的一种障碍。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武力和暴力却是进一步发展甚至进步的一个条件。在以前的革命者看来，武力和暴力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弊害和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可是，在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武力和暴力竟被提高到偶像和最后目标的崇高地位。在过去，构成一个新社会的阶級和力量早在革命发生前就已存在。而共产主义革命却是第一个不得不創造新社会和新的社会力量的革命。

正像西方国家的革命經过一番"偏差"与"撤退"后必然以民主告終一样，东方国家的革命则必然形成专制。在西方国家中，恐怖与暴力已变成无用和可笑的东西，甚至成为革命者和革命政党完成革命的障碍，而在东方国家，情形则恰恰相反。专制不只是由于工业化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間而継續存在，而且，我們以后将看到，即使在工业化完成以后，它仍将长期存在。

三

在共产主义革命和以前的革命之間还有其他的基本差别。以前的革命虽然在經济上和社会上已达到准备就緒的阶段，但如果沒有有利条件，是不会爆发的。我們現在都知道一个革命爆发和成功所必需的一般条件。然而，除了这些一般条件之外，每次革命都还得有些特殊的条件才能使其計划和实行成为可能。

战争，或者說得更准确一些，整个国家組織的崩潰，对于过去的革命，至少对那些較大的革命是不需要的。然而現在，这却是共产主义革命胜利所必需的一个基本条件。对中国来說甚至

是行之有效的；不錯，中国的革命开始于日本侵略中国之前，但它經过整整十年的时間来继續扩大实力，終于在战后取得了胜利。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可能是一个例外，但由于它未有足够时間轉变为一个純粹的共产主义革命，因此未获成功。

共产主义革命或打碎国家机器之所以需要战爭，必然是由于經济和社会条件不成熟。在一个制度土崩瓦解时，特别是当当时的統治阶級和国家制度在战爭中失利时，一个組織完善、訓练有素的小团体必然能够取得政权。

因此，当十月革命发生时，俄国共产党只有八万名党員。而南斯拉夫共产党在1941年开始革命时只有一万名党員。为了夺取政权，至少必須有一部分人民的支持和积极的参与，但是，不論在哪一次革命中，領导革命并掌握权力的政党总是一些完全依靠非常有利条件的少数人。而且，在这个党的政权尚未稳固以前，它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多数人的集团的。

要完成这样一种艰巨的工作——在不利的社会經济条件下摧毀旧秩序，建設一个新社会——只能吸引少数人，并且只有那些对它的可能性抱有狂热信心的人才会被吸引。

特有的条件和一个特殊的党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两个基本特征。

任何革命的成功以及战爭的胜利都要求一切力量的集中。根据馬尔薩斯的說法，法国革命是第一次把"一个民族的一切資源——人民，食物，服装——在战爭中都交給当局"的革命。可是，在共产主义的"不成熟的"革命中，集中的程度却超过法国的革命；不只一切物质資源，而且連一切智力資源在內都得交給党，而党的本身，作为一个組織，又必須在政治上充分地集中权力。只有共产党由于在政治上团結一致，坚定地团結在中央的周圍，并具有一致的思想意識，才能实現这样的革命。

一切力量和資源的集中以及革命政党的某种性质的团結，是任何成功的革命所必需的条件。对共产主义革命来說，这些条件甚至更加重要，因为共产党人在一开始就排斥其他独立的政治团体或政党，不让他党与之为友。同时，他們要求一切观点一致，包括实用的政治观点以及理論的、哲学的观点，甚至道德观点都得一致。俄国社会革命党左派的参加十月革命，以及其他政党的个人或团体的参加中国和南斯拉夫的革命的事实，非但沒有否定而且反而证实这一理論：这些团体只是共产党的合作者，而且只是在斗爭中进行一定限度的合作。革命后，这些与它合作的政党都得解散，不然就是自行解散而并入共产党。当社会革命党左翼想独立时，布尔什維克立刻将它击潰，而南斯拉夫和中国的支持革命的非共产党团体，也得放棄各自的政治活动。

以前的革命都不是单由一个政治团体来完成的。誠然，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各个团体不免相互傾軋和破坏；不过，整个說来，革命并不只是一个团体的工作。在法国革命时期，雅各宾党人的独裁只維持一个很短的时期。从革命中出現的拿破侖的独裁，一方面表明雅各宾党人革命的結束，同时也表明資产阶級統治的开始。不論怎样，在以前的革命中，虽然有一个政党会居于举足輕重的地位，但其他政党絕非附庸。虽然有压制和解散的事，但这些事只能在短时期內强制执行。其他的政党并不能被摧毁，并且常常会东山再起。甚至被共产党人认为是他們的革命与国家先驅的巴黎公社，也是一个多党的革命。

在革命的某一个特定阶段中，可能由某一个党派扮演主要的甚至唯一的角色。不过，在以前的政党中，沒有一个政党在意識形态上或在組織上集中到像共产党那样的程度。不論是英国革命中的清教徒或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宾党人，在哲学上和意識形态上的观点也并不完全一致，尽管清教徒还是个宗教派别。

从組織的观点看，雅各宾党只是俱乐部的一个联盟，清教徒甚至連联盟都說不上。只有当代的共产主义革命强使政党在意識形态上和組織上一元化。

不論怎样，有一件事是确切无疑的：在以前的革命中，随着內战以及国外干預战事的結束，革命手段和革命政党的需要就消失了，这些手段和政党也不得不消逝。但在共产主义革命完成后，共产党人依然保持革命的手段和形式，并且他們的党立即在行政的集权上和意識形态的划一上达到最高的程度。

在革命时期，列宁在列举他的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时曾公然强調这一点：

"在目前激烈的国內战爭时代，共产党必須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組織起来，在党內实行像軍事紀律那样的铁的紀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須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員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①

斯大林在《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又为列宁的話作了如下的补充：

"在爭得专政以前的斗爭条件下，党內紀律的問題就是这样。

"关于爭得专政后的党內紀律也应該这样說，而且更应該这样說。"②

在取得政权后，革命的气氛和警惕性，意識形态的继續保持統一，政治与意識形态的一元化，政治上以及其他方面的中央集权等現象都未終止。恰恰相反，这些現象甚至更加强烈。

在以前的革命中，手段的殘暴、思想的統一以及权力的集中

① 見《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85頁。——譯者

② 見《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9頁。——譯者

差不多总是与革命同时結束的。然而，由于在共产主义革命中，革命只是一个集团的专制极权当局的第一个行动，所以就很难預測这种权力的期限。

在以前的革命中，包括法国的恐怖統治时期在内，从表面上看，注意力总是放在消灭眞正的反对者上面。沒有人去注意消灭未来可能的反对者。只有在中世紀的宗教战爭时期，才有对某些社会团体或意識形态不同的团体加以清除和迫害的事。共产党人知道，不管是在理論上或实践上，他們是同其他阶級和意識形态对立的，因此，他們得对其他的阶級和具有其他意識形态的人加以迫害和清除。他們不只对实际存在的反对者并且还得未来可能的反对者作战。在波罗的海沿岸諸国中，一夜之間曾有数千人遭到清算，原因是查出他們以前曾持有其他的意識形态和政治观点。数千波兰官員在卡亭森林被屠杀也是类似性质的事件。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在革命早已过去以后，还在继續使用恐怖主义的压制手段。有时，这些手段变得更加完整，并且比革命时期中用得更广泛，如对富农的清算便是最好的例子。在革命后，意識形态的統一与不容忍是加强了。即使当肉体的迫害能够減少时，执政党还傾向于加强規定的意識形态——馬克思列宁主义

以前的革命，特别是所謂資产阶級革命，很重視在革命的恐怖停止后立即建立个人自由。甚至革命者还认为保证公民的合法地位甚为重要。司法独立是所有这些革命必有的最后結果。苏联革命已經四十年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司法独立的实現尙遙遙无期。以前历次革命的最后結果往往是更大的法律保障和更多的公民自由。共产主义革命是談不上这一切的。

以前的革命和現在的共产主义革命还有另一个巨大的差别。以前的革命，特别是那些較大的革命，是工人阶級斗爭的产

物，可是，革命的最后果实則落在智力上并且常常是在組織上領导革命成功的另一个阶級手中。在以資产阶級的名义进行的革命中，农民和貧苦大众的斗爭果实在很大程度上被資产阶級所享有。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国內的群众也参加了革命，然而，革命的果实并未落入他們的手中，而是給了官僚集团。因为官僚集团正是使革命实現的党組織。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只有实現革命的革命运动沒有被放棄。共产主义革命可能"吃掉自己的儿女"，可是并不是把它們全部吃光。

事实上，在一次共产主义革命完成时，在对未来路綫持異議的各派系間，总不免使用无情而卑鄙的手段。

彼此的攻击总是圍繞着教条，它們指責对方在"客观上"或"主观上"是反革命分子或国內外"資本主义"的代理人。不管这些異議在何种方式下解决，得胜的必然是最坚决而一貫地支持按照共产主义原則进行工业化的那一派，而共产主义原則也就是以党的徹底壟断、特别是由国家机构控制生产为基础。共产主义革命并不吃掉将来工业化所需要的那些儿女。被清除掉的往往是那些从文字上接受革命的观点与口号并天眞地信它們将会实現的革命者。了解革命能在社会、政治和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取得权力并以此作为推行未来工业改革的工具的那一派总是胜利的。

革命者及其盟友，特别是行使权力的集团，在革命后还依然存在，这种事实，只見于共产主义革命。在以前的革命中，类似的集团都沒有做到这一点。共产主义革命是第一个为革命者带来好处的革命。革命者以及圍繞他們而形成的官僚集团共享革命的果实。于是，这在革命者中以及在更广大的党的外圍群众中便产生一种錯觉，以为他們的革命是历史上第一个一直忠于它所标榜的口号的革命。

四

共产主义革命为它的眞正目标所制造的幻想，比以前历次革命所制造的幻想更加經久而广泛，因为共产主义革命以一种新的方式解決各种关系，并且带来一种新的所有权形式。以前的革命当然也不免带來或大或小的財产关系的变动。不过，那只是在一种私有財产制之下的所有权的更迭。而共产主义革命所带来的变动則不是这样；变动是彻底的、根本的，这是集体所有权代替了私人所有权。

当共产主义革命还在发展过程中时，它就已經在摧毁資本主义的、土地占有的和私人的所有权，也即利用外国劳动力的所有权。这立刻造成一种信念，以为革命所允諾的一个新的平等而公正的社会已經实現。同时，党或者在党控制下的国家权力机构在采取广泛的工业化措施。这也使群众更加以为丰衣足食的日子終于来临。专制与压迫是有的，但人們认为那只是暫时的現象，財产被充公的以前有势力的人們以及反革命分子的反抗一旦被消除，工业化一經完成，专制与压迫就会結束。

在工业化过程中，有几項根本的变化发生了。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业化，特别是如果它沒有得到援助和遭受外力的阻碍时，必然要求一切資源的集中。工业財产及土地的国有化，是集中財产于新政权手中的第一步。然而，它并不就此止步，而且也不能就此止步。

这种新創立的所有权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形式的所有权冲突。新的所有权又以强力加在那些不雇工或雇工不多的小有产者身上，如手工业者，工人，小商人和农民。在剝夺小有产者的所有权时，甚至并不是由于經济动机，即并不是为了提高生产率。

在工业化过程中，連那些不反对革命甚至对革命出过力的人們的財产也不免被政府沒收。在形式上，国家是这些財产的主人，由国家来經管这些財产。私有財产制被廢除了，或者降到次要的地位，但它的完全被消灭却完全要看新当政者的兴致。

共产党人及一部分群众认为这是阶級的彻底消灭，一个无阶級社会的实現。事实上，工业化和集体化实現以后，革命前的旧阶級的确是被消灭了。群众中依然存在着不滿，这种不滿是自发的和沒有組織的，他們的不滿既未終止，亦未減輕。共产党人依然以"阶級敌人"的"殘余"和"影响"来自欺欺人。尽管如此，他們却以为用这些手段实現了长期梦想着的无阶級社会。至少对共产党人自己来說这种幻想是完整的

每一次革命，甚至每一次战爭，总会制造出一些幻想，并且是借一些根本不可能实現的理想来进行的。在进行斗爭的时期，战斗員們把这些理想看成真像是若有其事；可是到革命結束时，理想往往就破灭了。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并不如此。在武装战斗終止很久以后，参与共产主义革命的人和那些貧苦大众仍保持着他們的幻想。某些人，特别是共产党人，依然把他們的幻想保留在口号中，而对于压迫、专制、公开的沒收財产，以及統治者享有特权等，则視若无睹。

虽然在开始发动共产主义革命时可能是仗着最理想的观念，号召神奇的英雄主义与巨大的努力，但它所播种的却是最辽闊最經久的幻想。

在国家的生命史上，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革命可能以专政告終，可是它也把国家带上以前走不通的道路。

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实現任何一种标榜为革命的推动力量的理想。可是，共产主义革命却为欧亚两洲广闊的地区带来某种程度的工业文明 这样，事实上共产主义革命已为未来更自由

的社会創造了物質基础。因此，共产主义革命虽帶来最完备的专制制度，但它同时也創造了廢除专政的基础。就像十九世紀把近代工业引給西方一样，二十世紀将把近代工业帶給东方。列宁的影子正以不同的方式籠罩在欧洲和亚洲的辽闊的土地上。在中国是专制形式，在印度和緬甸則是民主形式，不論怎样，所有其余的亚洲国家及其他各国正无可避免地进入工业革命。俄国的革命是这个过程的先导。这一过程仍然是革命中不可估計的和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事实。

五

共产主义革命可能看来大部分都是历史上的騙局和偶然发生的事故。就某种意义来說，这是事实：其他任何革命都沒有需要这么多的例外条件，也沒有其他任何革命許諾得如此之多而完成得如此之少。在共产党領袖的言論中都必然有煽惑与欺蒙之詞，因为他們迫不得已而許諾一个最理想的社会，而且答应"廢除一切剝削"。

然而，我們并不能說共产党人欺騙了人民，这也就是說，他們并不是故意言行不符，所做的与所許諾的完全兩样。事实很簡单：他們根本不能完成他們狂热地信以为可能实現的事。甚至当他們被迫去执行一种違反革命前及革命中所作諾言的政策时，他們还不承认这一点。从共产党人的观点看来，这种承认无異于自认革命是不需要的。同时，这也无異于自认共产党人是多余的累贅。对他們来說，这类事都是承认不得的。

一場社会斗爭所得到的最后結果永远不会如斗爭推动者当初的理想。有些斗爭取决于人的智力和行动所不能控制的一連串无限复杂的环境。要求超人的努力并要在社会上实行迅速而

彻底的变化的革命尤其如此。这类革命必然得制造絕对的信心，坚信革命胜利后，人类繁荣和自由終将出現。法国革命是在常識性的口号下，在相信自由、平等、博爱終于要出現的情况下发动的。俄国的革命是在为創造一个无阶級社会的"純科学的世界观"号召下进行的。如果革命者和一部分人民不信仰他們的理想目标，就不可能有任何革命出現。

共产党人对革命后所产生的各种可能性的幻想比一般附从的群众更为强烈。共产党人可能已經知道，事实上，他們也确实知道工业化的不可避免。不过，他們对于工业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和社会关系，只能猜測而已。

苏联和南斯拉夫官方的共产主义历史学家，把革命描写成好像完全是共产党領导人事先計划好的行动的結果。事实上只有革命本身和武裝斗爭是有意識地計划的，至于革命所采取的形式則完全是从突然发生的事件和直接行动中产生的。毫无疑問，列宁是历史上最偉大的革命家之一，甚至在俄国革命快爆发时，他都不能預見到革命何时发生，或以何种形式发生。1917年1月，即距"二月革命"爆发只一个月，距使列宁取得政权的"十月革命"爆发仅十个月，列宁在瑞士社会主义青年的一个集会上致詞說：

"我們这些老年人，也許活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那个时候了。但是我认为，我能够滿怀信心地表示这样的希望，那就是現在正在瑞士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色地工作着的青年們，不仅会幸运地參加未来的无产阶級革命，而且会在这个革命中取得胜利。"①

怎么能說列宁或其他任何人能預見到长期而复杂的革命斗

① 見《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9頁。——譯者

争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呢？

尽管共产主义的理想本身并不真实，可是，共产党人却和以前的革命者不同，他們在創建可能办到的事物时是非常认真的。他們用唯一可能的办法去尝試——行使絕对的极权主义的权威。在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后，不只革命者仍据守政治舞台，并且就最实际的意义来說，他們还在建立一种与他們的信念和諾言完全相反的社会关系，这样的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在稍后的工业的发展和改革时期，共产主义革命把革命者轉化为新社会的創造者和主人。

馬克思所作的具体預測已被证明为不准确。列宁也曾期待在独裁制度的帮助下，一个自由的或无阶級的社会将被創造出来，这当然更不准确。不过，使革命必然发生的需要已經实現了，也就是在現代技术的基础上推行工业改革这一点已經实現了。

六

用抽象的邏輯可以推出，当共产主义革命在不同的条件下以政府的强制力得到西方工业革命和資本主义所得到的同样东西时，共产主义革命无非是国家資本主义革命的一种形式。革命的胜利所創造的关系乃是国家資本主义的关系。当我們发現新政府还管理一切政治、劳工等及其他关系时，更使我們相信这一点。而更重要的是，新政权还負責分配国家总收入、利潤以及实际已变为国家的财产的物資。

苏联以及其他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各种关系是国家資本主义关系或社会主义关系或是其他关系呢？討論这些問題是相当武断的。可是，这种討論却具有基本意义。

尽管正如列宁所强調的，我們可以假定国家資本主义不过

是"社会主义的前厅"，或者說，这是社会主义的第一个阶段，这依然絲毫不能让呻吟于共产主义专政下的人民稍感舒适，觉得日子容易挨一点。如果共产主义革命所带来的財产和社会关系的特性有了更为肯定而明确的說明，那末人民从这种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希望就会变得更实际一些。如果人民不明白他們生存其中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或者說，如果人民找不出如何改变它們的方法，那末他們的斗爭就不能有任何成功的希望。

不管共产主义革命的諾言和幻想如何，如果共产主义革命只是依国家資本主义关系行事的国家資本主义，那末工作人員所能采取的唯一合法而积极的行动，必然是改进工作并且減少国家行政当局的压力和不負責任的情形。共产党人在理論上并不承认他們是在国家資本主义制度下工作，可是，他們的領袖却在以国家資本主义方式行事。他們不断地自吹自擂，夸口如何改进行政工作和領导"反官僚主义"的斗爭。

再则，实际的关系并不是国家資本主义关系；这些关系并不提供从基本上改进国家行政系統的方法。

为了确定兴起于共产主义革命时期并在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过程中終于建立了起来的各种关系的性质，我們必須进一步研究国家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活动方式。这里，我們所要指出的只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中，国家机器并不是真正决定社会关系和財产关系的工具，它只是保护这些关系的工具。实际上，每种事物都是在国家的名义下并通过国家的約束完成的。共产党，包括职业性的党的官僚在内，却不受約束并在背后操纵国家的一切行动。

正式使用、管理并控制国有化和社会化財产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是一群官僚。官僚在社会中居于一种特殊的特权地位，掌握行政大权，控制国民收入和国家物資。社会关系类似国家

資本主义。而且由于工业化的实現并非得力于資本家的帮助，而是得力于国家机器的帮助，就更显得如此。事实上，是这个特权阶級在推行工业化，国家机器不过是它的护身和工具。

所有权不过是享有利潤和控制的权利。如果有人把阶級利益解釋为这种权利，那末分析到最后，我們可以說共产主义国家正有一种新的所有权形式在兴起，或者說，正有一个新的統治剝削阶級在兴起。

实质上，共产党人的行动无法与以往的任何統治阶級不同。他們相信他們正在建立起一个新的理想社会，他們用他們所能采取的方式为自己进行建設。他們的革命与他們的社会看来并非偶然，也非不自然，这只是某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中必然发生的事。因此，不管共产主义的暴政是如何广泛和不人道，在继續推行工业化的这个时期中，社会中的人民不得不忍受并且也能够忍受共产主义的暴政。再則，这种暴政已不再纍然是不可避免的事，而完全是为了保障一个新阶級的掠夺和特权。

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級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絕对权威的新阶級。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欺騙和錯觉而已。

第三章 新阶級

一

在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与那些領导人物（甚至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卓越的領导人物）所預料的不同。他們預料国家将迅速消灭，而民主将会加强。然而，发生的事恰恰相反。他們預料生活水平将迅速提高——事实上在这方面却很少变动，而在东欧卫星国家中甚至比过去还低。从一切事例看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沒有能与工业化的速度相称，工业化的速度要快得多。他們相信，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将逐漸消失；可是，这些差别却在增加。共产党人对其他地区的預測，包括对非共产主义世界发展的預測在內，也都未能实現。

他們最大的幻想是：在苏联实行工业化和集体化以及摧毁資本主义的所有权以后，将产生一个沒有阶級的社会。在1936年新宪法頒布时，斯大林曾宣告"剝削阶級"已不再存在。資产阶級及古时傳下来的其他阶級事实上是被消灭了，不过，一个历史上前所未聞的新阶級却形成了。

像过去的其他阶級一样，这个阶級会认为其权力的建立将使所有的人幸福和自由，他們作如此想法是可以了解的。这个新阶級与其他阶級的唯一差别是：它对它的幻想的迟迟不能实現用更粗暴的方式来处理。因此它肯定了它的权力比历史上以前的任何其他阶級更为完全，它的阶級幻想和偏見因而也比其他任何阶級更大。

这个新阶級，这一群官僚，說得更准确点，这一群政治官僚，不只具有前此一切阶級所共有的特质，还具有一些它独有的新的特质。虽然从本质上說，它与其他阶級开始时的情况类似，但它的起源仍有其独特的性质。

其他的阶級也是通过革命的途徑而攻得力量和权力的，它們曾摧毁途中所碰到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秩序。然而，几乎沒有例外，这些阶級都是在新的經济类型已在旧社会中成形以后才取得权力的。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新阶級，其情况却完全相反。它取得政权并不是为了去完成一个新的經济秩序，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它自己的經济秩序，因此，它必須建立其控制社会的权力。

在以往，某一阶級或某一阶級的某一部分人、或某一个政党的取得政权，都是它們的形成和发展的最后一件事。苏联的情况恰恰相反。新阶級是在它取得政权后才形成的。它的阶級意識不得不在它取得經济的和物质的权力之前发展，因为这个阶級并未在国家生活中生根。这个阶級是从一个理想的观点去看它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的。它的各种实际可能性并未因此而稍减。尽管它有种种幻想，它却代表走向工业化的客观趋势。它的实际的倾向是从这个趋势产生的。理想世界的諾言增加了新阶級分子的信心，而且在群众中散播了幻想。同时，它还激励人們担任龐大的物质建設任务

由于这个阶級未能在它取得政权前形成經济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因而它只能在一种特殊形式的組織中产生，它因具有成員的意識形态与哲学观点一致的一种特殊的紀律而与众不同。为了克服弱点，就必須信念一致和有铁的紀律。

这个新阶級植根于一个布尔什維克式的特殊的党。列宁认为他的党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沒有先例的，他的这个見解是对的，

尽管他没有想到这竟是一个新阶級的起源。

說得更精确一点，这个新阶級的創始人不是存在于整个布尔什維克式的党内，而是存在于那些甚至在它还未取得政权前即已构成核心的职业革命家中。1905 年的革命失敗后，列宁堅決认为只有职业革命家，即专以革命工作为职业的人們，才能建立一个布尔什維克式的新党，这并不是偶然的。甚至斯大林，这个新阶級的后来的創始人，也是一个这种职业革命家中的最典型人物，则更非出于偶然。这个新的統治阶級是从这些极少数的职业革命家中逐渐发展出来的。这些革命者早就构成革命的核心了。托洛茨基曾指出，革命前的职业革命家正是日后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来源。但他沒有觉察到，他們也正是一个所有者兼剝削者的新阶級的起源。

这并不是說新党与新阶級是二而一的。然而，党却是那个阶級的核心和基础。要明确这个新阶級的范圍并指明这个阶級的成員是非常困难的，或許是不可能的。也許我們可以說，这个阶級是由那些因壟断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和經济优先权的人們构成的。

由于社会中免不了有行政，于是，必要的行政功能就可能与寄生作用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就像并非每个工匠或城市人都是資产阶級的成員一样，共产党人也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个新阶級的成員。

粗略地說，当这个新阶級愈来愈强、它的面貌愈来愈清楚时，党的作用就日益减退。新阶級的核心和基础是在党和党的領导阶层以及国家的政治机构中創造出来的。一度曾經是生气勃勃、組織严密和充滿首創精神的党正在消失，而逐漸轉变为这个新阶級的傳統式的寡头統治，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要吸收那些一心希望加入新阶級的人，压制那些具有任何理想的人。

党制造了这个阶級，但是，这个阶級靠党长成并利用党为其基础。这个阶級愈来愈强，而党却愈来愈弱；这是每一个执政的共产党无可逃避的命运。

假如它不从物质上关心生产，或者說假如它本身沒有創造一个新阶級的潛力，那末沒有一个党能够以道德上和意識形态上如此愚妄的方式行动，更談不上还能长久执政。在第一个五年計划結束后，斯大林宣称："如果我們沒有創立机构，我們或許已經失敗了！"他应該用"新阶級"一詞来代替"机构"，要是这样，一切事情就更清楚了。

一个政党竟会是一个新阶級的起源，这似乎并不寻常。政党通常是在知識上和經济上已相当强而有力的阶級或阶层的产物。可是，只要我們了解俄国革命前的情况以及在其他一些国家中共产主义已胜过民族力量的实际情况，我們就会明白：这种类型的党是許多特殊机緣的产物，就这一点說，并沒有什么不寻常，也并不偶然。尽管布尔什維主义在俄国历史上有其淵源，但，部分說来，布尔什維主义只是俄国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所遭遇的独特的国际关系的产物。那时候，俄国已不能再以一个君主专制国家生存于当代世界，同时，俄国的資本主义太弱，而且过分地依附于外国的利益，以致它不可能推动俄国的工业革命。所以这个革命只能由一个新的阶級来推行，或者通过改变社会的秩序来进行。然而，当时并沒有这样的阶級。

在历史上，誰推动一个进程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这个进程要有人来推行。俄国和其他国家之所以发生了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这个道理。革命創造了它所必需的力量、領袖、組織和观念。新阶級的出現一方面是基于客观原因，一方面也是出于党的領袖的願望、机智和行动。

二

这个新阶級的社会根源出自无产阶級，正如貴族阶級之兴起于农民社会，以及資产阶級之兴起于商业工艺社会。当然也有例外，这全看国家的情况来决定，不过，經济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級，由于落后，就构成了这个新阶級兴起的原料。

关于为什么这个新阶級总是以工人阶級的保护者的姿态出現这一点，还有别的原因。新阶級是反对資本主义的，因此，它当然得依靠工人阶級。新阶級是靠无产阶級斗爭以及无产阶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将无殘酷剝削的傳統信仰来支持的。对这个新阶級来說，保证生产正常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因此，它就永远不能和无产阶級失去联系。而最重要的原因是：沒有工人阶級的帮助，它就不能完成工业化和巩固它的权力。而另一方面，工人阶級知道在工业的发展中，他們将从貧困与失望中被解救出来。經过一个长时期以后，这个新阶級的利益、观念、信念和希望同一部分工人阶級和貧农的利益、观念、信念和希望相符而且結合在一起了。在历史上，这种結合曾发生于各种距离甚远的阶級之間。在反封建制度的斗爭中，資产阶級不是曾代表农民嗎？

这个新阶級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是工人阶級和貧苦大众努力的結果。这些人正是共产党，或者說新阶級必須依靠的群众，而新阶級的利益同他們有最密切的联系。在新阶級未取得政权和确立其权威地位以前，两者的关系确是如此。在这以后，这个新阶級对无产阶級和貧民的兴趣只限于利用他們去发展生产和控制这些最勇猛和最难駕馭的社会力量。

这个新阶級以工人阶級的名义所建立的对整个社会的壟

断，主要就是对工人阶級本身的壟断。首先是知識上的壟断，先对所謂无产阶級先鋒队，跟着是对整个无产阶級。这是这个新阶級所必須完成的最大的騙局，不过，它也表明，这个新阶級的权力和利益主要还是寄托在工业中。沒有工业，这个新阶級就不能巩固其地位或权威

旧日工人阶級的儿女是这个新阶級最靠得住的成員。为主人供应最聪明最有天賦的代表本是奴隶不可避免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剝削和統治阶級就从被剝削的阶級中产生了。

三

当共产主义制度被拿来作批判性的分析时，我們发現，其基本特色在于官僚政治，由一个特殊的阶层来統治全体人民。一般說来都是这样。可是，更仔細的分析将表明，构成这个进行統治的官僚集团（或者，用我的术語讲，这个新阶級）核心的只是官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他們并不是行政官員。实际上，那是一群党的官僚，或者說政治官僚。其他的官員实际上只是受这个新阶級控制的机件；这些机件可能笨拙而不灵活，但是不論怎样，任何社会主义社会中都免不了有他們存在。就社会学的理論說，我們是可以把各式官僚加以分类的，但实际上他們之間实在难分彼此。事实不只是由于共产主义制度本质上就具有官僚性，而且因为共产党人实际上控制着各种重要的行政任务。再則，如果这个政治官僚阶层不把自己桌上的殘羹施舍給其他类的官僚，就难以享用他們的特权。

注意以上所說的政治官僚与那些随現代經济的每一集中制度（特别是那些促成集体所有权形式的集中制度，如壟断組織、

公司和国有制)而兴起的官僚間的基本区别，是很重要的。在西方国家，資本主义壟断企业或国有化工业中的靠薪金过活的工作人員人数在不断增加。杜宾(R. Dubin)在他的《行政工作中的人类关系》① (Human Relations in Administration) 一书中說，經济部門的国家工作人員正在轉变为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

> "……这些在一起工作的职員有生死同命的意識。他們分享同样的利益，特别是在升迁取决于資历而彼此間很少竞爭的情况下。于是，內部的摩擦减少到了极低限度，因而这种安排被认为对官僚政治是有积极作用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典型地发展出来的团体精神与非正式的組織每每导致这些职員維护他們自己的利益，而不协助顾客和选任的上司。"

这些公务人員同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官僚有許多类似之处，特别是在"团体精神"方面，但他們并不完全一样。尽管在非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家的或其他方面的官僚形成一个特殊阶层，可是，他們并沒有共产党人那样的权力。在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官僚的上面通常有选任的政治主人或公司老板，而在共产党人之上却既无主人也无老板。非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官僚只是现代資本主义經济中的一些官員，而共产党人却是另一种不同的新东西：一个新阶級。

要证实某一个阶級是否是一个特殊的阶級，就在于它的所有权以及它与其他阶級的特殊关系，这正和其他享有所有权的阶級中的情况一样。同样，一个阶級可以从所有权所給予它的成員的物质的及其他方面的特权标志出来。

正如罗馬法所規定的，財产构成物資的利用、享受和儲存。

① 普倫蒂斯—霍尔(Prentice-Hall)出版公司，紐約1951年版。

而共产党的政治官僚就利用、享受并储存收归国有的财产。

如果我們假定，这个官僚集团或这个享有所有权的新阶級的成員的身份，是根据他們所使用的因所有权給予的特权（这里指的是收归国有的物資）来确定的，那末这个新阶級或政治官僚的成員身份将由他們所得到的物质上的收入和特权中反映出来，而他們所得到的物质上的享受和特权比社会上一般所应該給予他們的分量要多。实际上，这个新阶級的所有权这一特权表現为由政治官僚分配国民收入、規定工資、指导經济发展方向、支配收归国有的及其他方面的财产的一种专門的权利和党的壟断权。所以在一般人看来，共产主义国家的官僚很富有，而且是不用做工的人。

由于許多原因，私人财产所有权已經证明对于这个新阶級的权威的树立是不利的。此外，要改变国家經济，就必須毁灭私人所有权。这个新阶級是从集体所有权这一特殊的所有权形式取得其权力、特权、意識形态和行事习惯的，他們以国家或社会的名义来行使并分配这种所有权。

这个新阶級认为所有权导源于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这便是壟断行政大权的人（他們构成一个狹隘的、門户緊閉的阶层）与沒有权力的生产群众（农民、工人和知識分子）間的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并不发生效力，因为共产党官僚还拥有支配物資的全权。

壟断行政权的人和生产者之間的社会关系的任何基本变化，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所有权的关系上。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社会、政治关系同所有权制度（政府的极权和权力的壟断）被更加充分地融合在一起，这是其他任何一种制度都望尘莫及的。

剝夺共产党人的所有权，就等于把他們这个阶級取消掉。强迫他們放棄他們的其他社会权力，使工人可以分享利潤（由于罢工和議会行动的結果，資本家們已不得不同意这一点），那就

等于是剝夺了共产党人对于財产、意識形态和政府的壟断权。这将是共产主义制度下民主和自由的开始，是共产主义的壟断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告終。在发生这种变化之前，就不能表明共产主义制度在发生重要的和基本的变化，至少那些认眞考虑社会进步問題的人是这样看的。

这个新阶級和新阶級成員所拥有的所有权方面的特权就是行政特权。这类特权从国家行政和經济企业的行政一直伸展到体育、慈善机构的行政。政治的、党的或所謂"总的領导"，是由这个阶級的核心执行的。領导地位就包含着特权。奥罗夫（Orlov）在他的《斯大林时代》（"Stalin au pouvoir"，1951年在巴黎出版）一书中称，苏联的一个工人在1935年的薪金平均一年是1,800卢布，而一个人造絲委員会秘书的薪金和津貼則每年高达45,000卢布；后来，虽然工人和党的工作人員的情况都有所变动，不过它的本质依然沒有改变。其他的作者也得到相同的結論。工人和党的工作人員的薪金有天淵之別，这不可能瞞过最近几年訪問过苏联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人。

其他的制度也有它們的职业政客。不論你认为他們是好是坏，他們必然存在。社会不能离开国家或政府而存在，因此，社会也不能离开那些为它奋斗的人而存在。

然而，其他制度中的职业政客与共产主义制度中的政客之間却有基本上的差別。就极端的例子說，其他制度中的政客利用政府为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同僚取得特权，或者照顾某一个社会阶层的經济利益。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情况則完全不同，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权力和政府同国家的几乎一切財物的使用、享受和支配是一回事。掌握权力的人就握有特权，并間接地掌握着財产。因此，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那些想牺牲别人而让自己过寄生虫生活的人，就是以权力或政治作为一种职业。

在革命前，共产党的党籍是表示一种牺牲，做一个职业革命家是一种无尙的光荣。而現在，党的权力已經巩固，党籍就表示屬于一个特权阶級的人，而党的核心人物就是掌握全权的剝削者和主人。

共产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制度曾把它們眞正的性质隐瞞了一段很长的时期。社会主义的术語，而更重要的是財产所有权的新的集体形式，曾掩飾了新阶級的出現。其实，所謂社会主义所有权不过是眞正的政治官僚所有权的假面具。并且，起初这个官僚集团忙于完成工业化，而把它的阶級成分隐藏在假面具里。

四

現代共产主义的发展，以及这个新阶級的出現，从那些推动这两件事的人的性格以及他們所扮演的角色来看，是很明显的。

从馬克思到赫魯曉夫，共产党的領袖以及他們所用的方法都各不相同，而且在不断更易。馬克思从未阻止別人发表他自己的观念。列宁容忍党內的自由討論，并且沒有想到党的集会，更不用說党的領袖，应該規定誰的意見"适当"或"不适当"。斯大林則廢止一切形式的党內討論，并且規定只有党中央，或者說他自己，有权就意識形态发表意見。其他的共产主义运动就不同。例如，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即所謂第一国际），并不是以馬克思主义为意識形态，而是一个許多团体的联盟，只采納大家所同意的决議案。列宁的党是使內部的革命道德和单一的思想結构同某种民主結合起来的先鋒队。在斯大林的領导下，党变成了一群对意識形态沒有兴趣的人，他們的思想全是从上級得来的，可是，他們却全心全意地一致維护那保证他們享有无

可置疑的特权的制度。实际上，馬克思并未創造一个党；列宁摧毁了包括社会党在内的所有其他的党，只留下了他自己的党。斯大林甚至把布尔什維克党降了一級，把党的核心轉变为新阶級的核心，并把党轉变为无人性的和沒有生气的特权集团。

阶級的作用和社会中阶級斗爭的作用本身虽然不是馬克思发現的，但他創造了一套关于这类作用的学說，他还认为，人类大多数是由阶級身份分明的成員构成的，虽然在这一点上他只是在重述特倫斯（Terence）的禁欲派哲学："我知道人类的一切事物。"列宁认为，人們都各有其观点，而不把人看做阶級身份分明的成員。而在斯大林看来，人不是听命的臣僕，就是敌人。馬克思作为一个穷困的侨民死于倫敦，不过有学問的人看得起他，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上也受重視；列宁是作为历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一的領袖而逝世的，但同时他也是一个独裁者，那时人們已經开始把他捧成一个偶像；当斯大林逝世时，他已經把他自己变成一个神了。

这些人的性格上的轉变不过是早已发生的轉变的反映，并且正是共产主义运动灵魂的改变。

尽管列宁并未意識到，但組成新阶級这件事却是由他开始的。他根据布尔什維克路綫建党，并且发展了关于党在建設新社会中的特殊作用和領导作用的理論。这不过是他从事的多方面的巨大工程的一个方面；这是出自他的行动而并非出自他的心願的一面。这也是导致新阶級敬爱他的一面。

然而，这个新阶級眞正的直接創始人却是斯大林。他是反应迅速而好弄粗俗幽默的人，受教育不多，也不善于詞令。不过，他却是一个无情的教条主义者和偉大的行政家，他是一个格魯吉亚人，他比誰都了解大俄罗斯的新权力将把这个国家带往何处。他以最野蛮的手段創造这个新阶級，甚至对这个新阶級

本身也不惜牺牲。这个阶級把他放在最高的地位，而后来就不免屈从于他那不羈而残暴的性格。当新阶級正在建立它自己并攫取权力时，他是这个阶級的真正領袖。

这个新阶級誕生于共产党的革命斗爭时期，发展于工业革命时期。沒有革命，沒有工业，这个阶級的地位就不会稳固，其权力就会受到限制。

当苏联在推行工业化时，斯大林开始采用差異相当可观的工資制，同时，又听任各种特权继續发展。他认为，如果不让这个新阶級在工业化过程中对物质发生兴趣，使他們得到若干財产，这个运动就不会有任何成就。沒有工业革命，这个新阶級将会发現难以保持其自身的地位，因为旣沒有历史原因，也沒有物质資源来維持它的继續存在。」

党員，或者說官僚集团的成員人数的增加是和这一点有密切关联的。1927 年，即工业化开始的前夕，苏联共产党共有党員 887,233 人。到 1934 年第一次五年計划結束时，党員已增加到 1,874,488 人。这是显然与工业化有关系的一种現象，这个新阶級的前途及其成員的特权都在漸入佳境。而且，特权和新阶級比工业化发展得还要快。虽然很难举出統計数字来证明这一点，不过，如果有人記得下一事实，那末这个結論就不証自明了，这个事实就是生活水平跟不上工业生产，而这个新阶級实际上却已攫夺了由于群众的牺牲和努力而得来的大部分經济果实和其他方面的果实。

新阶級建立的过程并不順利。它遭遇到既存阶級以及那些无法使現实与其所奋斗的理想調和的革命者的激烈反对。在苏联，革命者最显著的反对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間的冲突可以看得最清楚。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以及这个新阶級的政治权力和經济特权的增加，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冲突，或者說，党內反对

派和斯大林之間的冲突，以及共产党政权与农民之間的冲突則愈来愈紧張。

托洛茨基是一位卓越的演說家，优秀的作家，熟练的辯論家，是一个很有修养而极有智慧的人，他仅缺乏一項品質：現实感。当現实已强烈要求进行平凡的工作的时候，他还要做个革命家。他希望复兴革命党，因为它正在变得面目全非，正在轉变为一个不顾偉大理想而只关注日常生活享受的新阶級。当新阶級早已結实地掌握大权并开始尝到特权的甜头时，他却指望那早已疲于战爭、饥餓和死亡的群众有所行动。托洛茨基的火炬照亮了遙远的天空；但是他不能再在疲憊的人間燃起烽火。他銳利地注意到新現象的悲慘面，但他沒有了解它們的意义。再則，他从来不曾是一个布尔什維克。这是他的弱点，也是他的德行。在以革命的名义攻击党的官僚集团时，他攻击了党的偶像和这个新阶級，尽管他并沒有意識到后者的存在。

斯大林既不看得太前也不看得太后。他把自己放在这个正在誕生的新权力——新阶級、政治官僚和官僚主义——的頂峯，变成它的領袖和組織者。他并不傳道，他只作决定。他也許諾光明的未来，不过，他所許諾的只是官僚們认为眼光所能見的眞实可靠的前途，因为他們的生活在天天改善，他們的地位在日益巩固。他的話既不热烈也不渲染，不过，这个新阶級比較能了解这种現实的語言。托洛茨基希望把革命扩張到欧洲；斯大林并不反对这个主意，可是，这种冒險举动总不免使他为他的祖国俄罗斯担忧，特别是为巩固新制度和加强俄罗斯国家的权力和威望的方法担忧。托洛茨基是旧日革命的人物，斯大林則是今天的，因而也是明天的人物。

在斯大林的胜利中，托洛茨基見到反对革命的、类似法国革命中热月党式的反动，实际上也就是对苏維埃政府的腐敗和革

命目标的反对。他了解斯大林的卑鄙手段，并对此深为难受。托洛茨基是第一个发現当代共产主义本质而企图挽救共产主义运动的人，虽然他并不自知。不过，他并沒有能彻底认清其面貌。他以为这只是一时的現象，是官僚集团的积弊腐化了党和革命，因而他的結論是：来个"宫庭革命"把上层变更一下就可以解决。然而，当斯大林死后"宫庭革命"确已发生的时候，我們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本质并沒有任何改变，因为其中有些东西是比較根深蒂固、寿命經久的。斯大林的苏維埃热月党式的革命不只导致一个比以往政府更专制的政府的建立，并且还导致一个新阶級的建立。这是那个激烈的外国革命的延續，这个革命已經不可避免地产生，而且使新阶級得到了巩固。

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斯大林至少有同等的資格倚仗列宁以及革命的一切。因为斯大林本是列宁和十月革命的合法后裔，虽然他为人狡黠。

列宁这样的人物是史无前例的，以他的多才多能与坚忍不拔創造出人类历史上几个最偉大的革命之一。斯大林这样的人物也是史无前例的。他在权力和財产方面担負起巩固新阶級的巨大工作，这个新阶級是从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和最偉大的革命之一中产生出来的。

* * *

在充滿热情和思想的列宁的背后，站着迟鈍而灰暗的約瑟夫·斯大林，他是新阶級以艰难、殘暴和不顾道德的方式取得政权的象征。

在列宁和斯大林之后，发生了必然要发生的情况：即集体領导形式所表現的平庸状态。并且貌似誠恳、善良而缺乏智力的"人民的人"尼基塔·赫魯曉夫也来了。这个新阶級不再需要它曾經一度需要过的革命家或教条主义者了；它只要赫魯曉夫、馬

林科夫、布尔加宁、謝皮洛夫这类简单的人物就够了，他們的一言一語都代表普通人。新阶級本身已厌倦于教条式的清洗和訓练性的会議。大家都想活得平靜点。这个新阶級已十分巩固了，它現在必須設法保护自身，甚至防范其所拥戴的領袖。当这个阶級还是很弱的时候，当残酷的手段还必須用来对付阶級內部的異己分子时，斯大林依然能高踞其領袖宝座。如今，这一切都不需要了。这个新阶級絲毫未放棄斯大林領导下所創造的一切，可是，它看来却在否定斯大林过去几年中的权威。不过，它并不是眞正在否定斯大林的权威，它所反对的只是斯大林的手段，这种手段在赫魯曉夫看来是伤害"好共产党員"的。

列宁的革命时代为斯大林时代所代替，在斯大林时代中，权威、所有权和工业化都加强了，以致这个新阶級能开始其非常渴望的和平而舒适的生活。列宁的革命的共产主义被代以斯大林的教条的共产主义，接着，又被代以非教条的共产主义，即所謂集体領导或一群寡头政治的执行者。

这是新阶級在苏联发展的三个阶段，也是俄罗斯共产主义（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命运在于这三个阶段都集于铁托一身，不过附带着民族的及个人的特性而已。铁托是一个偉大的革命家，但沒有創造性思想；他已經得到个人的权力，但沒有斯大林的猜疑和教条主义。像赫魯曉夫一样，铁托是人民的一个代表，那就是說，是党的中間阶层的代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所走的路綫——从革命成功，模仿斯大林主义，直到否定斯大林主义并寻求自己的形式——是能完全从铁托的性格中看出来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比其他各国的共产党都更能首尾一貫地保持共产主义的实质，直到目前为止，它还沒有否定过任何对共产主义的实质有价値的形式。

不論是就实质或观念而言，这个新阶級发展的三个阶段——从列宁、斯大林到"集体领导"——并不是完全彼此脱节的。

列宁也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斯大林也是一个革命家，就像集体領导在必要时也将訴諸教条主义和革命手段一样。再则，集体領导的非教条主义原則的应用也只限于这个新阶級的巨头們本身。另一方面，人民依然得受教条"教育"，或者說，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而且比过去还要彻底。由于教条主义的严酷性和排他性的束縛已經放松，經济地位已經巩固的新阶級，在未来行动上已可望有較大的伸縮性。

共产主义的英雄时代是过去了。共产主义偉大領袖的时代已經結束。現实人物的时代正在开始。新阶級已經建立。如今它在权力和財富方面正处于巔峰状态，不过，它缺少新观念。它再沒有什么东西可以向人民宣揚了。所剩下来的事，只是它为它自身辯护而已。

五

我們所以要在这里肯定这一事实，指出当代共产主义所蘊含的不只是临时的独裁和专断的官僚政治，而且一个享有所有权和具有剝削性的新阶級已經产生，完全是因为过去有些反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包括托洛茨基和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在內，曾把統治阶层描述为一种过渡的官僚主义現象，认为这是那个尚在嬰儿时代的理想的无阶級社会所必須忍受的折磨，就像資产阶級社会在克倫威尔和拿破侖的专制下不得不受蹂躪一样。这两回事必須分清。

这个新阶級确是一个具有特殊成分和特殊权力的新阶級。

不論根据哪一个关于阶級的科学定义，甚至根据馬克思主义的定义，即依照生产上的特定地位，某些阶級較其他阶級低，我們总可以得到一个結論：在苏联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中，一个作为握有所有权的人和剝削者的新阶級已經存在。这个新阶級的最大特色是它的集体所有制。共产主义的理論家断言，并且有些人甚至相信，共产主义已經达到了集体所有制。

在早先的一切社会中曾存在过各式各样的集体所有制。所有古代东方的专制制度都是基于国家或者說国王的財产高于一切这一点。在埃及，直到公元前十五世紀后，可耕土地才变成私有物。在上述时期以前，只有住宅及四周的附屬建筑物才归私人所有。国家的土地由国家官吏管理，分別佃給农民耕种而后課收租税。渠道与設备以及一切重要工程都屬国家所有。直到公元第一世紀埃及失去其独立为止，国土內的一切都屬国家所有。

这一事实有助于我們了解埃及的法老以及古代东方各国的专制帝王何以受到人民的膜拜。这种所有权也使我們了解，像庙宇、陵墓、皇帝的城堡，以及运河、道路和堡垒等类的巨大工程何以能够修建起来。

罗馬把新征服的土地当做国家的土地，并拥有相当可观数目的奴隶。中世紀的教会也有集体財产。

直到股份有限公司組織出現时为止，資本主义本质上就是集体所有制的敌人。尽管資本主义无法抗拒集体所有制活动区域的扩張以及它所造成的新的侵凌，但它今后依然是集体所有制的敌人。

集体所有制并不是共产党人发明的，不过，他們却发明了这一制度的包罗万象的特性，比以前时期的一切集体所有制都包罗得多，甚至連法老的埃及都赶不上。共产党人的发明仅此而已。

这个新阶級的所有权及其特性是經过一段时期才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它也在經常改变。起先，国內只有少数人觉得需要把全国的一切經济力量都集中在一个政党手里，以使有利于推行工业改革。作为无产阶級先鋒队及“最开明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党要求这种經济权力的集中，但这只有通过所有权的轉变才能办到。这种改变在事实上和形式上首先是大企业的国有化，然后輪到較小的企业。可是，如果沒有社会的管理者和財产的分配者的特殊身份，共产党人就不能把他們自己轉变为一个新阶級，这个新阶級更不能形成并长期存在。物資逐漸被收归国有，但事实上由于他們有权使用、享受和支配这些物資，于是所有的国家財产就成了党內某一个明显的阶层以及环繞这个阶层的官僚的財产。

鉴于所有权对其权力的意义（以及所有权本身果实的意义），这批党官僚自然就連小規模的生产单位也不能放松，而也将它們收归国有。由于它所持的是政治极权主义与經济壟断主义，这个新阶級不免觉得凡在它控制和管理以外的东西都是作战的对象，因此一定要把它們摧毁或征服。

在农业集体化前夕，尽管苏維埃政府当时并沒有遭到在政治上和經济上都很渙散的农民的严重反对，斯大林就說：“誰战胜誰”的問題已經被提出来了。只要国內尙有其他的有产者存在，这个新阶級就会感到惴惴不安。它不能冒食物供应或农业原料遭到破坏的危險。这是共产党要向农民进攻的直接理由。然而，还有第二个理由，这是有关阶級的理由：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农民可能危害这个阶級。因此，这个新阶級不得不使农民在經济上和行政上同时处于从屬地位；通过集体农庄和拖拉机站而达到了控制农民的目的。但这就需要新阶級的成員在农村中有所增加。結果，官僚也布滿了农村。

由于夺取了其他阶級的財产，特別是小业主的財产，而导致的生产萎縮和經济混乱，对这个新阶級是沒有影响的。像历史上其他的各种有产者一样，对这个新阶級最重要的事是所有权的获得和巩固。这个新阶級可从新取得的財产获得利益，尽管国家因此而受到了損失。如果新阶級要稳掌政治权力和經济所有权，农民財产的集体化就不可避免，虽然在經济上并不合算。

我手头并无可靠的統計数字，但所有的证据都证实：目前苏联每亩土地的平均生产量并沒有超过沙皇时代俄国的生产量，家畜的头数还赶不上革命前的数量。

在农业生产和家畜上的損失是能够計算的，而在人力上，在被送入劳动营的千百万农民身上的損失是不可計算的。农业集体化是一場駭人的毁灭性战爭，簡直像一件瘋狂的举动，唯一的好处是从此这个新阶級的权威有了保障。

通过国有化、强迫合作化、重税以及价格的不平等种种方法，私人所有制被毁灭而轉变为集体所有制。从心理、生活方式、以及党員物质地位等的改变上，也可以证实这个新阶級所有权的确立，这些改变是由他們在权力阶梯上所占有的位置决定的。他們有的是郊外別墅，华厦美居，精巧的家具及其他的設备；最高級的官僚，这个阶級的精华，还有专用的居住区和特設的疗养院。某些地区的党书記和秘密警察首領不仅成为最高的权威，而且享有最好的住宅、汽車以及类似的特权。以下各級官僚則按地位的高低，分享各有等差的特权。国家的預算、“礼物”、为国家及其代表的需要而兴建或重建的建筑等，都是使政治官僚們受惠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只有当新阶級无法維持它所篡夺的所有权时，或这种所有权的代价太大，或者有政治性危險时，新阶級才不得不将所有权轉让給其他阶层，或者制造出其他所有权形式。例如农业集体

化在南斯拉夫被放棄了，这是因为农民抗拒集体化，而且因为集体化引起的生产逐步下降构成了共产主义政权的潜在危机。然而，在这种种情况下，新阶級从未放棄它再度攫取所有权或重新实行集体化的权利。新阶級不能放棄这种权力，因为如果它放棄了这种权力，它就不再具有极权主义和壟断主义的性质了。

单是官僚政治就不会如此頑固地坚持其目标。只有掌握新形式的所有权并沿此途徑趋向新的生产形式的人，才会如此固执。

馬克思早就預知，无产阶級在胜利后将会遭遇到从被推翻的阶級和它自己的官僚方面来的危險。当共产党人，特别是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批評斯大林的行政与官僚方式时，他們通常都援引馬克思的先見。可是，当今发生于共产主义国家的一切与馬克思很少有关联，当然更与此項先見无关。馬克思曾想到寄生的官僚膨脹的危險，这也是出現于当今共产主义国家中的事实。但他从未想到，今日共产党人中的有力人物就是他所想到的官僚，他們在經管并支配物資时，为自己小集团的打算实有过于为整个官僚阶层的打算。在这种情况下，不論是批評这个新阶級中的各阶层的浪費奢华或者行政不良，共产党人总会把馬克思作为一个很好的借口。

当今共产主义制度并不只是某种类型的政党，或从壟断性所有权及国家对經济作过分干預中产生出来的官僚集团。最重要的是，当代共产主义最主要的一面，是这个所有者兼剝削者的新阶級。

六

尽管一个阶級的得势是有組織地进行的，而且还伴随着自

觉的斗争，但沒有一个阶級单是由自己的行动确立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新阶級也是如此。

因为新阶級同經济和社会結构的关系微弱，并且因为它必然发源于一个政党中，所以这个新阶級就不得不尽可能建立其有級織的結构。最后，它又不得不从早年的教条中作有計划和有意識的撤退。因此，这个新阶級在組織上和阶級意識上比历史上任何阶級都高。

当然这种說法只是相对說来有它的眞实性；意識和組織結构是必須就它与外在世界及其他阶級、权力和社会力量的关系联系起来看的。在历史上，沒有任何阶級在保卫自己并控制其所掌握的一切时——集体和壟断性质的所有权与极权的行政权力——是如此团結和一心一意的。

而在另一方面，这个阶級也是最自欺的、最不自觉的。每一个資本家或封建地主都自觉他是屬于某一个特定社会阶級的。他通常还相信他这个阶級是注定要使人类快乐的，并且相信，如果沒有这个阶級，混乱和毁灭就会跟着来。这个新阶級的共产党員也相信，沒有他的党，社会将要倒退和解体。不过，他并不认为他屬于一个新的所有权阶級，因为他并不认为他自己是有产者，因而，也不承认他享受什么特权。他以为他只屬于一个具有限定的观念、目的、态度和任务的团体。他所看到的就只是这些。他看不出他同时也屬于一个特定的社会阶級：所有权阶級。

集体所有制的作用在于削弱阶級，同时，使这个阶級不感觉到它的阶級实质，并且，集体所有者中的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是独特地屬于一个将廢除社会各阶級的运动。

拿这个新阶級的其他特性与其他所有权阶級一比，我們就会发現他們之間有許多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这个新阶級是貪婪的而不能滿足的，就像資产阶級一样。不过，它并无資产阶級

所具有的朴素和节儉的美德。新阶級的排斥異己正像貴族阶級一样，但沒有貴族阶級的教养和騎士風格。

这个新阶級也有胜过其他阶級的优点。因为它的內部比較团結，所以它比較能够作較大的牺牲并取得輝煌成就。个人完全服从整体；至少，現有的理想要求他們这样做，甚至在向外自寻較好出路时也得服从整体。这个新阶級有足够力量去从事物质的及其他方面的冒險，那是其他阶級从不能办到的。由于它占有全国的物資，这个新阶級能够为它所标榜的目的作宗教性的奉献，并且指揮人民的全部力量来促使达到这些目标。

这个新的所有权并不就是政府，但它是由那个政府創造并得到那个政府的帮助的。財产的使用、享受和支配是党以及党的領袖們的特权。

党員們觉得，他們的特权是与权威和控制財产权一起来的。于是，野心勃勃，口是心非，奉承和嫉妒必然日見增加。追求地位和官僚集团的膨脹是共产主义的不治之症。因为共产党人已把他們自己轉变为有产者，并且因为只有通过对党，对这个阶級，对“社会主义”表示“忠誠”，才能取得政治权力和經济特权，于是，野心勃勃就成为主要的生活方式之一，也是发展共产主义的主要手段之一。

在非共产主义制度中，追求地位和野心勃勃是身为官僚必有好处的标記，或者，那就表示有产者已变为寄生分子，因此財产的管理得交給雇員。在共产主义制度中，追求地位和野心勃勃所证明的事实是：那儿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驅使官僚們爭取所有权和特权，也就是爭取物資和人的管理权。

在其他的掌握所有权的阶級中，阶級成員并不等于是某項特定財产的所有人。而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所有权既是集体的，其情形便不是如此。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成为一名有所有权的

人或有集体所有权的人，只要他进入政治官僚的統治集团就够了。

在这个新阶級中，就像其他的阶級一样，經常有人跌下去，同时有人爬上来。在有私人所有权的阶級中，个人把财产留給他的子孙。在这个新阶級中，除了希望后人能向上爬以外，什么财产都傳不下去。这个新阶級实际上是不断地从最底层和最广大的人民中建立起来的，而且它經常在变动。尽管在社会学理論上能指明誰屬这个新阶級，但事实上却很难这样做；这个新阶級是滲入在人民中，滲入在其他低层阶級中的，它是經常在变的。

在理論上人人有机会爬到頂峰，就像每一个拿破侖的士兵都在他的背囊上带有一根将軍的指揮棒一样。走向上进之路的唯一条件是对党和新阶級的忠誠和絕对效忠。新阶級底层的大門是敞开着的，但愈往上去則愈窄狹。想向上爬的人不只要有欲望，还需要有了解和发揚敎条的能力，在对敌斗爭中坚定不移，在党內斗爭中要有无比的机灵与聪明，而且还得有巩固阶級的才能。許多人在这些方面力求有所表現，但被选中的只有极少数。虽則新阶級在某些方面对局外人的开放有过于其他阶級，但它的門禁比别的阶級更为森严。由于这个新阶級的最重要的特质之一是权威的独占，所以这种排他性因官僚体統的偏見而加强。

不論在何时何地，忠誠的人从来沒有享有較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更寬的出路。但是，爬到頂层的困难也是以共产主义制度为最甚，从来沒有一个制度要竞爭者作这样多的牺牲，需要有这样多的殉难者。一方面，共产主义显得寬大仁厚；而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則甚至对自己的党徒也会排斥和不容忍。

七

共产主义国家中有一个新的所有权阶級并不能解釋共产主义国家的一切，不过，这是了解共产主义国家中，特别是苏联，定期发生的变化的最重要的关鍵。

这并不是說，为了确定在特定环境中所发生的变动的影响范圍和意义，对于各别共产主义国家中以及整个共产主义制度所发生的每一种变动必須分开来研究。可是，要了解各个变动的影响与意义，必須尽可能把这个制度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

指出当年发生于集体农庄的事将帮助我們了解苏联最近的变动。集体农庄的建立与苏維埃政府对它們的政策清清楚楚地說明了新阶級的剝削本质。

斯大林并不认为集体农庄是"合理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赫魯曉夫也如此。集体农庄的存在，正表示这个新阶級沒有能把农村的管理权完全夺过来。通过集体农庄和强迫收购粮食的制度，新阶級已使农民处于从屬地位，并且搶走了农民收入的大部分，不过，新阶級还未能全权控制土地。斯大林完全明白这一点。在他死前，他曾在《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問題》一书中推测集体农庄应該变为国家財产，那就是說，官僚应該成为集体农庄的眞正的所有者。尽管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濫行清洗，然而，他并不否定斯大林对于集体农庄财产权的意見。赫魯曉夫上台后，派了三万名党的干部，他們大部分都任集体农庄的主席，这不过是追随斯大林政策的措施之一。

就像斯大林統治下的政权一样，赫魯曉夫新政权在执行所謂自由化政策时，实际上就是在扩張这个新阶級的"社会主义的"所有权。經济权力的分散并不表示所有权的变动，只是給

与新阶級的低級官僚阶层以較大的权利。如果所謂自由化政策和經济权力的分散还有什么其他意义，那就是在政治权利上，至少有一部分人民可以对物資的处理发生一些作用。至少，人民将有权批評寡头政权的专断。但这就会引起一种新的政治运动的出現，虽然它不过是一种忠貞的反对派而已。然而，这一点現在甚至还沒有人提起，就像还沒有人提起党内民主一样。自由化和分权的有效范圍只及于共产党員，首先是及于寡头集团，即这个新阶級的領袖們，其次才惠及較低的干部。这是适应变动中的环境而必然产生的新方法，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幷巩固新阶級的独占所有权和极权的行政权。

在共产主义国家存在着一个新兴的、享有所有权的、壟断性的极权阶級，这一事实就导致如下的結論：凡是共产党的首脑所倡导的改变，首先是取决于新阶級的利益与願望；像其他的社会集团一样，新阶級的一举一动，或守或攻，都带有增强其权力的目的。然而，这幷不是說，这类变动对其余的人民就不是同样的重要。尽管这新阶級本身所主动要求的变化尙未在实质上改变共产主义，但这些变化的意义却不能低估。为了确定这些变化的范圍和意識，我們必須对它們的实质有深入的认識。

像其他的政权一样，共产党的政权必須考虑到群众的心境和动向。由于共产党的排他性以及党內自由輿論的缺乏，这个政权就无法察觉群众的眞正情况。然而，共产党高級領导人也深知他們的不滿。尽管这个新阶級已把持了管理权，但它幷不能免于遭受各种形式的反对。

一經取得政权，共产党就輕而易举地把資产阶級和大地主收拾掉。历史的发展对他們以及他們的財产不利，因而喚起群众反对他們也是容易的事。沒收資产阶級和大地主的財产十分容易，可是当沒收小規模的財产时，就有困难了。共产党人既在

早先沒收財产的过程中取得了权力，所以对于这一困难也是能克服的。于是社会关系很快就澄清了：旧的阶級和以往享有所有权的人都沒有了，社会已"沒有阶級"了，或者說正在走向"沒有阶級"的社会，而且人們已經开始以新的方式生活了。

在这些情况下，要求恢复革命前的关系，如果不是可笑的，也是不現实的。維持旧关系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共产党人把这类要求只当作是笑話而已。

这个新阶級对于人民要求某一特种自由最为敏感，对于要求一般自由或政治的自由則不然。它对于在現状之下和在"社会主义"的范圍內要求思想自由与批評自由也特別敏感；当然对于恢复从前的社会关系和所有权关系的要求却充耳不聞。这种敏感是由这个阶級的特殊地位产生的。

这个新阶級本能地觉得，国家的物資事实上本是它的財产，甚至也觉得"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国家的"財产这些名詞不过是一般法律上的空洞字眼而已。这个新阶級还认为，共极权权威任何一方面的肢解都可能危及它的所有权。所以这个新阶級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表面上是为了保持"社会主义的"所有权。对新阶級壟断財产管理权的批評引起了一种恐惧，它怕可能就此失去权力。这个新阶級对于这方面的批評和要求的敏感，由它們对新阶級統治与行使权力的态度揭露到什么程度而定。

这是一个重要的矛盾。財产在法律上被认为是社会的和国家的，但实际上却由一个小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加以經管。名实不符的情况不断地造成糊模不清的、不正常的社会和經济关系。这也就是說，領导集团是言行不符的，他們的全部行动就在于巩固其財产所有权和政治地位而已。

如果不危及这个新阶級的地位，这个矛盾是不能解决的。其他的統治阶級和有产阶級也不能解决这种矛盾，除非以强力

剝夺其独占的权力和所有权。如果整个一个社会有較高度的自由，統治阶級就会被迫以种种方式放棄其对所有权的独占。这句話倒过来說也是对的：当独占所有权成为不可能时，某种程度的自由也就必然会出現。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政权和所有权几乎总是由同一集团掌握，不过，这个事实竟被法律的面具所隐蔽。在古典的資本主义下，尽管工人是被剝削者而資本家是剝削者，但在法律面前，工人和資本家是平等的。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在法律上說，物质方面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形式上的所有者是国家。但在实质上，由于行政权的壟断，只有极狭小的行政者阶层享有所有权。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对自由的任何眞正要求，任何一种击中共产主义本质的要求，归根結蒂就在于要求物质和財产的关系符合法律的規定。

国家所生产的主要物資由社会經管要比由私人壟断或由一个私人所有者經管更为有效，因此国家的主要物資就应該交社会控制，并由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去行使控制权。基于这一观点所提出的要求必将迫使新阶級采取行动，不是对其他的势力让步，便是悍然丢掉假面具，承认其統治和剝削的特质。这个新阶級运用权威及行政特权而創造出来的所有权和剝削方式，是一种連这个阶級自己也不敢承认的体制。这个新阶級岂不是在强調，它以整个国家的名义运用权威和行政职权都是为了保存国家財产嗎？

这使得这个新阶級的法律地位不稳定，并且这也是新阶級最大的內在困难的来源。这一矛盾暴露了新阶級的言行不符：它一面許諾廢棄社会差別，一面却又必須不断地夺取国家工厂的产品并賜予其党徒以种种特权，来增加社会的差別。这个阶級虽然不得不大声宣揚其教条，說它正在完成历史使命，“一劳

永遠"地把人类从不幸与災难中解放出来，而在实际上則恰恰反其道而行。

这个新阶級的眞正的所有权地位和其法律地位間的矛盾是最引起批評的基本原因。这个矛盾不只会招惹他人的批評，而且也引致該阶級內部的不滿，因为实际上眞正享有特权的只是极少数几个人。当这种矛盾紧張时，不管統治阶級願意与否，就有促使共产主义制度眞正改变的可能性。这个矛盾太明显了，这一事实迫使新阶級不得不作一些改变，特别是像所謂自由化和权力分散一类的改变。

这个新阶級之所以肯被迫而对个别阶层作一些退让，其目的无非是遮盖这个矛盾幷巩固其地位。由于这些让步依然无损于它的政权和所有权，新阶級所采取的措施，甚至包括那些含有民主色彩的措施在內，都显示其加强政治官僚治理权的傾向。共产主义制度已把民主措施轉变为巩固統治阶级地位的积极手段。在古代的东方各国，奴隶制度不可避免地滲透到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成分中，連家庭也不能例外。同样地，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統治阶級的壟断主义和极权主义也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尽管其政治首脑幷无意如此。

南斯拉夫所实行的所謂工人管理和自治，是在进行反苏維埃帝国主义斗爭期間想出来作为剝夺党壟断行政权的影响远大的民主措施，現在已日益成为党的工作的一部分了。所以要改变現有的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想通过这种类型的行政来創造一个新的民主制度是办不到的。此外，也无法把自由給予大多数人。工人管理幷未能使生产者自享其生产的利益，在国家的层次上未分到，在地方企业单位层次上也未分到。这种形式的行政制度已日益成为保障这个政权的可靠形式。通过各种賦稅及其他方法，这个政权甚至榨取了工人所认为应該分給他們

的利潤。留下給工人的只是桌上剩下的面包屑和幻想。如果沒有普遍的自由，那末即使工人自行管理也是不能带来自由的。显然，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中，沒有人能自由地决定任何事。当施予者好像是把自由当礼物送給工人时，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施予者自己。

这并不是說这个新阶級不会对人民让步，尽管它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工人管理或权力分散就是对群众的一种让步。不管它是如何壟断和如何极权，环境可以驅使这个新阶級在群众面前退却。当1948年南斯拉夫和苏联发生冲突时，南斯拉夫的領袖們被逼执行一些改革。尽管可以說这是一种退一步的做法，可是当他們見到自己的危机时，他們就着手改革。今日东欧国家也正在发生着类似的变革。

为了維护其政权，每当情势明显到使人民能看出这个新阶級正在把国家的财产当作自己的私有物时，这个統治阶級不得不从事改革。他們并不把这些改革的眞相宣布，而是把这些改革說成"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部分。当上述的矛盾大白时，改革的基础就奠定了。从历史的观点看，尽管这个新阶級一直在逃避事实，但它总是經常地被迫保卫其政权和所有权。它必須經常地证明，它是如何成功地創造着一个幸福人民的社会，人人都享有平等权利，并且已經廢除了一切形式的剝削。这个新阶級不免經常地陷入内部矛盾的深淵；因为不管其历史根源如何，它总不能使它的所有权合法，同时，它又不能放棄所有权而毁灭自身。因此，它总是被迫假借抽象而不眞实的目的来为它日漸增长的权威辯护。

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人民控制得最全面的一个阶級。正因为如此，这是一个最缺乏眞知灼見的阶級，它的观点是假的，靠不住的。当新阶級力量充沛、大权在握时，它必然对它自

己的作用以及它周圍人民的作用作不真实的估价。

在工业化完成后，这个新阶級除了加强其暴力統治幷洗劫农民外，就无事可为了。它不再創造了。它的精神傳統已被黑暗所替代。

虽然这个新阶級完成了革命中最偉大的一次胜利，但其統治方式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后人将贊叹这个阶級所完成的宏偉的冒險，同时，也将为它在完成其冒險事业时所用的手段而感到羞耻。

当这个新阶級退出历史舞台时——这一天是必然要到来的——人类对于它的逝去将比对以往其他阶級的逝去更少有惋惜之感。除开利己的东西外，使一切都窒息而死，因此它就必然会使自己遭到失敗和可耻的毁灭。

第四章　党的国家

一

尽管共产主义的权力机构导致世界上最巧妙的暴虐統治和最殘酷的剝削，但它或許可以說是最簡单的权力机构。它之所以簡单，是由于整个政治、經济及意識形态活动都以共产党一个党做骨干。整个国家的公共生活是停滞或前进，是倒退或轉向，完全由党的会議决定。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人民可以迅速地領悟到，他們許可做什么，不許可做什么。法律和条例对他們并沒有根本的重要性。有关政府和人民間的关系的实际和不成文的規則反而重要。不管法律怎么說，每一个人都知道，政府是在党委員会和秘密警察手中。虽然并沒有明文規定党的"指导作用"，但党的权威則及于一切組織和地区。沒有一条法律曾規定秘密警察有权控制人民，但是，警察握有一切大权。沒有一条法律規定司法官和檢察官应該受秘密警察和党委員会的控制，但他們事实上是受控制的。絕大多数人民都知道这一事实。任何人都知道，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以及某些事由誰决定，另一些事又由誰决定。人民只是适应环境和实际情况，一切重要事务唯党会議或由党控制下的机构的馬首是瞻。

对于社会組織和社会机构的指揮都是用以下的簡单方法：共产党員构成一个党組，这个党組在一切問題上都听命于授权的政治会議。这是理論上如此；实际上是照下列方式进行的：当管理社会机构或社会組織的人在党內也有地位时，在許多較

小的事务处理上，他就可以独断独行。共产党人已熟悉党的制度以及党所創造出来的关系；他們已习惯于裁夺事务的重要与不重要，只有在特别重要的事务上他們才訴諸党的会議。党組的存在只是备而不用，重要的事由党决定；选出政府或某些組織的管理机构的选举人的意见完全不重要。

当共产党准备从事革命时，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和新阶級就早已生根了；共产党人执行和維持权威的方法也发源于革命时代。在政府机关和社会組織中起"指导作用"的就是从前的党小組，只是后来它已經扩大，发展和健全了起来。党在"社会主义建設"中所負的第二个"指导作用"就是关于党在工人阶級中的"先鋒作用"这个陈旧的理論，所不同的只是这一理論对当时社会的意义与目前有所不同。在共产党人夺得政权前，这一理論是号召人們参加革命并建立革命机关所必需的；現在却成了这个新阶級作极权統治的借口。甲起源于乙，但两者却不相同。革命和革命的形式是不可避免的，而对于迫切向往工业与經济进步的人說，甚至是需要的。

在革命时期形成的这个新阶級的极权暴政和控制，如今已变成了驅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特别的革命形式已轉变为反革命的形式。党小組也是如此。

共产党人用以控制社会机构的基本方法有二。第一是党組，这是原則上和理論上的主要方法。第二是政府机构中的某些职务只許由党員担任，这是实际上常用的方法。这些职务包括警察，特别是秘密警察人員，还有外交官員和軍官，特别是負責情报并作政治活动的人員等，这些职务在任何制度的政府中都极为重要，但在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中却尤其重要。早先，在司法机构中，只有最高的位置才由共产党人担任，因为司法机构从屬于党和警察机构，通常待遇都很低，所以对共产党人沒有

吸引力。可是，目前的趋势却是司法行政人員的職位被視为只有党員才許充任的一种特权，他們的特权也在增加。因此，今后对司法部門的控制如不完全解除，至少也会放松；因为他們已可放心，司法部門将根据党的意志或"社会主义精神"行事。

只有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才把若干专門的和非专門的職位保留給党員。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虽然是一个阶級机构，实质上就是党的政府；共产主义国家的軍队就是党的軍队，而国家也就是党的国家。更确切地說：共产党人有意把軍队和国家当作他們的专用工具。

只有党員才能任警察、軍官、外交官及类似的重要職位，或者只有党員才能眞正行使权威，这是共产主义国家特有的不成文法；于是一种特殊的享有特权的官僚集团被制造出来了，政府和行政机构也因此而单純化了。这样，党組便扩大了，并且或多或少地包罗了上述各項工作。結果，既然这些工作已成为党的活动的主要領域，党組也就消失了。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政府机构和党組織之間并沒有基本的差别，党和秘密警察的关系便是例证。在他們的日常活动中，党和警察紧密地混在一起，两者的差别只在于所分配的工作不同。

整个政府結构都是以这种方式組成的。政治職位完全保留給党員。甚至在非政治性的政府机构中，共产党人也占有当权地位或者負有监督之責。党中央召集一次会議或者发表一紙文告就足以推动整个国家和社会机构。如果有任何地方发生困难，党和警察就会很迅速地糾正"錯誤"。

二

共产党的主要特质已經討論过了。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特

色有助于对共产主义国家本质的了解。

共产党所以有其独特的性质并不只是因为它是革命的，中央集权的，遵守軍紀的，以及其他确定的目标，或有什么别的特性。其他政党也有类似的特色，虽然共产党的特色要比它們强烈些。

然而，唯有共产党要求其党員必須具有"意識形态的統一"或在世界观和社会发展的观点方面具有一致的看法。这只是限于有資格出席高級会議的党員。至于低級干部，則只需在执行上級的命令时对統一的意識观点尽口头傳达的义务。然而，趋势却是要下級干部調整理論水平，以符合領导人物的思想。

列宁并不认为党員都应持完全相同的观点。而事实上，他却駁斥和反对一切看来不是"馬克思的"或"党的"观点；那就是說，凡是不能以列宁原先所設想的方式强化党的观点都在被駁斥之列。但是，他对付党內反对派的态度和斯大林不同，因为列宁并不杀害他的下屬，而"仅仅"压服他們。在他当权时，党內言論自由和选举自由是存在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当时还沒有确立。

斯大林在要求全体党員具有作为共同基础的政治上的統一以外，还强迫要求全体党員在意識形态上一致（包括强迫的哲学思想及其他思想）。实际上这是斯大林对于列宁有关党的学說的貢献。早在斯大林的青年时代，他已形成强迫意識形态一致的观念；在他当政时，划一性是所有共产党的不成文的必要条件，并且一直到現在还是如此。

南斯拉夫的領袖过去和現在都是抱着同样的观点。他們依然受苏維埃"集体領导"和其他各国共产党会議的影响。这种坚决不肯放棄党的强迫思想統一，正說明根本变化还沒有发生，而是证实了在今日的"集体領导"下，自由討論根本不可能，或者說

只能限于极其有限的范圍内。

在党内强迫实行一致的意义何在？它将导向何处？

强迫一致的政治后果是严重的。任何政党的权力都是在領袖和高級党代表会議手中，共产党尤其如此。意識形态的一致既作为是一种必需条件，特别是在中央集权和党紀严如軍紀的共产党中，就必然会以党中央的权力控制党員的思想。尽管在列宁时代，意識統一的达成是通过党的高級領导人的会議，但斯大林却要由他自己規定。如今，斯大林死后的“集体領导”满足于使新的社会观念不可能产生。这样，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一种专由党的領导人来解释的理論。今天已經沒有其他类型的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其他类型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意識形态統一的社会影响是悲惨的：列宁的独裁是严峻的，而斯大林的独裁却形成极权。取消党内一切意識形态的斗爭，无異是社会上一切自由的終結；因为只有通过党，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見才得以表达。不容其他思想的存在并且武断地假定馬克思主义独有的科学性，就是党的領导壟断意識形态的开始，并終于发展为对整个社会思想的壟断。

党内意識形态的一致，使得共产主义制度内以及社会本身以內都不能产生独立的运动。一切行动都依靠党，因为党对社会的控制是全面的；在党内連絲毫自由也沒有。

像共产主义制度中的其他一切現象一样，意識形态的一致并非突然出現，而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且在党内各宗派爭权期中达到最高峰。在二十年代中期斯大林上台的时候，便开始公开要求托洛茨基摒棄党規定以外的一切观念，这根本不是偶然的。

党内意識形态的一致是个人独裁的精神基础。沒有意識形态的一致，个人独裁是不可想像的。意識形态的一致造成并加

强个人独裁，反过来，个人独裁又造成并加强意識形态的一致。这是可以了解的，观念的壟断，或意識形态的强迫一致，只是个人独裁的补充条件和理論上的假面具。尽管个人独裁和意識形态的一致早在当代共产主义或布尔什維主义发端时已經显著，但現在，它們是和共产主义的整个权力牢固地建立在一起的，因此在共产主义灭亡前，不論作为将来的趋势或一般作为現行的形式，它們将永远不会被廢棄。

对于領导人的意識形态分歧的压制，还使不同的派别和趋向消灭了，从而也毁灭了共产党党内的全部民主。于是，共产主义中的“元首”原則的时代开始了，理論家只限于党内当权的人，不問它們有无足够的智力。

党內意識形态一致的延續是保持个人独裁或像今日苏联少数寡头独裁（数人暫时合作或保持权力平衡）的明确标志。在其他的党派中，我們也发現有要求党內意識形态一致的傾向，在早期的社会主义政党中，这种傾向尤为显著。然而，这毕竟只是这些政党中的一种傾向，但在共产主义政党中，意識形态的一致已变为强迫性。党員不只必須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而且要采納領导上所要求的和規定的某种类型的馬克思主义。馬克思主义已从一种自由的革命意識形态一变而为規定的教条。就像古代东方的专制制度一样，最高权威解釋并規定教条，而帝王就是教条的主要宣揚者。

共产党的强迫意識形态一致虽已經过各种阶段和形式，但依然是布尔什維克党或共产主义政党最根本的特质。

假如这些政党并不同时又是新阶級的发端，假如它們并沒有一定的历史角色去扮演，那末强迫的意識形态的統一也不会在它們当中存在。除了共产党的官僚集团外，在近代历史上，沒有一个阶級或政党曾达到意識形态的完全一致。在以前，也沒

有一个阶級或政党的任务几乎完全是靠政治的和行政的手段来改变社会的一切。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就必須完全而狂热地相信自己意識形态的正确与高貴。这样的任务也必然求助于殘暴的手段以清除其他的意識形态与社会团体，也必然要求壟断社会的意識形态，并使統治阶級絕对団結一致。为了这个理由，共产党就需要超常的意識形态的統一。

意識形态的統一一旦建立，其为害之烈犹如偏見。共产党員所接受的教育是：意識形态的統一或由上級規定意識形态是神圣中的神圣，而党內的宗派主义是最大的罪恶。

如果不同其他社会主义团体妥协，就不能完全控制社会。同样，如果党內不妥协，就不可能达成意識形态的統一。这两者差不多同时发生；在极权主义信徒的心目中，它們是"客观地"一致的，殊不知前者的获得是这个新阶級与它的反对势力妥协的結果，而后者的达成是統治阶級內部妥协的結果。事实上，斯大林明白，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等人并不是外国的間諜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卖国賊。可是，他們与他的意見的不一致显然延誤了极权控制的建立，所以他必須把他們摧毁掉。他在党內的罪恶是他把"客观的不友善"——党內思想意識上和政治上的分歧——轉化为团体与个人的主观罪行，給他們加上他們并未犯的罪名。

三

但这是任何共产主义制度必然要走的道路。建立极权控制或意識形态統一的方法可能不如斯大林严厉，但在本质上总是一样的。甚至，像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这些国家中，它們的工业化并不是建立极权控制的那种形式和条件，但共产党官僚

仍不免被迫在这些落后国家中建立同样形式的权威，正像在苏联所建立的那样。这并不单单是由于苏联把这些国家当附庸国而将这些形式强加在它們的头上，而且也是由于共产主义政党及其意識形态的本质使它們不得不这样做。党对社会的控制，政府、政府机构和党的三位一体，党員发表意見的权利取决于它在特权阶級中所握的实权和所任的职位，这些都是任何共产党官僚集团当权时必有的根本特质。

党是共产主义国家和政府的主要力量。党是一切的动力。党把新阶級、政府、所有权和思想意識在它的內部統一起来。

因此，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軍事独裁是不可能的，尽管看来苏联已經发生过軍事阴謀。軍事独裁将不能控制人民生活的全面，甚至不能暫时說服整个国家需要作例外的努力和牺牲自我。这些事只能由党来完成，并且也只能由坚信这样广闊理想的共产党来完成，这种广闊的理想使党員及其拥护者觉得专制是必需的，是国家和社会組織最高的形式。

从自由的角度来看，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出現軍事独裁就是一大进步。这将标志党的极权控制或党的寡头政治的結束。然而，就理論上說，軍事独裁只有在軍事上遭到失敗或不寻常的政治危險发生时才可能出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必先以党独裁的形式出現，不然，它就得借党作幌子而掩飾軍事独裁的眞面目。但是，这势必导致整个制度的改变。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共产党寡头政治的极权独裁并不是一时政治关系的产物，而是一个長期而复杂的社会演变的結果。极权独裁的改变并不是同一制度下政府形式的改变，而是制度本身的改变，或者是这个制度改变的开始。这种独裁就是这个制度本身，就是这个制度的肉体和灵魂，也是这个制度的本质。

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很快就变为党的領导人的小圈子。所

謂无产阶級专政早就变为一句空口号。造成情况的过程是随着种种因素的必然性和不可控制性而发展的，并且关于党是无产阶級先鋒队这一論点只是加强了这种过程。

这并不是說，在夺取政权的斗爭时期，党不是工人群众的領导者，也不是說当时党不曾为工人阶級的利益斗爭。不过，在当时，党所扮演的角色和所从事的斗爭只是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和形式。尽管党的斗爭帮助了工人阶級，但它也加强了党和未来的当权者以及胚胎中的新阶級的势力。党在取得政权后，就立即控制所有权力并将一切財物抓在手中，揚言自己代表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的利益。除了在革命战爭时期的一个极短的阶段以外，无产阶級并沒有分享权益，它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比其他阶級重要。

这并不是說无产阶級，或其中的某些阶层，对維护共产党的政权沒有暫时的兴趣。农民也曾支持那些揚言有意通过工业化把他們从无望的災难中拯救出来的人。

虽然工人阶級的个别阶层可能临时支持党，但政府不是他們的，而他們在政府中所占的地位对整个社会进步的过程和社会关系并不重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政府从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帮助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級，取得其权力和权利。这也是必然会产生的情况。

工人阶級和劳动群众并不行使政权，但党却以他們的名义在行使政权。在任何政党中，包括最民主的政党在內，領导人所扮演的角色都非常重要，以致党的权威就变为領导人的权威。所謂“无产阶級专政”就是最有利的环境的开始，在这种环境下，无产阶級专政就变为党的专政，而且終于不可避免地演化为領导人的专政。在这种形式的极权政府中，无产阶級专政只是一种为寡头政治的某些执政者辯护的理論上的辯护詞，最多也不过

是他們意識形态的假面具。

馬克思所設想的无产阶級专政是为了无产阶級的利益，指的是在无产阶級范圍內的民主；那就是說，一个政府之內有許多社会主义党派参加。馬克思的結論所依据的历史上唯一的无产阶級专政，即1871年出現的巴黎公社，便是几个党派的联合政府，而馬克思主义的党在其中旣不是最小的也不是最重要的。但直接由无产阶級本身行使政权的无产阶級专政是个不折不扣的烏托邦，因为沒有一个政府能不要政治組織而活动。列宁把无产阶級专政当作他自己一个党的权威。斯大林把无产阶級专政当作他个人的权威，也就是当作他个人对党、对国家的专政。自从这位共产主义皇帝逝世以后，他的継承人便交了好运，他們通过“集体領导”分享了权威。总之，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級专政如果不是一个烏托邦的理想，那就必然是为党的領导核心保留下来的一項特权。

列宁以为俄罗斯的苏維埃，即馬克思的“最后发現”，就是无产阶級专政。在起初，由于苏維埃政府的革命自发性，以及群众的参加革命，苏維埃政府看来似乎就是无产阶級专政。托洛茨基也曾相信苏維埃政府是一种当代的政治形式，正像在反对专制王朝的斗爭中誕生的議会一样。然而，这都是錯觉。苏維埃政府是从革命机构一变而为适宜于这个新阶級或共产党的极权独裁的一种形式。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包括党和政府的民主集中制)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当党內还容忍公开的不同意見时，党員依然可以觉得集中制有可取之处，尽管这并不是一种非常民主的集中制。当极权的权威被制造出来时，集中制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寡头专政。

我們可以由此得出一个結論：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把寡头独

裁变为个人独裁是一种长期的趋势。意識形态的一致，党最高領袖間的不可避免的斗爭，以及整个制度的需要，都是造成个人独裁趋向的因素。坐上最高权力交椅的領导人和他的帮手們，便是当时最能表明并保护这个新阶級利益的人物。

在其他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强烈的个人独裁傾向。例如，当正在大力推行工业化时，或国家在作战时，所有的力量都必須听命于一个見解和一个意志。不过，共产主义对个人独裁却有其独特的、单純的理由：权威是共产主义和每一个眞正共产主义者的基本目的和手段。共产党人对权力的貪婪是难以满足的而且是不可抗拒的。权力斗爭的胜利无異于至上的光荣，失敗就是莫大的耻辱。

共产党領袖也必然趋向于好大喜功，由于人类的弱点，以及当权者希望被认作有权势的風云人物的內在需要，好大喜功就成为他們不可抵抗的誘惑。

爭地位、浮夸和酷爱权力是不能避免的，腐化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是一般政府官員的腐化問題，因为这种腐化現象也可能比共产党执政之前的国家中所发生的腐化現象更少些。这是由一党专政并壟断一切特权所造成的一种特殊的腐化。"照顾自己人"，分派肥缺，或者任意分配各种特权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党和国家的三位一体并在实际上掌握全国财产的事实，使共产党的国家自行腐敗，而且必然会产生特权与寄生作用。

一位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員曾把一个普通共产党人的生活环境写得生动如画："实际上我已被撕为三份：我看見有些人的汽車比我的汽車好，然而，在我看来，他們对党和社会主义的貢献并不比我多；我再从上往下看那些沒有汽車的人，他們的确連一辆汽車都沒有掙到。于是，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毕竟还有一辆屬我所有的汽車。"

显然他不是一名眞正的共产党人，他屬于这样一类的人：他之所以成为一个共产党員，是因为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后来他失望了，他就試图以一般的官僚生涯中所可能得到的东西去满足他自己。眞正的共产党人却是狂热者和貪得无厌的抓权者的混合体。只有这种类型的人才是一个眞正的共产党員，其他的党員不是理想主义者就是个人主义者。

由于共产主义制度是以行政工作为基础的，所以它必然是一种具有严格层次組織的官僚政治。在共产主义制度中，在政治領袖和会議的周圍有許多排他性的集团。所有政策的决定都成为这些集团之間的爭吵，在这些集团内，攏絡勾結之事层出不穷。最高的集团通常是最亲密的。国家大事都是在亲密交談的晚餐中，狩猎中，以及两三个人的交談中决定的。党的会議、政府的会議及若干集会的召开并无其他用途，只是通过它們把那些决定宣布，公諸于世。召开会議的目的只是用来确认在亲密的厨房中早已烹調好的食物。

共产党人对于国家或政府有一种拜物的关系，就好像国家是他們的私人财产一样。同样的人，同样的团体在党内都很亲密、熟悉，可是，一旦身为国家代表，立刻就变得大模大样、神气十足了。

这个君主政体毫不开明。这位君主本身，这位独裁者，并不觉得他自己是个君主或独裁者。当斯大林被称为独裁者时，他就认为是无稽之談。他觉得他是党的集体意志的代表。就某种程度說，他是对的，因为历史上或許从来沒有一个人曾經有过像他那么大的个人权力。像共产党的其他独裁者一样，他意識到如果放棄党的意識形态基础，放棄新阶級的独占主义，放棄国家财富的所有权或寡头政治的极权政权，結果必然将使自己倒台。誠然，斯大林从未考虑过作这类放棄，因为他是这个制度的創造者

和最高代表。可是，他还得依靠这个經他通过行政权一手創造出来的制度，或依靠党的寡头政治的意見。他既不能做不利于他們的事，也不能越过他們而任意行使权威。

事实上，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沒有一个人是独立的，党的高級人士不是独立的，它的領袖也不是独立的。他們都得相互依賴，并且得极力避免与他們的环境、当时流行的思想、控制权以及利益分离。

那末，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級专政还能有什么意义呢？

四

共产党关于国家的理論首先是由列宁詳細拟訂、后来又經斯大林及其他人补充的，这一理論主張党官僚的极权独裁。这个理論的基本要素有二：（一）关于国家的理論；（二）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論。这两个要素是相互关联的，并且足以代表这一整个理論。列宁关于国家的理論几乎完全見于他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中，那是他在十月革命前夕躲避临时政府时写的。像列宁其他方面的表現一样，这个理論傾向于馬克思主义学說的革命面。在討論国家的时候，列宁特别利用 1905 年俄国革命的經驗，把革命这一面大加发揮而至于极端。就历史的观点来看，作为革命的一种思想武器，列宁的这个文件的意义要比作为根据其思想而建立的新权威的发展基础重要得多。

列宁把国家貶为力量，或者說得更准确一些，国家只不过是一个阶級为压迫其他阶級而使用的暴力机构。为了以最有力的方式表示国家的性质，列宁指出："国家是一根棍子"。

列宁也見到国家的其他功能。不过，他也在这些功能中見

到他所认为的国家必不可少的任务——一个阶級用暴力对付其他阶級。

事实上，列宁要求摧毁旧国家机器的学說根本不科学。但这个从历史观点看极有意义的列宁关于国家的理論，使以后一切典型的共产主义理論都找到了根据。基于当前情况的需要，党就創造一般原則，冒充科学的結論与学說，宣称半眞半假的东西为眞理。武力和暴力是所有国家权威的基本特色，国家机构总是为某个社会和政治力量所利用，在武装冲突时尤其如此，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經驗表明，国家机器对于社会或国家之所以必要，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为了发展和联合社会的各种职能。共产主义的理論和列宁的理論都忽視了这一面。

在很久以前，历史上曾經有沒有国家和权力机构的公社。但那不是社会，那只是一种从半野兽时代过渡到人类社会生活时代的方式。即使这些最原始的公社也有某些形式的权威。随着社会生活形式的日益复杂，要試图证明对国家的需要将在未来消失，未免是天眞的想法。列宁是支持馬克思的，馬克思同意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一点上的看法。列宁期待并試图建立一个无国家的社会。这里且不去討論列宁立論的前提是否站得住，我們必須記住，他設想这个无政府社会就是他的无阶級社会。根据这个說法，这个社会将沒有阶級和阶級斗爭，沒有人压迫别人和剝削别人，而且已經不再需要国家了。在这以前，"最民主的"国家就是"无产阶級专政"，因为它"消灭"阶級，并且因此而使它自己本身逐漸成为不需要。因此，凡是加强无产阶級专政或导致阶級"消灭"的一切都是正当的，进步的，合理的。在共产党人控制不到的地区，他們是为最民主的措施辯护的人，因为这对他們的斗爭有利，在那些他們打算取得政权的地区，他們就变为一切民主制度的敌人，指責那些民主措施属"資产阶級"

类型。他們一般把民主荒唐地划分为“資产阶級”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事实上，区分民主的唯一正当而公平的标准应当视自由分量的多寡或自由的普遍性如何而定。

在列宁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关于国家的整个学說中，无論从科学的观点或实际的观点来看，是有許多漏洞的。經驗已經证明，結果是完全与列宁所想象的相反。阶級并沒有在“无产阶級专政”下消失，而“无产阶級专政”也沒有开始衰亡。实际上，共产党人极权权威的建立以及旧社会各阶級的消灭只是让人看来好像所有的阶級都消灭了。然而，国家权力的增长，或者說得更准确一些，即用以推行暴政的官僚政治的成长并未因无产阶級专政而停止。相反地，它的权力是增加了。这个理論得設法予以补救；斯大林曾說，在苏維埃国家“消亡”以前，它还得担当起更高的“教育”任务。如果我們只就共产党关于国家的理論的本质来說，尤其是就共理論的实踐的本质来說，即认为国家主要的或者唯一的职能只是施行武力和强力，那末，我們可以說根据斯大林的說法，警察制度所担当的正是这种高級的或“教育的”任务。当然，我們能了解，这只是一个恶意的解釋。但在斯大林的这一說法中，我們却見到共产党人另一个半眞半假的理論：斯大林根本不知道如何解釋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为什么在已經“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机器仍在继續成长。因此他拿国家的职能之一，即教育的职能，当作国家的主要职能。他不能使用暴虐，因为苏联已經沒有敌对阶級存在。

南斯拉夫的領袖們关于“自治”的理論也屬同样情况。在与斯大林发生冲突时，他們不得不“糾正”斯大林的“偏差”，并且作一些企图促使国家不久后就会开始“消亡”的措施。但这并不妨碍斯大林或南斯拉夫領袖們继續推动并加强国家在武力方面的职能；对共产党的領袖們来說，武力是国家最重要的职能，它

是他們关于国家的理論的基础。

斯大林关于国家如何一面愈来愈强，一面却逐漸消亡的見解，也即关于国家的职能何以不断扩張，并把越来越多的公民吸入其中的見解，是非常有趣的。斯大林鉴于国家机器的作用不断扩大(尽管国家机器已經“开始”轉变为一个“完全沒有阶級”的共产主义社会)，就认为到了所有的公民都能升到国家的水平并管理国家事务的时候，国家就将消亡。而且，列宁还說过，总有一天，“甚至連家庭主妇也将管理政府”。正如我們所看見的，类似斯大林的理論也流行于南斯拉夫。但共产党关于国家的理論，即在他們的“社会主义”实現后，各种阶級将“消失”，国家将“消亡”，同党的官僚政治的极权权威这一現实之間的裂痕，是这些理論和斯大林的理論都不能弥补的。

五

不論是在理論上还是实踐上，共产主义最重要的問題是国家的問題；由于在共产主义制度內部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矛盾，这个問題就成为各种困难的恒久根源。

共产主义政权是政府和人民間一种潛在的內战形式。国家不只是一种暴政的工具；社会和国家机器的执行部門一直在不断地、积极地反对党的寡头政治，而寡头政府总想用赤裸裸的实力压服这些反对。实际上，共产党人并不能使国家完全依靠实力存在，他們也不能使社会完全屈膝。不过，他們能够控制实力机关，那就是說，控制警察和党，再用警察和党控制整个国家机器及其功能。国家机关及其职能对于党和警察或个别政治官員的“悖理行为”的反对，实际上就是进入了国家机器的社会的反对。这是由于社会的客观願望和需要受到了压抑和損害而

显示出来的一种不满。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国家与国家的职能并没有退缩成一个压迫机构，它們也不同于压迫机构。作为一个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組織，国家是屈从于那些压迫机构的。共产主义不能解决这种不調和現象，其原因是：由于共产主义本身的极权专制性质，它就不可避免地要与不同的和相反的社会趋向冲突，那些趋向甚至通过国家的社会职能表現出来。

由于这一矛盾，以及共产党人經常而不可避免地需要把国家主要当作一种武力的工具，所以共产主义国家就不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即其司法独立不受政府的干預，法律能有实际效力。整个共产主义制度是反对这样的法治国家的。即使共产党的領导人希望建立一个法治国家，他們也不可能在不損及他們的极权权威下达到这一目的。

司法独立和法治必将导致一个反对派的出現。例如，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并沒有一条关于反对言論自由和結社权利的法律。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法律是保障公民的一切权利的，并且也是以司法独立这个原則为基础的。但实际上根本沒有这回事。

在共产主义政权下，自由权是正式被承认的，但自由权的运用有一个先决条件：它必須是在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时，或在支持他們的統治时，才能使用，而代表社会主义的利益的，是共产党的領袖。这种違反法律規定的措施必然会造成警察和党的机构使用異常严厉和残酷的手段。共产党人一方面要保护法律的形式，而同时又得确保他們的极权权威。

就大部分情况而論，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立法权是不能和行政权分开的。列宁认为这是一个完善的解决办法。南斯拉夫的領导人也坚持这一点。在一党专政的制度下，这是政府专制和万能的根源之一。

同样，警察权实际也不能同司法权分开。捕人者也就是审判并执行处罰者。这个圈子是很紧的：行政机构，立法机构，調查机构，审判机构和懲罰机构是数位一体的，也是同一机构。

为什么共产党人的专政不得不如此地尽量利用法律？为什么他們得躲在法律的背后？

对外作政治宣傳是原因之一。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党政权必須保障并确定它所依存的新阶級的权利，以便維持其自身的存在。法律总是根据这个新阶級或党的需要和利益制訂的。表面上，法律是为全体公民制定的，但是，实际上，公民享受法定权利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在他們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时才能享受。結果，共产党人經常担心，有一天他們可能被迫执行他們所訂的法律。所以他們总要留下一个漏洞或例外，以便他們能够逃避他們的法律。

例如，南斯拉夫的立法机构就謹守一个原則：除非一个人的行动恰恰如法律所規定的犯罪行为，他就不得被判有罪。但是大多数的政治审判都是以所謂“敌意的宣傳”为理由，虽然对这一观念故意不下定义，只留給审判官和秘密警察去自行解釋。

由于这些原因，共产主义政权下的政治审判大多数是事先安排好的。法院的任务只是证明当权者需要证明的罪行；或者說，法院的任务只是为被告的“敌对活动”的政治性判决披上一件法律的外衣。

在用这种方法进行的这些审判中，被告的供辞是最重要的。他必須自己承认他是一个敌人。于是，前提便肯定了。可能就沒有多少证据，因此就必須用被告的坦白书来作证据。

南斯拉夫的政治审判只不过是莫斯科方面政治审判的袖珍版。所謂莫斯科的审判就是共产主义制度下司法和法律滑稽戏的最可笑最血腥的例子。其他的絕大多数审判，就行为和懲罰

而論，也都是屬于类似性质的把戏。

政治性的审判是怎样处理的呢？

首先，根据党的工作人員的意見，党的警察便确定某人是目前的"敌人"；如果沒有其他理由，他的見解以及和密友的談話就算是罪嫌，至少地方当局认为如此。第二步是准备对敌人作合法的清除。通常这是通过两种途徑进行的。其一是派挑撥分子故意煽动受害人"发牢骚"，参加不合法的組織或者作类似性质的行动；其二是利用"密探"出面作证，依据警方的希望，提出控告受害人的证据。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絕大多数非法組織是秘密警察为了誘惑反对分子加入而建立的，以便将反对者置于一种警察可以向其实行清算的地位。共产党政府幷不阻止"令人厌恶的"公民違法犯罪；而且事实上誘惑他們这样做。

斯大林通常幷不假手法院，而是广泛地行使酷刑；即令不用酷刑而假手法院，其审判的本质是一样的：共产党清算他們的反对者，幷不是因为那些人犯了罪，而因为他們是反对者。从法律的观点說，大多数被懲罰的政治犯是无辜的，尽管他們是这个政权的反对派。从共产党人的观点来看，尽管这些反对者被判罪幷沒有法律根据，但他們是按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被判罪和受到处罰的。

当公民自发地反对共产党政权的措施时，共产党当局便擅自处理他們，根本不管宪法和法律的条規。共产党政权对于群众的反对所采取的殘暴、不人道与不合法的行动，是近代史上空前未有的。在波兹南所采取的行动是最有名的，但不是最殘暴的。占領国和殖民国家虽然都是征服者，占領軍当局也极少采取这样严酷的行动，尽管也采用非常法令和紧急措施来完成它們的行动，但很少采取这样殘暴的措施。共产党的执政者竟在他們"自己"的国家用蹂躏他們自己的法律的办法来完成他們的行动。

甚至在非政治性的事务上，司法和立法当局也难免受专政者的干预。这个极权阶級及其成員不可能不干預司法和立法机构的业务。这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

1955年3月23日貝尔格萊德的《政治报》上有一篇文章，对于南斯拉夫法院的眞正任务和地位提供了一个最适当的說明（尽管南斯拉夫的法治程度一直較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为高）：

"在以檢察官布拉納·吉夫列摩維克为主席的、历时两日的年会上，討論关于經济方面的犯罪活动問題时，各共和国的檢察官、伏查伏迪納的檢察官以及貝尔格萊德的檢察官們都曾宣称，为了使經济方面和一切政治組織中的反对犯罪活动的斗爭取得完全胜利，就必須使司法机关和經济自治单位以及一切政治組織进行合作……

檢察官們认为，社会上对于消除这种罪犯的反应还不够热烈。

檢察官們都同意，社会反应必須更积极。根据檢察官們的想法，更严厉的处罰和更严厉的执行处罰的方法只是应該采取的措施的一部分。……

会議所引用的例子证实，有些在政治領域中失敗的敌人現在已滲入經济領域。因此，經济領域的犯罪問題并不只是一个法律問題，而且也是一个政治問題，这就需要所有政府机构和社会組織的合作。……

在总結这些討論时，联邦檢察官布拉納·吉夫列摩維克强調因南斯拉夫已实行分权而产生的条件下的法治意义，并且指出，我們的最高領袖們对于个别經济罪犯的严厉处分是合理的。"

显然，檢察官們已經决定，法院将根据"最高領袖們"的意旨来审問和判刑。这样还有什么法院和法治可言呢？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法律理論是根据环境和寡头政治的需要而改变的。維辛斯基主張判罪要根据"最大可靠性"，即根据政治的分析和需要，但这个原則已經被摒棄了。在政府和司法及立法的关系改变之前，即使采取更人道、更科学的原則，实质上也不会有任何变更。定期性的"法治"运动和赫魯曉夫所吹嘘的党"現在"对警察和司法机构控制的成功，仅仅反映出統治阶級在日益需要法律安全方面的形式的改变。它們并不表明統治阶級对于社会、国家、法院或法律所持立場的改变。

六

共产主义的法律制度不能脫离形式主义，也不能在审判、选举以及类似事件上摆脫党組織和警察的决定性影响。愈往上去，法治就愈变成裝飾品，而政府在司法、选举等事件上所起的作用就愈重要。

共产主义国家的选举之空洞和鋪張浪費是尽人皆知的事；如果我的記忆无誤，艾德礼曾風趣地称它們是"只有一只馬出場的賽馬"。在我看来，还有些話应該补充：既然选举对政治关系并沒有影响，那末共产党人为什么非实行选举不可呢？为什么非要像議会选举那样进行如此費錢而空洞的勾当呢？

宣傳和外交政策的需要又是理由之一。还有一个理由是：如果一切不通过合法程序建立起来，任何政府都无法存在，共产党政府也不例外。在当前情况下，是由人民选出的代表来使政府合法的。人民必須正式批准共产党人所做的一切。

此外，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所以有代議制度的存在，还有一个更深刻更重要的理由。党的高級官僚，或者新阶級的政治核心有必要批准其最高机关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共产党政府能够不

管一般舆論，但不能不理党的舆論和共产主义的舆論。因此，尽管选举对共产党人沒有什么意义，但党的最高集团对于議員的选擇是慎重其事的。在选擇时得考虑到一切条件，如个人在运动中和社会中的服务成績，所担当的任务，所能发揮的功能，以及所代表的职业等。从党内的观点看，选举領导人物非常重要：領导人物分配着他們所視为党在議会中的最重要权力。这样一来，領导上就有了以党、阶級和人民名义行动时所需要的合法地位。

共产党曾試图让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共产党人去爭議会里的一个席位，但并沒有取得建設性結果。有些例子证明，南斯拉夫曾作此尝試，不过，領导上断定这种企图是造成"分裂"的。最近听說在东欧国家有好些共产党候选人爭取同一职位的事。这可能是让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候选人爭一个位置，但很少可能作有系統的进行。这将是前进了一步，并且甚至可能是共产主义制度走向民主的轉捩点。然而，在我看来，这距这些措施的实踐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并且东欧国家的发展应該先循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制度所走的路綫，而不应該向只作一些相应的变化的政治民主方面走。专制核心如今依然大权在握，他們明白，放棄傳統的党内統一将是非常危險的。党内的任何自由不仅会危及領袖們的权威，而且会危及极权主义本身。

共产主义国家的議会沒有权利对任何重要的事情作出决定。議員們都是預先选定的，这样的当选使他們深有受寵之感，所以，即令他們想有所爭議，他們也沒有权力或勇气去做。此外，由于他們当选并非决定于选民，代表們并不觉得他們对选民負有責任。共产主义国家的議会完全应該被称为議員們組成的"庙堂"。他們的权利与任务是一次又一次地一致通过早就由后台为他們决定好的議案。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政府是不需要其他类

型的議会的；的确，可能还会有人非难其他类型的議会是多余的而且花錢太多。

七

共产主义国家是靠武力和暴力建成的，并且經常和人民发生矛盾，所以，纵或沒有外在的理由，它也必然是黷武的。对于武力，特别是軍事实力的崇拜，是沒有任何国家能赶得上共产主义国家那么厉害的。黷武主义是新阶級內在的基本需要；这是使这个新阶級存在、有实力并享有特权的各种力量之一。

基于經常压力的存在，共产主义国家在基本上，甚至必要时要絕对地成为一个暴力机构。因此它一开始就已經是一个官僚政治的国家。由于一面有少数当权者的专制主义的維持，一面又有各种法令和規章的帮助，所以共产主义国家所控有的权力大过其他任何国家組織。共产主义国家一經建立，立即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法律和条規，多到甚至連法官和律师都搅不清楚。尽管有些条例并无好处，但政府对任何事都要訂出詳細的規定。基于意識形态上的理由，共产主义的立法者常常頒布各种法令，但并不考虑到它們的实际环境和实际可能性。他們成天浸沉在可以不受批評或反对的合法而抽象的"社会主义"公式中，把生活約束在条文里，大会則机械地通过这些条文。

然而，当問題涉及寡头政治的需要以及領导人的工作方法时，共产党政府也就不讲官样文章了。甚至在极例外的情况下，国家和党的領导人不喜欢受法規的約束。制定政策以及作出政治决定的大权既握在他們的手中，因此就不能忍受拖延或太严格的程序的約束。領导人在对有关整个經济問題及所有其他事件作决定时，除开那些不重要的、象征性的、形式的問題外，是不

受过份严格的限制的。最严格的官僚主义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主义的創造者，既不是一般的官僚，也不受法令的約束。例如，不論就任何一方面說，斯大林都不是一名官僚。在許多共产党領导人的办公室中，普遍存在着混乱和拖拉作風。

然而，这种情况并沒有阻止他們暫时地站在"反官僚主义"的立場上，那就是說，反对行政工作中的拖拉和舞弊。他們今天正在反对斯大林式的官僚統治。可是，他們并无意消除盛行于經济的和国家的政治机构內部的眞正的、根本的官僚作風。

在这种"反官僚主义斗爭"中，共产党的領导人常常援引列宁的話。可是，对列宁作仔細研究之后，情况表明，他并未預見新制度將走向官僚政治。列宁同部分地从沙皇政府沿襲下来的官僚作風作斗爭时，指出大部分困难是由于"沒有一个机构是由甄选的共产党員或苏維埃党校出身的人組成的"。在斯大林統治下，旧官員全被清除了，遺缺都由"甄选的"共产党員补上了，尽管如此，官僚主义仍在滋长。甚至在像南斯拉夫这种国家中，官僚作風的行政要弱得多，但它的本质，政治官僚的壟断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关系，并沒有廢棄。纵或有一天作为行政方法的官僚主义被廢止了，但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关系的官僚主义將継續存在。

共产主义国家或政府正在努力做到使个人，民族，甚至国家的代表都完全非个人化，政府一心想把整个国家变为公务人員的国家。政府一心想直接或間接地管理并控制工資、房屋甚至知識活动。共产党人并不用是否公务人員这一点来区分人民，因为他們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公务人員，他們只根据他們所得的薪水和享受的特权来分辨等級。通过集体化措施，甚至連农民也逐漸变为整个官僚社会的一員了。

然而，这只是外表的看法。在共产主义制度內，社会集团是

尖銳地划分开来的。尽管有这許多差别和冲突，但总的說来，共产主义社会比其他社会較为統一。整个共产主义制度的弱点在于它的强迫态度和关系，以及組成这一社会的相互冲突的因素。可是，各个部分彼此間是相互依賴的，就像一架巨大的机器。

就像在一个絕对专制的王朝統治下一样，在共产主义政府統治下，也即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人的个性的发展只是一个抽象的理想。在专制王朝时代，当重商主义者强求政府施行重商經济时，帝王本身——如俄国的卡特琳女王——就认为政府有責任重新对人民进行教育。共产党的領导人也这样做和这样想。可是，在专制王朝时代，政府只是想把当时旣有的各种观念变为政府所持之观念的附屬品。而如今，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政府本身旣是所有人又是思想家。这并不是說，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人的个性已經按照一个全能的恶魔术师的意志而消失，或已变成一个在龐大而无情的国家机器中轉动的一个笨重而无人味的齿輪。人的个性生来就兼有集体性和个体性，它是不可摧毁的，即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也是如此。当然，在这个制度下，人的个性所受到的压抑比其他社会更甚，因而它不得不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表現。

个性的領域只是处理日常瑣事的領域。当这些日常生活上的小事和願望与壟断人民的物质生活及知識生活的共产主义制度堡垒冲突时，即使是这个小小的領域也不自由、不安全了。在共产主义制度中，不安全便是个人的生活方式。政府給他一个生活的机会，但有一个条件，即他必須順服。一个人的个性在他所想要的和他实际所有的这兩者之間被撕破了。就像在其他的制度下一样，人們易于承认集体利益和服从集体利益，不过他也会反对集体中的那些篡位的代表。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大多数人是不反对社会主义的，他們只反对达到社会主义的方法，这就

证明共产党人并沒有在发展任何一种眞正的社会主义。个人所反对的是那些是为寡头政治的利益而設的各种限制，但他們并不反对为整个社会利益而設的限制。

沒有在这些制度下生活过的人一时很难了解：人类，特别是如此高傲而英勇的各民族，何以会放棄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自由到这种程度？对于这种情况最准确的、虽然不是最完全的解答，就是由于暴政的严酷性和全面性。不过，在这种局面的骨子里，还有更深的理由。

一个理由是历史上的；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是在經济变革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中被迫忍受自由的丧失的。另一个理由是知識和道德方面的。由于工业化已成为整个国家生死关头的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既作为工业化的理想代表，就变成了理想与希望，而在共产党人及一部分人民当中，共产主义几乎被視为神圣。在那些不屬于旧社会阶級的人民的心目中，有計划、有組織的反党反政府的行动，不啻是犯了背叛祖国和最高理想的罪行。

共产主义国家中所以沒有有組織的抵抗的最重要理由，在于共产主义国家的包攬一切和极权主义。它的权力已滲入社会和个人的所有毛孔，它深入了科学家的視界，詩人的灵感，甚至情人的梦境。如果起而反抗，就不仅会以一名絕望的个人而死，而且会被社会辱罵和遺棄。在共产党政府铁腕下是既沒有空气也沒有阳光的。

反抗集团的来源主要不外两种，一是来自旧阶級，一是来自原来的共产主义自身，但对于他們的自由所遭受的侵犯，两者都找不到抗击的途徑和手段。第一个集团在后退，第二个集团則进行着无目标、无思想的革命活动，并与当权者作教条上的詭辯。因此，发現新的道路的条件尚未成熟。

同时，人民本能地不信任新的道路并且抵抗每一种步驟和細节。如今，这种抵抗已成为对共产党政权的最大的、真正的威胁。共产党的寡头已不再知道群众的思虑和感觉了。在深邃而黑暗的不滿之海中，共产党政权已深感不安。

虽然像共产党独裁政权这样成功地压制它的反对者是史无前例的，但它所激发的不滿之深广也是空前未有的。看来良知被压縮得愈紧，建立一个組織的机会愈少，不滿也就愈大。

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导致普遍的不滿，在这种不滿中，除了失望和憤恨外，所有的不同意見都逐漸消失了。因日常生活瑣事而引起的亿万人民的不滿，就是一种自发的反抗，共产党人对这种自发的反抗形式还无法压服。在德苏战爭时期就曾証实这一点。当德軍开始攻击苏联时，俄国人似乎絲毫不想抵抗。然而，不久以后，发現希特勒的意图是毁灭俄国，并且要把斯拉夫人及苏維埃其他各族人民变为"統治民族"的非人的奴隶。于是，从人民心底深处涌起了对祖国傳統的、不可征服的热爱。在整个战爭中，斯大林既不对人民提及苏維埃政府、也不提及社会主义；他只提一样东西——祖国。不管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如何，为祖国而死总是值得的。

八

共产党政权已經成功地解决了被它推翻的制度所不能解决的許多問題。它們也成功地解决了在它們当权前一直存在的民族問題。然而，它們还未能完全解决民族資产阶級的冲突。这个問題已以一个嶄新而且更严重的形式在共产党政权中再度出現。

通过一个高度发展的官僚政治，民族統治正在苏联建立。

可是，在南斯拉夫，由于各族官僚間的摩擦，爭执正方兴未艾。不管是苏联的情况也好、南斯拉夫的情况也好，两者都不关心旧式的民族冲突。共产主义者不是民族主义者；对他們来說，坚持民族主义不过是一种形式，就像他們坚持其他的形式一样，只是借此加强其权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們甚至可以不时地像狂热的沙文主义者那样行动。斯大林是一个格魯吉亚人，不过，当事实和宣傳需要时，他会成为一个狂热的大俄罗斯主义者。甚至赫魯曉夫都承认，斯大林的錯誤之一，是将整个整个的民族加以消灭这一可怕的事实。斯大林及共党羽利用俄罗斯民族这个最大民族的民族偏見，仿佛它是由震电督人組成的一样。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可以利用，共产党的領导人总要加以利用，例如，他們宣傳各民族官僚机构間权利平等，这在他們說来，实际上就算是要求各民族間的权利平等。

然而，在共产党民族官僚机构間的冲突的基础中，并沒有民族情感和民族利益。冲突完全是出于别的动机：这是在自己的行政范圍內誰坐第一把交椅之爭。为自己的民族共和国的权力和声誉而进行的斗爭同为加强个人权力之爭相差不远。共产主义国家中的民族共和国只不过是以不同語言为基础的行政区划，此外并无其他意义。尽管他們未曾受过应該站在語言基础上还是站在民族基础上的訓练，共产主义民族共和国的官僚們总是站在他們行政单位立場上的热忱的地方民族主义者。在南斯拉夫的某些純行政性的单位中（如地方議会），其沙文主义比各民族共和国政府中的沙文主义更为严重。

在共产党人中，既可以碰到眼光肤淺的官僚沙文主义，也可以見到民族意識的衰微，甚至在同一个民族中都是如此，这完全由机会和需要来决定。

共产党人所操的語言与其本国人民所用的語言不同。尽管

字句相同，但其表达方式、意义及涵义等却完全有他們自己的一套。

虽然他們对其他制度抱絕不容忍的态度并在自己的制度中抱地方主义态度，但当他們的利益需要时，共产党人也可以成为狂热的国际主义者。曾經具有各自不同的形式和色彩、自己的历史和希望的各个民族，在这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而且基本上在民族方面无所屬的寡头政权面前显得黯然失色，軟弱无力。在激励和喚醒各民族方面，共产党人并未获得成功；就这一意义而言，他們在解决民族問題方面也失敗了。誰能知道目前烏克兰的作家和政治人物的情况？那个面积像法国一样大并且一度是俄国最进步的民族的烏克兰民族的現状如何？你一定会觉得，只有渾渾噩噩的烏合群众才能依然生活于这个无人性的压迫机器之下。

然而，事实并不如此。

就像人的个性一样，各种社会阶級和思想依然存在，民族也依然存在；它們在发揮作用；它們在作反专制主义的斗爭，并且保持着显著的特色，使它們不被毁灭。如果說它們的良知和灵魂被窒息了，但它們并未破碎。虽然它們是被压制了，但它們并未屈服。目前推动它們的力量比旧的或資产阶級的民族主义更强大；它們有一个不可摧毁的意志，它們要使自己当主人，并且，通过它們本身的自由发展，要永远同共产主义世界以外的人类保持日益密切的友好关系。

第五章　經济上的教条主义

一

共产主义經济的发展，并不是共产主义政权本身从革命的专政到反动的专制政治这一发展的基础，而是这一发展的反映。这一发展是通过斗爭与爭論而形成的，它表明在初期所必需的政府对經济的干涉如何逐漸变成統治的官僚集团图謀私利的极重要的手段。最初，国家攫取所有的生产資料，以便控制一切投資来加速工业化。后来，經济进一步的发展，終于主要是为了統治阶級的利益。

其它类型的財产所有者，其行动方式并无根本不同：他們也总是追求某种私人利益；但这个新阶級与其它类型的財产所有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多少掌握着国家全部資源，并以一种周密及有組織的方式发展其經济势力。一个周密的統一制度，諸如政治及經济上的种种机构，也为其它阶級所利用。但因为財产所有者既为数众多、財产之形式也各种各样，而且彼此間互相冲突，因而在共产主义經济以前的一切經济中，至少在正常或和平情况下，仍保持自发性及竞爭性。

即使共产主义經济未能有效地抑制自发性，但与其它制度对照起来，它却不断地坚持应实现自发精神。

这一做法有其理論根据。共产党領袖們，深信他們懂得經济規律，并能以科学的准确性来管理生产。其实，他們唯一所能懂得的，只是如何攫取对經济的控制权。他們攫取經济控制权的这套本事，正如他們在革命中获致胜利，已在他們的脑子里产

生一种錯觉，认为他們之所以获致成功，是由于他們非凡的科学才能。

由于深信其理論的正确，因而他們管理經济大多依照这套理論。因此共产党必先将一項措施說成与馬克思的某一观念相符合，然后才付諸实行，这眞是大笑話。在南斯拉夫，官方曾宣称它的計划是依照馬克思的理論来推行的；但馬克思旣非一計划者，也非一計划专家。事实上他們幷无一事是依照馬克思的意思行事的。虽然，自称一切計划都按照馬克思理論，其目的无非使人民在意識上得到滿足，幷用来說明暴政及經济統制是为着"理想的"目的和根据"科学的"发現。

經济上的教条主义，是共产主义制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可是硬将經济接入教条主义的模型，却幷非共产主义經济制度显著的特点。因为在这种經济制度中，領袖們在"适应"理論方面掌握主动权；当他們觉得于其本身有利时，往往也可以背棄理論。

除由于加速工业化的历史性需要的动机外，共产党的官僚們已被迫建立一种經济制度，来保証其本身权势之持續。以建設一个无阶級社会和廢除剝削为口实，它已建立起一套严密的經济制度，而其財产的形式有利于党的統治与壟断。最初，共产党人为了客观的理由，必須采取"集体化"形式。目前，他們继續加强这一形式，幷未考虑这一做法是否有利于国家經济及进一步的工业化，而只为其本身的利益，为共产党阶級本身的目的。最初，他們管理幷控制整个經济，是为了所謂理想的目标；但后来，他們却完全为了保持絕对控制与統治的目的。这是共产主义經济制度中所以采取这种广泛而硬性的政治措施的眞正原因。

1956年，铁托在一次訪問談話中，承认西方各国經济制度中

有"社会主义的成份"，但他认为这些成份并非"有周密計划地"导入西方經济。这一說法道出共产党的全部观念：正因为在他們国家的經济中"社会主义"是"有周密計划地"——由有組織的强迫行动——建立起来的，所以共产党必須維持其残暴的統治方法，及其对財产所有权的壟断。

对于經济及社会发展中这种"周密的計划性"給予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这表現出共产党經济政策的强制性及自私性，否則，坚持这种周密的計划性有什么必要呢？

除了他們认为合于社会主义的所有权的形式外，共产党强烈反对一切所有权的形式，这最能說明他們具有夺取及維持政权的不可抑制的欲望。但是，当这种激烈的态度有損于其切身利益时，他們也会放棄或改变；因此，他們对于其所提出的理論往往无法自圓其說。如在南斯拉夫，共产党起初建立集体农場以及后来解散集体农場都是在"不会有錯誤的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名目下进行的。今天在这个問題上南共又在实行第三条混乱的中間路綫。类似的实例在所有共产党国家中都有。无論如何，除了他們本身的所有权外，廢除各种形式的私人所有权則是他們不变的目标。

每一种政治制度均表現經济力量并企图管理經济力量。共产党人对于生产虽然不能达到全部的控制，但他們的控制力，已达到使生产继續服从其意識形态及政治目标的程度。关于这一点，共产主义是与所有其它政治制度不同的。

二

共产党常以全体所有制一詞来解釋生产者的特別地位，并且更重要的是他們常以思想在經济中之超越地位来解釋生产者

的特别地位。

苏联在革命成功后，其人民就业自由立即被剥夺。但这一政权的急需工业化，使这种自由未能完全被剥夺。就业自由的完全被剥夺，只是在工业革命成功，新阶級建立后才发生。1940年，通过一项法令，禁止就业自由，并規定对擅离职守者予以懲处。在这一时期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种奴隶劳动制度（即劳动营）开始发展。況且，劳动营的劳动与工厂間的劳动之間几乎毫无差别。

劳动营与各种"自願的"工作活动只不过是最坏的、最极端的强迫劳动的形式。在其他制度中，这种情形可能是暫时性現象，但在共产主义下的强迫劳动，却保持一种永久性的形态。在其它共产党国家中，强迫劳动虽不采取相同形式，也未曾发展到苏联那样程度，但这些国家里都沒有完全的就业自由。

在共产主义制度中，强迫劳动是龍断全部或几乎全部国家財产所有权的結果。工人发觉自己处于不仅要出卖劳动力的境地，而且必須在其不能控制的条件下出卖劳动力，因为他們无法找寻另一較好的雇主。全国只有一个雇主即国家。工人除接受这一雇主的条件外，已无选擇的余地。早期資本主义最坏及最有害的因素，从工人立場而言，就是劳动市場，已被新阶級对劳动力所有权的壟断所代替。这种情形并未使工人更为自由。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工人不同于古代那种奴隶，甚至在强迫劳动营里的工人，也与古代奴隶不同。古代的奴隶，在理論及实际上，都被視为物件。甚至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亚里斯多德也相信人們生而为自由人或奴隶。他虽相信对奴隶应予人道待遇，并主張改革奴隶制度，但他仍把奴隶看作生产工具。在現代技术制度中，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来对待工人，因为只有一个受过教育并对工作有兴趣的工人才能做要求他做的工作。共产主义

制度下的强迫劳动，与古代及历史后期的奴隶制度大不相同。它是所有权及政治关系发展的結果，并不是(或者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是)生产技术水平提高的結果。

由于现代的技术要求一个工人享有充分自由，因而它与强迫劳动，或所有权的壟断及共产主义的政治极权主义根本上极不相容。在共产主义之下，工人在表面上是自由的，但实际上他使用自由的可能性极为有限。对自由的正式限制虽非共产主义固有的特性，但却是共产主义下所发生的一种現象。关于工作及劳动力本身，这种情形尤其明显。

在一个一切財物均被一集团壟断的社会中，劳动力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劳动力間接成为这个集团的財产——纵然不完全如此，因为工人究竟是一个人，他本身也用掉他的部份劳动力。就抽象意义言，劳动力作为一整体，是整个社会生产中的一个要素。新統治阶級既具有物质上及政治上之壟断权，就能将此項因素使用到与其它全国性的物資及生产要素几乎相同的程度，并作同样的对待，而不顾及人的因素。

把劳动力看作生产中的一个因素，于是各企业中的工作条件，或工資与利潤間的关系，就不被官僚集团所关心。工資及工作条件是依照抽象的劳动力观点决定的，或依照个人的資格，很少或者根本不顾及各企业或各工业部門实际的生产成果。这只是一般的規律；根据不同情况及需要，也有例外。但这一制度必然导致实际生产者(即工人)对其工作缺乏兴趣。并且也造成质量的低劣；实际生产率的降低与技术进步的停滞，以及工厂的腐敗。共产党人只知爭取个别工人方面生产率的提高，而簡直不注意于整个劳动力的生产率。

在这种制度下，鼓励工人的种种努力是經常不可缺少的手段。官僚集团提出各种奖金及补貼，以消除工人缺乏工作兴趣的

現象。但只要共产党人不改变其制度的本身，并继續維持对一切所有权及政府的壟断，他們便无法鼓励个別工人工作的热忱，更談不到刺激整个劳动力。

在南斯拉夫，已煞费苦心实施許多办法将利潤撥一部份給工人；在东欧其它国家也正在作此打算。但官僚集团很快地就以遏制通貨膨脹、并将金錢作明智投資为辞，将"超額的利潤"保留在手內。留下給工人的部份微乎其微，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数額以及一种建議的"权利"，建議如何通过党和工会組織（就是通过官僚集团）进行投資。工人們既无罢工权利，又无权决定誰享有什么，因而不可能有很多机会来分享利潤中的应得部分。这已是显然的，所有这些权利是与各項政治自由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它們与其它权利分开了，便无法获得。

在这种制度下，自由工会組織决不可能存在。像1954年在东德和1956年在波兹南因工人不滿而爆发的罢工，都是极难得发生的事情。

共产党对于压制罢工运动的解釋是："工人阶級"已經当家做主，并通过国家掌握生产資料，因此，如果工人举行罢工，那就等于对自己罢工。这种天眞的解釋是根据下列的事实：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財产已不为个人所有，而是如大家所知道的，被巧妙地曲解为財产所有者是集体的与表面上无法单独辨认的。

最重要的，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因为只有一个所有者掌握着所有財产及全部劳动力，因而罢工是不可能发生的。沒有全体工人的参加，对这一个所有者很难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某一企业或某些企业的罢工——假定在极权专制制度之下如此事件完全有可能发生的話——也不可能眞正威胁这一所有者。因其財产并非由这些个別企业构成，而是包括全部生产机器。在几个个別企业中的損失，并不足以使这一所有者受到創伤，因为生

产者或整个社会势必要补偿这些損失的。因此，对共产党人来說，罢工与其說是經济問題，不如說是政治問題。

个别的罢工就其可能的結果来說，几乎是不可能与无望的。同时总罢工的发生，缺乏适当的政治条件，而它們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能发生。每当个别的罢工发生时，它們常会轉变为总罢工，并且具有濃烈的政治色彩。此外，共产党政权不断地分化离間工人阶級，其手段是：把那些"教育"工人阶級、"提高其思想意識"，并指导其日常生活的人，从工人队伍中提拔出来并授予官职。

工会組織与其他职业团体，由于其目的与作用，只能視为单一的所有者与当政的寡头政体的附属物。因此，它們的"主要"目的是为"建設社会主义"或增加生产。此外，它們的其他作用是在工人中傳播种种錯觉及培养使工人馴服的情緒。这些組織只起一种重要的作用——提高工人阶級的文化水平。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工人組織，实在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行会"或"黃色"組織。此处所以用"一种特殊形态"一詞，因为它們的雇主是政府，同时又是主要意識形态的代表人。在其它制度中，这两个因素通常彼此割裂，因而工人纵不能倚賴一方面，至少也可利用双方之間的分歧与矛盾。

工人阶級是共产党政权主要的关切对象，这絕不是偶然的；那不是为了理想主义或人道主义的理由，而仅仅因为这是个生产和新阶級的兴起与存在都要依靠它的阶級。

三

在共产主义制度中，虽无自由就业与自由的工人組織，但对工人的剝削也有其限度。对此种限度的研究需要更深入及具体

的分析。我們在这里所探討的只是它的最重要的方面。

除政治上的限制——对工人不满的恐惧，及对易引起变化的其它考虑——之外，对工人的剝削尚有許多經常性的限制：剝削的形式及程度如果使这一制度付出过高代价时，则迟早必須予以廢棄。

因此，根据苏联1956年4月25日的一項命令，把懲处工人迟到或离职的规定都廢除了。同时許多工人从劳动营中获釋；在这些获釋的工人中，不可能区别出哪些是政治犯，哪些是由于政权需要劳动力而被关进劳动营的。此項命令虽未能使劳动力全部解放，因为許多限制仍旧存在，但这一行动，确是斯大林死后最重要的进展。

强迫性的奴隶劳动給共产党政权带来許多政治上的困难，而且当进步的技术傳入苏联以后，这更变得代价过高。一个奴隶劳工不論你供給他的食物是多么少，但若将监督与管理机构的一切费用計算在內，其成本仍然要超过其所能生产的价値。因此，其劳动力已变成毫无意义且无法继續下去。現代的生产，在其它方面，也限制着剝削。机器不能由精疲力竭的强迫性的劳工予以有效率的运轉；而且适当的健康与文化条件已成为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在共产主义制度中，这种对剝削的限制与对劳动力自由的限制同时并存。这些自由是由所有权及政府的性质所决定。除非所有权及政府发生变化，劳动力不可能获得自由，而必須继續遭到温和的或严厉的經济上及行政上的压力。

由于生产上的需要，一个共产党政权规定了劳动的条件及劳动力的地位。他們采取多方面和无所不包的社会措施：如规定工时、假期、保險、教育、女工及童工劳动等等。但許多这些措施多半是虛有其名；还有許多甚至含有漸进的損害性。

在一个共产主义制度下，約束劳工各种关系及保持生产上的秩序和安定是一不可变的趋势。这个独一无二的集体所有者負責解决全面劳动力問題。它在任何方面都不能容忍"无政府状态"，在劳动力方面尤其如此。它必須管理劳动力，正如它必須管理生产中其它各方面一样。

共产党大吹大擂，說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已充分就业，但这种夸口幷不能掩盖只要人們細加观察便可看出的伤痕。一切資財，一旦为一个集团所控制，則这些資財，如人力的需要，就必然成为其計划的主要部份。政治需要在計划上旣占重要地位，这样必然造成一种結果，即为了保持若干工业部門的存在，必須使其它部門付出代价。这样，計划便掩盖了眞正的失业。一旦經济的各个部門能获得較自由的活动，或共产党政权不必为維持和加强某一工业部門而牺牲另一部門时，失业現象便会重現。而且和世界市場維持更为广泛的联系也会引起这种趋势。

因此，充分就业幷非共产党"社会主义"的結果，而是以命令推行經济政策的結果；归根結底，充分就业是不协調与生产无效率的結果。它幷不能表現共产主义經济制度的力量，而只能暴露其弱点。南斯拉夫在其生产效率沒有达到滿意程度前，一直缺乏劳工。自从其生产效率提高后，失业随即出現。如果南斯拉夫的生产效率达到最高峰，失业情形或将更加严重。

在共产主义的經济制度中，充分就业掩飾了失业現象。普遍的貧困掩飾着部份的失业，正如其若干經济部門的长足进步掩飾了其它部門的落后一样。

而且，这种壟断的所有权及政府，可以防止經济的崩潰，但却无力防止慢性的危机。新阶級的自私自利，經济制度之受意識形态支配的性质，使它不可能維持一个健全而和諧的制度。

四

馬克思并非第一个想像未来社会的經济必須建立于計划的基础上的人，但他却是第一个（或是首倡者之一）认为現代的經济不可避免地趋向計划化的人，因为除社会的理由外，現代經济必須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壟断經济是首先根据庞大的全国性及国际性規模而計划的經济。今天，計划經济已成为一普遍現象，也是大多数政府經济政策之一項要素，虽然在工业发达的国家与工业落后的国家中，其性质并不相同。当生产达到了先进阶段，社会的、国际的及其它条件，均面临相似趋势时，計划經济即成为必需。計划經济与任何人的理論均无多大关系，与馬克思那些理論的关系更少，因为那些理論都建立在一个較低水平的社会关系及經济关系之上。

当苏联成为第一个着手执行全国性計划的国家时，身为馬克思主义者的領袖們就将这項計划与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实馬克思的学說不只成为俄国革命的理想基础，而且还成为苏联領袖們后来所采取的各項措施的护身符。

为苏联計划經济而找寻的一切历史的及特殊的理由，是与好些理論相关联的。但因社会的基础与共产主义运动的过去关系，却以馬克思的理論最为接近，也最易接受。

共产党的計划經济，在开始时虽极借助于馬克思，但有其更深厚的意識形态上及物质上的背景。当一种經济制度已經或即将变为只有一个唯一的所有者时，如果不实行計划經济，将如何来管理其經济？如果不实行計划經济，它們又如何能进行巨額的投資，以实現其工业化的目的？必先有某事物之需要，然后它才能变成一种理想。共产党的計划經济就是这样由需要而来的

理想。計划經济是用来发展那些足以巩固政权的經济部門。这是一般的規律，可是每一个共产党国家都有例外，尤其是那些不受莫斯科控制的国家更是如此。

由于不可能长期将生产中某一部門的进展与其它部門分开，因此，为了加强政权地位，发展整个国民經济自然极为重要。在每一共产主义制度中，計划的重点往往集中于那些对維持政权的稳定有决定性的重要經济部門。这些部門也就是那些能提高官僚集团的地位、权势及特权的部門。这些部門并且能加强这一政权与其它国家的关系，而使其工业化能达到更高的程度。到目前为止，这些部門大多是重工业及軍事工业，但这并不是說，这种情形在每个国家里永远不变。近来原子能，特别是在苏联，已开始在計划中占首要地位；我认为这种情形的发生，由于軍事上，外交上及政治上的考虑，要比其它考虑来得大。

任何事物都从屬于这些目标。結果，許多經济部門显著落后，且工作缺乏效率；各种脫节与困难必然产生；而生产成本的高昂与慢性的通貨膨脹更是普遍現象。据菲力浦（André Philipe）1956 年 10 月 1 日在美国《新領袖》周刊上的报道：苏联对重工业的投資，已由 1954 年占总投資 53.3%，增加到 1955 年的 60%。虽然在苏联每人平均收入的增加額中，每年从重工业方面只获得 7.4%，其中只有 6.4% 是由于产量的增加，但苏联每年投入工业的資金占其国民淨收入 21%，其中大部分投于重工业。

在这种情形下，不难了解新的所有者为什么对于生活水平最不关切，尽管馬克思本人也认为人是生产中最重要的因素。据与英国工党有密切关系的克兰克肖的报道：在苏联，每月收入在六百卢布以下的人，必須为生存作殊死的斗爭。而据《紐約时报》苏联問題专家史华兹的估計，苏联有将近八百万工人，每月

收入在三百卢布以下；代表英工党左翼观点的《論坛报》曾对这方面加以評論，认为这是苏联大批妇女在粗重工作中就业的原因，而与男女平等无关。最近苏联增加30%的工資，已用在这些低工資阶层。

这是苏联方面的情况。至于其它共产党国家的情形也大同小異，甚至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也是如此。过去南斯拉夫曾經是农产品的輸出国，現在已变成为輸入国。根据官方的統計，南斯拉夫的藍領与白領工作人員的生活水平竟低于第二次大战以前，当时南斯拉夫还是一个落后的資本主义国家。

共产党以政治阶級利益为目的的計划經济，与共极权的独裁政治是相輔相成的。为着意識形态上的理由，共产党人对某些經济部門进行大量的投資。所有計划都环繞这些部門进行。这就导致經济上深刻的变动，从資本家及大地主手中接收来的土地建立的国营农場，其收入竟不足償补由变动造成的損失，結果这种变动造成的損失主要反需利用低工資及用强迫收购谷物制度等榨取农民的方式来償补。

有人会这样說：假如苏联不实施这种計划，不集中发展重工业，那便会赤手空拳地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在希特勒侵略下很容易被征服和受奴役。这种說法虽屬不錯，但也只有某种限度的正确性。因为大炮与坦克并非一个国家唯一的力量。如果斯大林过去在对外政策上沒有帝国主义目的，在对内政策上沒有推行暴政的企图，那末强国集团自不会使苏联单独对付侵略者。

很明显，从意識形态的角度去說明計划經济与經济发展，发展战争工业并不是必要的。将此付諸实施是由于权力的掌握者需要在国内外保持独立地位。至于防御的需要，虽为一国所

不可缺，只是一种附屬性的需要而已。俄国如果推行不同的計划，保持与国外市場更为密切的联系，也照样可获得相同数量的軍备。可是对国外市場倚賴較多，則需要一个不同的对外政策。在当前情形下，全世界利益是息息相关的，而战爭也是总体性的，在发动战爭时，牛油与大炮几乎是同等重要。这种情形甚至在苏联业已获得証实。由美国輸入的粮食，对战爭的胜利，其重要性几与战爭物資相同。

在农业方面，情形也是如此。在当前情况下，进步的农业也就是工业化。但进步的农业并不保证一个共产党政权不倚賴外界。它在国内将使这一政权倚賴农民，即令农民是自由合作社的社員。因此，尽管集体农庄的生产极低，而在經济計划中，鋼铁却占有优先地位。这由于政治权力之策划必优先于經济的发展。

苏維埃或共产党的計划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計划。它既非生产技术发展的結果，也非"社会主义"創始者的意識发展的結果。相反地，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政府及所有权发展的結果。今天，技术及其它因素正在影响这种类型的計划，但这些其它因素从未停止其对这种类型計划发展的影响。这一点极值得注意，因为这是了解这一类型計划的性質，以及了解共产主义經济能力之性質的主要关鍵。

这种經济与計划能达成不同的結果。由于集中一切手段来达成某一特殊目的，因而使权力的行使者能对某些經济部門作高速度的发展。苏联在某些部門已获致的成就是世界任何地方至今所未达到的。但是，从全面的經济观点着眼，当我們考虑到其它部門的落后情况时，就看出这种突出的成就显然并不合理。

誠然，一度落后的俄国，就其若干最重要的經济部門而論，在世界产量方面已跃居第二位；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大陆国

家。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級，一个广大的技术知識阶层，以及为生产消费品所需的物资均已創造出来。独裁政治旣并未因此受到多大削弱，也沒有理由相信其生活水平不可能随其国家經济力量的增长而改善。

計划只是所有权及政治上种种考虑的一种工具，而所有权和这些考虑使計划不能絲毫削弱政治上的独裁，也不可能提高生活水平。在一个唯一的集团的完全壟断下，經济上的計划与政治上的計划都以扩大其国内及全世界的权势与利益为目的，因而继續阻碍生活水平的改善与經济的和諧发展。自由的缺乏，无疑地是这种停滞现象之所以发生的最后及最重要的原因。在共产主义制度中，自由已成为重要的經济問題，同时也是一般性的問題。

五

共产党的計划經济掩盖着其本身内在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无政府状态。尽管共产党的經济是計划的，它可能是人类社会史中一种最浪費的經济制度。这种說法似乎很奇怪，尤其是想到其若干个别經济部門与整个經济相对的迅速发展时，更令人觉得这一說法言过其实。但这一說法却有其确切的根据。

一个壟断性的集团，纵然不由其狭隘的所有权及意識形态的观点考虑任何事物，包括經济在內，也无法避免惊人的大量浪費。这样一种集团，如何能够有效而节約地管理一个复杂万分的现代化經济？这一种經济，不論計划拟得如何周密，天天总是出现内部和外部种种互相冲突的趋势。旣缺乏任何形式的批評，甚至沒有任何形式的重要的建議，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浪費与停滞。

由于此种政治的及經济的万能主义，即使是最好的意图，也无法避免浪費的行为。这些浪費使整个經济要付出多少代价，幷无人加以注意。由于迷信的共产党对农民的恐惧及其对于重工业不合理的投資，而使农业陷于停滞，这对一个农业国家是多么大的損失？将資金投放在无效率的工业要付出多少代价？一个迟滞的运輸系統所付代价又如何？因工資过低而致工人"偸懶"与怠工，其代价又是多少？产品质量低劣又付多少代价？所有这些代价均无人計算，也无法計算。

共产党領袖們处理事情的方式往往与他們自己的教条相反，那就是說，只从个人的观点出发。他們管理經济的情形也是如此。但經济是最不容忍武断行事的一个領域。即使他們希望做好，共产党的領袖們也不能顧及整个經济的利益。为了政治上的理由，統治集团常常决定什么是"最为必需"，"最关重要"，或什么是一个运动中"具有决定性"的。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它推行某項工作，因为这一个集团幷不害怕失掉权势或財产。

当某些事情停止进展已很明显，或当大量浪費成为显著事实时，共产党的領袖們也不时进行批評或自我批評，幷总結出經驗。赫魯曉夫曾批評斯大林的农业政策。铁托批評过自己的政权投資过多，幷浪費了很多的錢。奥哈布也曾批評自己"有条件的"忽視了生活水平。但其本质依然未变。同样的人运用同样的方法継續同样的制度，直至罪行及"違法行为"昭彰为止。但損失一經发生即不能弥补，因而政权及党对于这些損失是不負任何責任的。他們曾"注意"这些錯誤，这些錯誤也应予"糾正"。于是一切又再从头干起！

从未看到哪个共产党領袖，因非生产性的耗費或惊人的浪費而受到处分。但許多領袖却因为"意識形态上的偏差"而遭免职。

在共产主义制度中，盗窃与侵吞公款是不可避免的。驅使人們盜窃“国家財产”的原因幷不只是由于穷困；而事实上是由于这些財产似乎不屬于任何人。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变成无价值，因而創造一种有利于盜窃与浪費的气氛。1954年，仅南斯拉夫一国即发現两万件以上的盜窃“社会主义財产”的案件。共产党的領袖們，在处理国家財产时，就像是他們自己的財产；而同时他們在浪費这些財产时又像是屬于别人的。这就是共产主义制度下所有权与政府的性质。

最大的浪費还是那些无形的浪費。这就是人力的浪費。千百万人民在无兴趣的情况下从事迟緩而不出活的工作，加上那些被认为非社会主义的一切工作之停止进行，这些都屬于可計算而不可見的巨大浪費，而这种浪費从沒有一个共产党政权能够避免。即使他們是亚当斯密“劳动創造价值”学說的信徒（这一理論其后为馬克思所采取），但这些权力的掌握者，对劳动及人力的使用却极少注意，认为它們不值一文，随时可以由其它事物来代替。

共产党对“資本主义复辟”的恐惧，以及对由其狹隘的阶級“意識的”动机所造成的經济后果的恐惧，已浪費了国家巨大的財富幷阻碍財富的发展。由于国家幷不能維持或发展全部工业，因而全部工业已遭受摧毁；只有那些屬于国家的工业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工业。

像这样的政策，一个国家究能推行多远和多久？起初共产主义虽然必需工业化，但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就会使共产主义的政府及所有权的形式成为多余的，这一时刻即将来到。

由于共产主义經济的孤立性质，浪費非常惊人。每一个共产主义經济制度基本上只是一种自足性經济，其所以要达成自足的理由是由于它的政府及所有权的性质。

沒有一个共产党国家曾經使其对外貿易超过傳統商品交換的范圍；甚至南斯拉夫，由于与莫斯科的冲突而必須与非共产党国家保持更广泛的合作，也未能超过傳統易貨的范圍。与其它国家合作进行大規模的有計划生产尙未办到。

在共产党的計划經济中，尤其极少顾及世界市場或其它国家的生产。由于这一原因，及由于意識形态上的动机及其它动机，共产党政府极少顾及自然条件对生产的影响。他們时常建設許多工厂而无足够的原料供应，他們几乎从不注意世界的物价及生产水平。他們所制造的若干产品，其成本往往数倍于其它国家。同样地对于那些在生产力上可以超过世界的平均水平，或生产成本可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工业部門，他們也未加注意。对一切新工业都加以发展，即使世界市場已充斥他們将制造的这类产品。为达成这种寡头专政的“独立”，这些代价都要由劳动人民来支付。

这是所有共产党政权共同問題之一。另一問題是“居領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进行一种无意識的竞爭，以期超越世界上最高度发达的国家。这一竞爭要付出多少代价？并导致什么后果？

在某些經济部門中，苏联或能超越最先进国家。由于无限制浪費人力，由于低微的工資，及忽略其它工业部門的发展，这一点也許能做到。但在經济上是否合理，那是另一問題。

这样的計划本身就具有侵略性。苏联决定将鋼铁及原油的生产放在第一位，而不惜降低生活水平，非共产主义世界对于这一事实不知有何看法？如果他們继續从事重工业竞爭而只能进行极小額的貿易，則所謂“共处”与“爱好和平的合作”还有什么意义？如果共产主义的經济发展成为自足性經济，并且主要是为意識形态上的理由向世界滲透，則合作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浪费国内和世界的人力与财富的經济計划及經济关系，除从共产主义寡头政治的观点出发外，无論从任何角度观察，均屬不合理。技术的进步与主要需要的变化，使經济中某一部門在某一时期显得重要，而在另一时期則其它部門又显得重要；无論就某些国家或就全世界来說，都是如此。如果从現在算起的五十年中，鋼铁及石油丧失其今日所占的重要性，将会发生什么結果？共产党的領袖們，对于这一問題及其它許多問題，都不加考虑。

将共产主义經济，尤其是苏联經济，与世界其它国家联系起来，并使这些經济向世界滲透的种种努力，实在是远落于这些經济制度的实际技术能力及其它能力之后。在目前阶段，这些經济制度可以与世界其它地区进行比实际上已实現的合作大得多的合作。共产党国家之所以不能利用其能力与外界进行合作，而拚命为了意識形态理由及其它理由向外界滲透，追究其根源是在于共产党对經济的壟断以及他們必須維持本身权力。

列宁曾說，政治就是一种“集中的經济”，这話說得很对。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情形完全相反；經济已成为集中的政治；即政治在經济中起几乎决定性的作用。

斯大林曾将苏联市場与世界市場隔离，而建立一个“世界社会主义”市場。苏联的領袖們，至今仍效忠于此項計划，这可能成为世界紧張及世界性浪费現象的主要原因。

所有权的壟断与生产方法的陈旧——不論是屬于哪个国家或哪种形式——均与世界經济的需要相矛盾，自由与所有权的对立已成为一世界性問題。

在落后的共产党国家中，廢除私人或資本主义的所有权，使經济获得迅速发展——也許不是平稳的发展。这些国家已成为不平凡的新兴强国，由自大与狂妄的阶級尝着权威与所有权的

果实。但这种发展并不能解决与十九世紀正統的社会主义有关的任何問題，甚至也无法解决与列宁有关的問題；更不能保证在不发生国内困难与动乱的情形下促使經济进展。

尽管共产党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并在經济上也有迅速的，也許是不平衡的成就，但自从它获得全面胜利的时候起，共产主义經济制度即已暴露出很深的裂縫与弱点。虽然它还沒有达到权力的最高峰，但已陷入困难局面。它的前途越来越不稳定；为着生存，共产主义經济制度必須在国内外从事激烈的斗爭。

第六章　对思想的专制統治

一

虽然共产党人在取得政权时，他們对思想所施行的专制統治簡直精密得如医生临床工作一样，但在共产主义的哲学里，寻找对思想专制統治的根据，也只能找到一部分。共产主义的唯物論，也許比同时代的任何世界观，都要具有更多的排它性。它把它的信徒們推向一种处境，使他們簡直不可能采取任何其他的观点。假如不把这种观点同特殊形式的政府及所有权等联系起来看，则共产主义对于人类思想的可怕的摧毁及压制方法，还是不能仅由共产主义的唯物論本身就可以解釋得通的。

任何一种意識形态或意見都企图把它自己說为唯一正确而完滿的理論。人类思想的本性就是这样。

馬克思与恩格斯理論与众不同之点，幷非由于他們所提出的理論的本身，而却是由于他們运用这些理論时所用的方法。他們不承认同时代人們思想里的任何科学及进步的社会主义的价値，常常一古脑儿称之为“資产阶級的科学”；这样一来，一切认眞的討論和研究都被他們預先阻止了。

馬克思与恩格斯有一种特别狹隘及排它的观点，从这里，共产主义后来可以抽出为它意識形态上不容異說的內容。这个观点就是：一位科学家、思想家或艺术家的政治观点，与他們作为思想家或艺术家的眞实的或科学的价値，这两者之間具有不可分性。所以，假如一个人被发現屬于政治上的一个敌对陣营的話，那末，他的一切其他方面的目标或工作就都应該加以

反对或抹煞。

馬克思与恩格斯的这种立場，仅能部分地解釋为这是由于財产所有者以及权力掌握者剧烈反对的結果，而这种反对是在所謂"共产主义的幽灵"一出現时就激动起来的。

馬克思与恩格斯的排他性还有另外一些东西造成幷使其加强的，而这些东西是植根在他們的学識中的：他們自信已探研了各种哲学的奥秘，因此他們以为假定有誰要达到任何有意义的結論，而不以他們的世界观为基础的話，那簡直是不可能的。幷且，由于当时的科学气氛，又由于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需要，馬克思与恩格斯都漸漸以为，凡对于他們自己不重要或对于他們的运动不重要的东西，甚至在客观意义上說，也都不重要了；那就是說，凡与运动不发生关系的东西一律不重要。

結果，馬克思、恩格斯两人进行本身的工作，幷不了解同时代的許多最重要的思想，也輕視他們同一个运动內部所有与他們相反的意見。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沒有提到过当时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叔本华，也沒有提到像泰因（Taine）这样著名的美学家。对于当时著名的作家与艺术家也沒有提及。甚至于也沒有說到那些追逐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屬的意識形态及社会潮流的人們。馬克思、恩格斯对付他們在社会主义运动里反对者的办法完全是凭凶暴与不容異說。这对于蒲魯东的社会学来說也許是不重要的；但对于社会主义及社会斗爭的发展来說，特别在法国，却是非常重要的。同样的情形也可适用到巴枯宁。馬克思在他的《哲学的貧困》一书里，除了把蒲魯东的意見一笔抹煞外，他又輕蔑地說了好多的題外話。他同恩格斯两人以同样方法对付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拉薩尔以及他們自己运动內部的其他反对派。

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們却也很仔細地注意到他們那个时代

的許多有意义的知識界的現象。他們接受达尔文的学說。他們特別了解过去的許多潮流——古代的及文艺复兴时代的——因为欧洲的文化就是从这里面发展出来的。在社会学方面，他們借用了英国政治經济学派的理論(亚当·斯密与李嘉图)；哲学方面，借重了古典的德国哲学(康德、黑格尔)；而在社会理論方面，則借重于法国的社会主义，或由法国大革命后所发生的潮流。上述潮流都是些偉大的科学、知識以及社会潮流，它們造成了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民主与进步的气候。

在共产主义的发展上，显然有它的邏輯及一貫性。馬克思比列宁科学一点，客观一点；而列宁主要的是一个偉大的革命家，他是在俄国沙皇的专制制度，半殖民地的俄国資本主义，以及全世界的壟断主义者的势力范圍的紛爭等环境中成长的。

靠着馬克思，列宁对人說教：就全部历史說来，唯物主义是一貫进步的，而唯心主义則是反动的。这样說不仅是片面与錯誤的，而且它又把馬克思的排它性加强起来。如此說教也是由于对历史哲学的知識不够。在1909年，当列宁写那本《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的时候，他并不十分熟悉任何偉大的哲学家，不論是古典的或現代的。而为了要战胜一切反对派，他們的观点阻碍了他的党的发展，于是列宁就拒絕了一切与馬克思主义观点不合的东西。在他看来，凡不合于原始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都是錯誤的，毫无价値的。但必須承认，在这方面，他的著作可以說是合乎邏輯而又有說服力的教条主义的出色典型。

既然相信唯物主义永远是屬于革命的及破坏性的社会运动的一种意識形态，于是列宁就得出了片面的結論；那就是說，唯物主义通常都是进步的——甚至在研究方面以及在人类思想的发展方面都是如此——而唯心主义則是反动的。列宁把形式和

方法同内容以及同科学发現都混为一談。事实上只要一个人在他的思想上是唯心主义者，就已經足够使列宁把他的眞价值以及他的发現的价值完全抹煞。所以，列宁把他政治上的不容異說实际上扩展到全部人类思想史的范圍了。

欢迎十月革命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于1920年已准确地道出了列宁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教条主义之眞諦：

> "然而、对于布尔什維主义的另一方面，我根本上持着不同意見。布尔什維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主义；它实在也是一种宗教，具有細致繁瑣的教条以及使人感悟的經典。当列宁要证明一些理論的时候，如果可能，他总是引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他不仅相信土地及資本应該共有，而且它們的产品应尽可能地平均分配。他是抱住了一大堆有意养成的教条式的信仰——例如哲学的唯物論——而自得其乐的人，这些信仰也許是对的，可是，就科学尺度来說，却不能确实证明它們是对的。对于客观上可疑的事情采取一种不惜一战的确信，实在是一种旧习惯；世界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已逐漸摆脫这种习惯，而走向建設性的以及有成果的怀疑主义的气质，而这个气质也构成科学的境界。我相信这种科学境界对于全人类是无限的重要。假如說，一个更为公平的經济制度，須先封閉了人类自由思考，而且把他們重行投入中世紀知識牢獄的深淵，方可达到的話，那末，我就认为这代价未免太高了。自然不可否认，在某一个短暂的时期之內，教条式的信仰有利于斗爭。"①

---

① 引自《布尔什維主义：实踐与理論》(Bolshevism: Practice and Theory)，紐約，哈考特、勃雷思与霍威(Harcourt, Brace & Howe)出版公司出版。

罗素所說的还是在列宁的时代。

到了斯大林却更进了一步；他"发展"了列宁的理論，可是他缺乏列宁的学識，也沒有列宁深刻。經过一番仔細研究之后，可得到一个結論：原来斯大林，这个被赫魯曉夫认为是当代"最优秀的馬克思主义者"的人，却沒有念过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著作《資本論》。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再加上他持有极端的教条主义，他甚至于不需要再看一看馬克思的經济研究著作，就可以建筑起斯大林牌的"社会主义"了。斯大林也不深知任何哲学家。他对于黑格尔的态度，好像他对付一个"廢物"一样，硬說"普魯士专制主义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的說法是黑格尔提倡的。

可是，斯大林却熟讀列宁的著作。斯大林借助于列宁之处更大于列宁之借助于馬克思。斯大林只对于政治史方面，特别是俄国的政治史，具有相当的知識，而且他的記忆力非常好。

除了这些知識以外，斯大林为了扮演他那个角色，实在也不需什么更多的东西了。凡与他的需要及观点不合的，他可以一律宣布为"敌对的"，而且加以禁止。

这三个人——馬克思、列宁、斯大林——不管是在性格方面，或在表达的方式上，都形成了强烈的对照。除了是一个革命家之外，馬克思还有几分純科学家的味道。他的作風是动人的，奇異的，豪放的，而且具有一种胜人一筹的机智。列宁呢，就簡直好像是革命的化身。他的作風是热情奔放的，鋒利的，而且前后一貫。斯大林则以为他的力量来自对于人类一切欲望的滿足，而且以为他自己的思想就是人类思想的最高表現。他的作風平淡，单調，不过他那过份簡单化的邏輯以及教条主义，对于遵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以及普通人，却具有說服力。它里面也含有教会神父們著作中的簡单明了的風格；但斯大林这种作風并

不是他青年时代宗教生活的結果，而实在是在原始情况下，或是教条化的共产主义者的环境所产生的表現方法。

至于斯大林的信徒們不独缺乏斯大林本人那种粗魯的內在凝集力，而且也缺乏他那种武断的权力与信心。虽然这些人在任何方面都是一个常人，但他們具有极强烈的現实感。既然因为他們完全为官僚政治的現实所縛，而不能产生任何新的制度与观念，那末他們唯一的本領就是窒息任何新事物的創造，或使之变为不可能。

这些情形就是共产主义的意識形态在其教条性及排他性方面的发展經过。而所謂"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导致一个新阶級及其控制权的巩固，这一控制权不只是受制于一个意識形态，甚而还受制于某一个人或寡头集团的思想。这样一来，結果就引起一般知識之衰落，以及該意識形态本身的貧乏。与这同时，对于其他观念，甚至对于人类思想本身的不能容忍的程度，也已增加。所以，該意識形态之进步、以及它的构成眞理的因素，已因其信徒們实际力量的增大而相应地衰退。

因为愈来愈片面而排它，当代的共产主义更其不停地制造許多片面的說法，而且竭力企图为之辯护。一眼看上去，好像它的許多观念，个别的說，似乎都对。可是，其中充滿謊言，不可救葯。片面的东西被夸大而弄到歪曲眞相的程度；而且，其中謊言的口气愈肯定、愈动人，它也就愈能加强它的領袖們对于社会的壟断，因而也就是加强他們对于共产主义理論本身的壟断。

二

把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則这个基本論点是所有共产党人都不得不采取的立場，这就必然要在实际上引

起在一切知識活动領域里的专制。

假使原子的运行是不依照黑格尔—馬克思主义者的斗爭規律，或不依照所謂矛盾的統一規律，而发展为較高的形式，可怜的物理学家能有什么办法？假如宇宙的运行根本不理共产主义的辯证观，那末，天文学家又能有什么办法？假如一切植物不依照李森科—斯大林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級之間应該和諧及合作的理論生长，那末，生物学家又有什么办法？这些科学家們因为不能率直扯謊，他們就必須准备因他們的"邪說"的后果而受难。如果要想使他們的发現被接受，就必須使他們那些发現完全"符合"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公式。所以科学家們經常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不知道他們的观念与发現，是否会妨害到官方的教条。因此，連对于科学，科学家們也就只好采取了机会主义及妥协的办法。

其他各种知識分子的遭遇也正相同。在許多方面，当代的共产主义都令人想起那些中世紀时宗教教派的排它性。有一位名叫杜契奇（Jovan Dučić）的塞尔維亚詩人，在他那本《忧患与安祥》（Tuge i vedrine）里，曾經論到加尔文教派，它所談的似乎可与共产党国家內知識分子的处境联系起来：

"……加尔文，这个法学家兼教条主义者，凡是他在火葬場上沒有焚化的东西，他也要使它在日內瓦人民的灵魂里扎根。在这些人的家庭里，他引进了宗教的災难及神圣的遁世观念，所以甚至到現在，那里也还充滿着阴气森森及黑暗；他硬教人对于一切欢乐与快乐都仇恨，而且又用命令譴責詩歌和音乐。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以及主宰一个共和国的暴君，他又鑄造了铁一样的法律，像鐐銬一样，套在全国人生活的头上，甚至管理到家庭的感情。在宗教改革运动所培养的人物中，加尔文也許是那些革命人物中最冷酷无情

的人，而他所傳授的圣經則是生活里最令人灰心的經文……加尔文决不是一个新的基督教使徒，他們願望恢复基督教教义的原始的純洁，朴素，以及柔和，宛如基督教剛从拿撒勒的天空傳播出来时的情形。原来加尔文这人却是一个亚利安的苦行僧，当他把自己和当时的政权断絕关系的时候，他也同时把自己与其所奉行的教条的一个基本原則——爱——完全断絕关系了。他另創一种人，这些人是誠恳而充滿了道德，但同时却又充滿了对于生活的怀恨，对于幸福的怀疑。世上沒有比这更严厉的宗教，比他更可怕的先知了。加尔文使日內瓦的人民都麻木不仁，永远不可能享受任何快乐。世界上从来沒有人們像这样，宗教为他們带来了如此多的災难与悲慘。加尔文是一个卓越的宗教作家，其对于法文純洁性的重要也就如同馬丁路德之对于德文淨化的重要一样，馬丁路德是将圣經譯成德文的人。不过，他也是一个神权政治的創始人，而这个神权政治同罗馬教皇的王朝一样像一个独裁政治。当他宣布着他在解放人們精神人格的时候，实际上，他却在把人的世俗人格降低到最黑暗的奴役状态。他使人迷乱，而且也沒有以任何方式为生活带来光明。他改变了很多的东西，但一无所成，毫无貢献。差不多在加尔文之后的三百年，也在日內瓦，法国文学家斯登达尔注意到那里的青年男女們的談話，只談及'这位大牧师'及其最后一次讲道，同时，这些人如何对于加尔文的那些說教背誦如流。"

除此之外，当代的共产主义也包含着英国克倫威尔統治下的那些清教徒們的教条式的排它因素，以及法国雅各宾党人所表現的政治上不容異說的因素。但是，共产主义与它們之間有着許多重要不同点。清教徒絕对相信圣經，而共产党人則相信科

学。共产党人的权力，比之雅各宾党人的权力，更完全得多。还有，在彼此能力上也有許多的不同；向来沒有一个宗教或独裁政治，能够希望获得像共产主义的制度那样的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权力。

共产党的領袖們都相信他們已在走向創造絕对幸福的路途上，而且一个理想的社会也和他們的权力增长成比例地成长。有人讲过一句笑話，共产党領袖們已經創造了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了——但只是为了他們自己。事实上，这些共产党領袖們确也把他們本身与全社会以及全社会的許多願望都当作一体。专制主义总把自己和对于人类絕对幸福的信念打成一片，虽然它不过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暴政而已。

时代的进步已經把共产党政权掌握者变为"人的意識"的吹捧者。而在"社会主义建設"的过程中，他們对于"人的意識"的关怀随着他們权力的增加而增加起来了。

南斯拉夫也沒有能繞过上述的演化情形。南斯拉夫有些領袖們，在革命的时期里，也曾經强調过"我們人民的高度意識"；这只是当"我們人民"或他們中間的一些人，积极拥护这些領袖們时，他們才这样說的。不过，依照南斯拉夫領袖們的說法，現在上述人民的"社会主义"意識却非常低；因而，必須等待民主政治的到来，才能把它提高起来。南斯拉夫領袖們曾公开地說及这一事实，"当社会主义意識长成的时候"，他們也就准备賜給民主；他們所信任的这种意識是可以通过工业化的途徑自动达到的。在那个情形未到来之前，这些主張把民主一点一滴分批施舍給人民的理論家，其实际上所行的却是完全和民主相反；他們主張，为了未来幸福和自由着想，他們有权去阻止任何与他們不相同的其他观念或意識的存在，即使是最輕微的表現也不許可。

至于苏联的領袖們，只有在开始的时候，他們还不得不被迫

东閃西让地允許“将来”給人民以民主。但目前他們却干干脆脆地說，这种自由在苏联已經創立了。当然，甚至他們也感到自由已在他們下面发生作用。他們不停地“提高”人民的意識，他們劝人民“生产”，他們把馬克思主义的公式以及干燥无味的領袖們的政治观念，不断地填塞到人們的脑中。更糟的是，他們还不停地强迫人民承认他們对于社会主义的忠誠，并承认他們相信他們領袖們所作的一切允諾都永远不会錯而且是切实的。

一个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公民，經常受到他良心痛苦的压迫，唯恐自己違反了什么禁律。他总是战战兢兢，因而他必須处处表示他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敌人，就好像在中世紀时，一个人必須时时表示出他对于教会的忠誠一样。

学校制度以及一切社会的与知識的活动都是促成着这种类型行为的。一个人从生到死都一直在执政党关怀之下，关怀他的意識，也关怀他的良知。新聞記者，理論家，雇佣的作家，特設的学校，批准的官方見解，以及无数的物质手段都被动員起来，被运用起来，以“提高社会主义”。說到最后，所有报紙都是官办的；无綫电及其同类的东西，也都如此。

不过，这一切手段所收获的效果并不大。在任何情况下。效果与所花費的力量及方法都不相称，只有新阶級算是例外，不管怎样，他們总是信以为有效果的。它們已使一切与官方不同的意識都不可能表現出来，且在与相反意見斗爭方面也收获相当的效果。

纵使在共产主义統治下，人們也还在思想，因为任何人也无法停止不想。而且他們所想的与官方所規定的想法不相同。他們的思想有两面——一面是为他們自己本身的；另一面是对公众的，对官方的。

甚至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人們也还沒有被千篇一律的宣

傅愚弄得他們不可能得到眞理，得到新观念。仅就知識領域而論，寡头政治执政者的一切計划所引起的結果，是生产少，而停滞、貪污、腐化的現象多。

这些寡头与救主，这些以保护者自居，不让人类思想流入“罪恶的思想”或“反社会主义路綫”的人物，这些貪购廉价然而却是仅有的一点消费品的不顾天良的人物——这些坚持死硬、不变的古旧观念的人物——已使他們人民的求知动力受阻并陷于冻結了。他們想出了一句最反人道的口号——“根絕人的意識”——而且他們就依照这句話去做，好像他們是在清除树根与莠草，而不是在对付人类的思想。不过，恰恰因为他們窒息了他人的意識，削弱了人类的智慧，使得人們鼓不起勇气，立不起志願，以致后来連他們自己也变得衰老了，脑中空洞无思想，而且完全缺乏那种由无私的思考所激发的求知热情。这就弄到像一个戏院沒有观众：那些演員就只好自演自唱，自己狂欢。他們的思想如同他們吃飯一样的机械：他們的脑子所以思想是应付最基本的需要。这就是今天那些共产主义說教者們的情形。他們是警察，同时也是一切傳达人类思想工具——如报紙，电影，无綫电，电視，书籍，以及其他同类的东西——的所有人，而且他們又是一切維持人类生活物质——如食物，以及避風雨的屋子——的所有人。

这么說来，难道沒有理由把当代的共产主义和宗教的教派相比嗎？

三、

虽然如此，所有共产党国家，也还是完成了若干技术上的进步，纵使这些进步是一种特殊进步，而且也只見于某些特殊时

期。

工业化既是那样的迅速，自然要产生一大批技术知識分子；这个知識分子阶层，即使在质的方面并不特别高，可是它却可以吸收許多人才，并且也可激发发明的智慧。所以，帮助某些經济部門加速工业化的理由，也可作为一个刺激发明的力量。在軍事技术方面，无論在第二次大战中或自第二次大战以来，苏联并不落后；而苏联在原子能的发展上也沒有远落在美国之后。虽然官僚制度使它难于采取革新措施，但工业技术却到底也进步了；有的时候，許多发明物要擱置在国家机关的仓庫里数年之久。而生产組織的漠不关心又时常把发明力更进一步窒息了。

因为共产党的領袖們都是些实际人物，所以他們立刻和技师們及科学家們合作起来，而不再过多注意他們"資产阶級"的观点。这些領袖們看得很清楚，沒有技术知識界的合作，工业化就不可能完成，并且这个知識界本身也不可能变为危險分子。也就和在其他方面一样，共产党人关于这个知識界也有一套过分簡单化、然而却大致有一半对的理論：其他阶級对于为它服务的专家們向来都付給薪金。那末，为什么"无产阶級"或这个新阶級，不可以也这样做呢？根据这种論点，他們立即就发展一种工資制度。

尽管他們有技术上的进步，事实上在苏維埃政府之下，并沒有获得任何偉大的現代科学发明。仅就这一点而論，苏联还可能不及沙皇时代的俄国，那时候，虽然在技术上极为落后，但确有許多划时代的科学发現。

即使技术上的原因使科学发明非常困难，可是这个困难最主要的理由还是社会性的。这个新阶級非常注意，务必使它对于意識形态的壟断不致受到危害。而每一个偉大的科学发明是那个发明者思想上先有一个改变了的世界观的結果。一个新的

观念往往对于已經被采取的官方哲学并不合式。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每一个科学家都必須悬崖勒馬，以免他的理論不符合于规定的需要的教条而被宣布为“異端”。

同时，使发明工作变得更为困难的是迫使人們相信官方的見解，即馬克思主义或辯証唯物論，是一切科学、知識以及其他活动的領域里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在苏联，从来沒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家沒有碰到过政治上的麻煩。这有很多的原因，但有一种原因是因为与官方的路綫相对立。在南斯拉夫，这类事发生較少；而相反地，却有許多例子证明对于那些“忠誠”的、然而低劣的科学家們有偏爱。

共产主义制度刺激了技术上的进步，但也妨碍了每一偉大的研究活动，自于思虑的不受干扰是研究活动的必需条件。听起来这些話也許有点矛盾，但事实确是如此。

虽然共产主义制度相对地阻碍科学的发展，但它們却絕对地阻碍任何知識的进步及发現。这个制度以一个派別哲学的排它性为根据，显然是反哲学的。在这个制度里面，从来沒有产生过，也不可能产生出一个思想家，特别是一个社会思想家——这里不把那些专权的人物算在思想家内，虽則他們一般說来也是“主要的哲学家”和“提高”人的意識的大师。在共产主义中，一个新的思想，或一个新的哲学及社会学說，必須要循着間接的途徑表达出来，通常是經过文学或某些艺术部門的途徑。为了要能在世界上露面并开始生存下去，任何新的思想必須第一步先把自己隐藏起来。

在所有科学部門和所有思想之中，社会科学以及对于許多社会問題的考虑往往遭遇最坏的命运，它們很难生存下去。只要它是个社会問題，它的每一部分都必須依照馬克思及列宁的理論，或依照領袖們所壟断的理論来解說。

历史，特别是关于它自己——即共产主义的——这个时期的历史，是不实在的。史实的随意删略与假造，不独是被允許的，而且也是普遍現象。

人民的知識遺产也被沒收了。这些壟断者的举动好像在表示着，一切历史之所以发生，只是要让他們这些人自己出現在世界之上。他們以自己的类型及形式来衡量过去以及过去的每一件事，而且他們又用一个划一的尺度把所有的人类及各种現象都分为“进步的”与“反动的”两大类。就在这种方式下，他們竖立了紀念碑。他們抬高了侏儒，毁掉了偉大人物，特别是与他們同时代的偉大人物。

他們所用的“唯一科学”方法对他們自己确是非常适宜的，因为这个方法可以保护并为他們对于科学与社会的包办控制辯护。

四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艺术方面。在这里，对于已經确定的形式和平庸的观点越来越偏爱。这是可以了解的：因为沒有任何艺术不具有它的思想，或不具有对于意識的相当影响。可是統治者的先决条件却是对于一切思想的壟断，塑造意識。在艺术上，共产党人是傳統主义者，大部分因为他們需要继續壟断人民的思想，但也因为他們的无知及偏見。他們之中有些人，在現代艺术上，也容忍某种民主的自由；不过这却仅仅是他們承认对于現代艺术的不懂，所以认为必須容忍一点。列宁当时对于未来派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就是抱着这样的感觉。

虽然如此，可是那些落后的民族，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除了技术的复兴之外，却也能体驗到一种文化复兴。文化虽然大部分

以宣傳的形式出現，但人們接触文化的机会总可以較多。新阶級本身也对文化傳播很注意，因为工业化提出需要質量更高的作品以及需要扩大求知的机会。于是学校网及职业性的艺术机构就都发展得非常快，有时甚至超过了实际需要及可能。所以，艺术上的进步是不可否认的。

一次革命以后，在統治阶級还沒有建立完全的壟断之前，許多有意义的艺术品通常却已經創造出来了。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前的苏联就是这种情形；当前的南斯拉夫也是如此。这情形好像是革命把蟄伏着的天才喚醒了起来，纵使那个由革命所产生的专制主义对艺术的窒息已愈来愈强。

窒息艺术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是对于艺术的知識与理想主义方面的反对，一是阻止艺术形式的改革。

苏联在斯大林时代，事情已經发展到这种地步，就是除了斯大林自己所喜欢的以外，其他的一切艺术表現形式都被禁止。同时，斯大林的鉴賞力并不很高明；他耳朵听不大清楚，他又偏爱八音节和亚历山大式的詩歌。杜次溪(Deutscher)說过，斯大林的文体变成了全国的文体。在艺术形式上采用官定观点，与采用其他官定思想一样，都是无所选擇的。

不过，虽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也并非永远如此的，而且也并非不可避免必須这样做。苏联在1925年曾經通过了一項决議案，其中这样說："在文学形式的領域內，以整个党来說，决不只致力于一种目标"。可是党并不因此放棄所謂"意識形态的帮助"；就是說，党不放棄它对于艺术家們的意識形态及政治上的控制。这就是在艺术領域里，共产主义所达到的最大限度的民主了。南斯拉夫領袖們今天的处境也相同。1953年以后，开始舍棄民主形式、实施官僚制度的时候，那些最原始与最反动的因素就得到了鼓励；对于"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瘋狂迫害开始

了，它的公开目的就是在于控制一切艺术的形式。轉瞬之間，整个的知識界都一变而为反現政权了。因此，政府不得不退后一步，通过卡德尔的一次演說，宣布党并不規定艺术形式的本身，可是它不能允許“反社会主义意識形态的違禁品”出現，那就是說，当局不允許它认为“反社会主义”的观点出現。布尔什維克党曾經在1925年采取过同样的立場。这就构成了南斯拉夫政府对于艺术所定的“民主”限度。但在南斯拉夫領袖們中，大多数人的內心态度却并沒有因此有所变更。在私底下，他們仍然认为整个知識界及艺术界并“不可靠”，有“小資产阶級”意識，或用較溫和的話来說，就是“意識形态的混乱”。南斯拉夫最大的报紙（《政治报》）1954年5月25日曾經引用过铁托的一句“令人难忘”的話：“一本好的教課书比一本小說有价値得多”。接着发动了有周期性的狂热攻击，不断地攻击艺术里所謂“頹廢”，“破坏性的观念”，以及“敌对的观点”等等。

与苏联文化不同，南斯拉夫文化至少已經隐盖了，而不是摧毁了关于艺术形式上許多不滿及激烈的意見。这在苏联文化里从来就沒有可能。南斯拉夫文化的上面只是吊着一把劍，但在苏联，这把劍却早已刺进了文化的心臟。

相对的自由形式是存在的，因为共产党人只能間歇地加以鎮压，不过这种自由不可能完全使一个富于創造性的人自由。艺术必定通过形式本身来表現新的观念，纵使表現的方法是間接的。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虽然艺术可以享有最大的自由，但在它所被允許的自由形式，与政府对于一切观念的强迫控制之間，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这种矛盾常常要暴露出来，有时出現在对“違禁品”观念的攻击中，有时出現在艺术家的作品里，因为它們被迫用某些特殊的形式。它之所以暴露，主要的是因为政府的无限壟断主义願望以及艺术家們难以抗拒的創作

願望之間存在着冲突。实际上，这也是存在于科学的創造性与共产党教条主义之間的冲突；不过現在它被轉移到艺术的園地里来了。

任何新的思想或观念，都要先在內容方面檢查一番，批准或不批准，然后再装到一个无害的框子里去。正如对其他的冲突一样，共产党的領袖們对于这个冲突也无法解决。不过，如我們所已經看到过的，他們却可以时时自己脫身出来，通常是以艺术創作的眞自由作为牺牲。在共产主义制度里，由于这个矛盾，以致不可能发展出眞的艺术作品，也不可能发展出艺术理論。

一件艺术品，在它本质上，通常就是对于某一特种情势或对某一特种关系的批評。因此，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任何艺术的創作，如想以实际題材为基础，那簡直是不可能的。只有对于某一特种情勢的称頌，或对于現制度反对者的批評，是被允許的。在这些条件下，艺术是不会有什么价値的。

在南斯拉夫，許多官員及若干艺术家都在埋怨，为什么南斯拉夫沒有任何足以表現"我們的社会主义現实"的艺术作品。可是另一方面，在苏联却創作出无数的艺术作品，它們都是以实际題材为基础的；不过，这些作品却幷不如实地反映眞象，所以它們沒有什么价値而很快地为群众所唾棄，过后甚至也为官方所批評。

南斯拉夫与苏联所用的方法虽不同，但最后的結果則完全一样。

五

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中 現在都流行着所謂"社会主义現实主义"論。

可是在南斯拉夫，这个理論已被粉碎，現在仅有最反动的教条主义者仍在坚持着它。在这里，也如在許多其他方面一样，政权本身是有力量阻止任何不同意的学說发展的，但它却沒有力量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其他东欧国家的情形也可以說是一样。

"社会主义現实主义"甚至不是一个完全的理論体系。高尔基是首先用这个名詞的人，也許是由自己的現实方法所激发起来的。他的观点是說，在不成熟的当代"社会主义"情形下，艺术必須以新的或社会主义观念为灵感，而且必須尽可能地忠实的描写現实。这是它原始的意义。后来，愈来愈多地借有許多其他的意义了——如典型观念，强調意識形态，党的团結等等——这些是由其他理論中借来的，或是硬加进去的，都是为了要满足共产党政权政治上的需要。

因为沒有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論，所謂"社会主义現实主义"，在实际上的意义不过是共产党人对于意識形态的壟断而已。它所要求的不过是以艺术的形式把領袖們的狹隘与落后的許多思想加上一层外衣，并且把他們的工作用浪漫的、歌功頌德的笔調加以描写而已。这就被利用来作为官方对于思想控制和有必要对艺术本身进行审查的借口。

这种控制所采取的形式，在各共产党国家里，也彼此不同，由党及官僚檢查制起，一直到通常的意識形态的影响为止。

例如，南斯拉夫就从未有过檢查的制度。它用这样的方法来間接施行控制。在出版业，艺术家协会，定期刊物，报紙等方面，党員把任何认为"可疑的"东西，提交有关当局。从这种气氛里所产生的就是檢查或事实上的自我檢查。即使党員們可以貫彻他們的某些主張，但因为他們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样必須进行自我檢查，所以他們必須伪装自己的言行并且說些毫无价值的

吞吞吐吐的話。但这个現象却被当为进步，当为"社会主义的民主"，而不当为官僚专制。

不管是在苏联也好，或在其他共产党国家也好，檢查制度之存在还不能免除創作的艺术家們进行自我檢查。知識分子們为他們的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实际情况所迫，不得不进行自我檢查。自我檢查，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实际就是党在施行意識形态控制时的一种主要方式。在中世紀时，人們一定先要探究一下教会对他們工作的想法；而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情形也一样，人們必須首先想像政府需要那一种工作，或是先去探一探領袖們的口味如何。

檢查，或自我檢查，都被說成是一种"意識形态的帮助"。同样的，共产主义里的每一件事都被說成致力于实現絕对幸福。因此，許多名詞如"人民"，"劳动人民"，以及其他类似的名詞，虽然含义很模糊，也常常被引用到艺术方面。

不管是什么，如迫害，禁止，将形式与观念强加于人，屈辱，侮謾；又如，像那些半文盲的官僚們所加于天才們的学究式权威；这一切都是在代表人民或为人民的名义下进行着的。甚至在名詞的运用上，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現实主义"与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也无什么不同。有一位名叫辛科的祖籍匈牙利的南斯拉夫的作家，曾經把两种独裁制度下所謂"艺术"的理論家的話，作过一次有趣的比較：

> 苏联的理論家铁木非也夫在他那部《文学理論》里写着："文学是一种意識形态，它帮助人們熟悉生活，帮助他认識他本身是在参加生活。"
>
> 而《国家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要义》上宣称："一个艺术家不可能仅是一个艺术家而已，他也永远是一个教育家。"
>
> 希特勒青年团的領袖錫拉黑（Baldur von Schirach）

却如此說："每一件眞的艺术品适用于全体人民。"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員会政治局的委員日丹諾夫說过："任何有創造性的东西都是为大家所可了解的。"

而在上述《文化政策的要义》里，舒尔茲（Wolfgang Schulz）說："国社党的政策，甚至它那被称之为文化政策的部分，都是由領袖自己或由其所授权的人們来加以决定的。"

假如我們要了解，国社党的文化政策到底如何，我們必須研究这些人物，研究他們为了教育他們的負責同僚，他們做了些什么和他們曾經发出些什么指示。

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雅罗斯拉夫斯基曾經說过："斯大林同志給艺术家們以灵感，給他們以指导的思想……而苏共中央委員会的决議以及日丹諾夫的报告給予苏联作家們一套完整的工作程序表。"

凡是专制政治，即使是相互反对的制度，总是用同样的方法为自己辯护；他們甚至免不了用同样的字句来辯护。

六

作为一个以科学名义仇視思想的敌人，作为一个以民主名义反对自由的敌人，共产党的寡头集团所能完成的，不过是人类心灵之完全腐化而已。資本家巨头或封建貴族，常常依照自己的能力及願望，来供养艺术家及科学家，因而既帮助了他們，却也腐化了他們。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腐化是国家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般說来，共产主义制度就是窒息并压制任何它自己不同意的求知活动；那也就是說，窒息并压制一切深刻的及富于創造

性的东西。而在另一方面，凡是它以为有利于"社会主义"也即共产主义制度本身的东西，它都要加以奖励，而实际上也就是以收买的方法去腐化。

即使不談如"斯大林奖金"之类的，隐蔽而激烈的收买手段，利用个人与当权者之間的联系，高級官僚們的濫肆要求与收买等等——这一切都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极端的情形——事实还是存在的，就是說这个制度本身确实使知識分子，特别是艺术家腐化。政府的直接奖金也許可以廢除，也好像檢查制度是可以廢除一样，但它那种腐化及压制的精神却依然保留着。

这种精神，是由党官僚壟断物质及心灵所建立和刺激起来的。知識分子們走头无路，不管为了思想或为了利益，他們都只有向当权者靠攏。纵使这个权力并不直接掌握在政府的手里，它也还是渗透到所有的机关和組織的。說到最后，一切决定都是由它作的。

对于艺术家来說，虽然他的社会地位也許不会因此而引起什么变更，但限制及集权主义的实施总以愈少愈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艺术家在南斯拉夫工作和生活，比在苏联要容易得多了。

一个遭受压迫的心灵不得不被迫腐化。假如一个人要想知道，为什么二十五年来，在苏联并沒有产生任何有意义的作品，特别是在文学方面，那末，他将发現，比起政府的压制来，腐化及收买政策对于作品稀少的影响，还要更大一点。

共产主义制度迫害、猜疑，以及刺激那些具有創造性的人們，使他們不得不从事自我批評。它給那些阿諛的人們以各种富有吸引力的"工作条件"与濫用的荣誉或头衔，奖金，别墅，休假中心，购物优待，汽车，大使級地位，宣傳鼓动的保护，以及"寬宏大量的干預"。因此，在原則上，它是偏爱那些无才的，寄生

的以及缺乏发明能力的人物。同时，可以理解，許多偉大的思想家都已失去了他們的方向，信心以及力量。自杀，失望，纵酒，淫蕩以及内心力量与人格完整之丧失等等都是因为艺术家被迫不得不对自己以及对他人說謊的緣故——所有这一切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最常見的現象，都可以在那些眞正願意从事創作、而且也具有創作能力的人們身上发現。

七

通常以为共产党的独裁是在实行一种野蛮的阶級歧視。这个說法不是完全准确的。从历史过程来看，当革命松懈的时候，阶級歧視随之衰退，而意識形态的歧視却反而增加。目前有一个錯觉，即是无产阶級已經当权，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同样的，以为共产党之迫害什么人，全因为他是一个資产阶級，这看法也不对。固然共产党的政策确是在极严厉地对付旧統治阶級的分子，特别是資产阶級分子。不过，凡是投降了的，改变了方向的資产阶級分子也能得到报酬优厚的位置与照顧。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秘密警察可以在他們里面物色到能干的密探，而新政权掌握者则可以找到他們能干的僕人。只有那些在意識形态上不贊成共产党的措施和观点的人們才会遭到懲处，并不考虑到他們的阶級，或他們对資本家財产的国有化政策的态度。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对于那些与統治的寡头集团不同的民主与社会主义思想的迫害，比起对于以前旧政权最反动的信徒的迫害，却要更严厉，更完全得多。这是可以了解的；因为后者所具有的危險較小，他們只向往于过去，而过去則很少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当共产党人取得政权时，他們对于私有財产权的攻击造成

一种錯觉，以为他們的措施主要是为了工人阶級的利益来反对有产阶級。后来許多事件却证明他們的各种措施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是为了建立他們自己的所有权。所以，共产党自己所有权的建立这件事，必須主要在意識形态的歧視方面，而不是在阶級歧視方面，加以表現出来。反之，如果这个看法不对，如果共产党确也为劳动大众眞正所有权的建立而奋斗，那末，阶級歧視确是应該流行下去的。

既然意識形态的歧視流行是事实，那末初看上去，就应該得出一个結論，这就是一个新的宗教教派已經出现。这个教派坚持着它自己的唯物主义及无神論教条，而且把它們强加于人。共产党做得确也像一个宗教的教派，虽然事实上他們并不是。

这种极权主义的意識形态不止是某种政府形式和所有权形式造成的結果。意識形态本身这方面也誠然为这些政府及所有权形式的产生帮了忙，而且也在用一切方法去支持它們。意識形态上的歧視是共产主义制度继續存在的一个先决条件。

如果以为其他各种歧視——如种族，等級，以及民族——都比意識形态的歧視还要坏，那就看錯了。这些歧視在表面上似乎更野蛮一点，它們却并沒有那么細致，那么完全。它們的目标只是在于各种社会活动，而意識形态歧視則以整个社会为目标，而且以每一个人为目标。其他类型的歧視可以在物质上粉碎人类，而意識形态則对准人类的命根加以打击，这个命根或許是为人类所特有的。对于思想之专制統治，是最完全与最殘酷的专制統治形式。任何其他种类的专制統治則以思想专制統治始，以思想专制統治終。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意識形态的歧視，一方面它是以禁止其他不同的思想为目的，而另一方面，以把自己的思想武断地强加于人为目的。这两种形式都是最惊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极权

专制形式。

思想本来是一个最富創造性的力量。它揭开了新的事物。人們如果不思想或不考慮，他們就既不能生活下去，也不能生产。虽然共产党人口头上可能否认这个眞理，但他們却不得不被迫在实际上接受它。这样一来，他們就使得除了他們自己的思想之外，其他任何思想都不可能得势。

一个人可以放棄很多的东西。但他却必須思想，而且具有把他的思想表示出来的深切需要。当有表現需要的时候而被迫保持緘默，这是非常令人难受的。专制統治最恶劣的表現就是在于它强迫人們不要像平常那样去思想，强迫人們表达不是他們自己的思想。

思想自由的限制不仅是对于某些特定政治及社会权利攻击而已，而且它是对于人类本身的一种攻击。不过，人类对于思想自由不可磨灭的願望却永远是可以在具体形式下表示出来的。假使这些願望，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还沒有明显表示出来的話，那也絕非說它們就不存在。今天它們存在于那些暗中的消极抵抗之中，存在于人民还沒有成形的希望之中。看上去好像是，由于压制的全面性，它已把全国各阶层之間的差別都抹去了，它把所有要求思想自由和一般性自由的人們都团結起来了。

历史也許可以原諒共产党所犯的許多罪过，并承认他們有时确是被迫采取許多殘暴的行为的，由于环境的关系或是由于保卫他們本身存在的关系。不过，共产党对于各种不同思想的窒息，以及为了保护他們自己私人利益对思想所采取的专横的壟断，这些罪行，将把共产党人釘在历史上耻辱的十字架上。

第七章 目的与手段

一

一切的革命与一切的革命者，都充分使用强迫的、不顾是非的手段。

但是，以前的革命者不像共产党人那样明白自己是在使用不顾是非的手段。他們也不像共产党人那样通权达变。

"对付运动中的敌人，你可以不擇手段。……你不但要懲治叛逆，也要懲治那些冷淡的人；你必須处罰一切在共和国里不积极的人，一切不替共和国效力的人。"

圣鞠斯特（Saint-Just）的这一番話，也可能出諸今日某些共产党領袖之口。但圣鞠斯特是在法国大革命激烈时讲这番話的，是为了維护大革命的命运。而共产党人却經常讲这种話，并依照这种話而行动——由他們开始搞革命直至攫得全部政权，始終如此，甚至在他們衰敗时也还是如此。

共产党人的手段虽在应用范圍、持續时間、与严酷程度上都超过了其他革命者所运用的任何手段，但在革命期間共产党人通常并不使用敌方所用的一切方法。纵使共产党人在革命期間使用的方法或許不太殘忍，可是，他們离革命越远，他們所用的方法也就越不人道。

正如每一場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一样，共产主义所使用的手段首先必須适合于共产党內当权集团的利益和他們的相互关系。其他一切考虑，包括道德上的在內，全是次要的。

在本章內，我們只談当代共产主义所使用的手段，这些手段

可以依情况的不同，有时溫和，有时严峻，有时合乎人道，有时不人道；但和别的政治运动与社会运动所用的手段是有差别的。共产主义所运用的手段并使共产主义和其他运动——无論是革命的或非革命的运动——迥然不同。

不同之处，并非在于共产党的手段或許是有史以来最殘暴的手段这个事实。殘暴固然是共产党的手段的最显著特性，但还不是最根本的特性。一場运动旣抱定目的要用专制手段来变革經济制度与社会制度，自然非靠残暴方法不可。但其他一切革命运动也不得不使用或打算使用同样的方法。可是，这些革命运动中的专制时期比較短，这一事实就足以說明它們不可能使用共产党所使用的全部残暴手段。而且，它們的压迫也不能像共产党人那么全面，因为，它們施行压迫时的情况就不准許他們把压迫施行得像共产党人那样全面。

共产党人虽缺乏倫理的或道德的原則，但若以这个事实为理由来說明共产党人的不擇手段，就更加說不通。除了他們是共产党人这一点与他人不同外，他們也是和其他一切人一样；其他的人在彼此关系上是受人类社会习以为常的道德原則約束的，共产党人也是如此。共产党人彼此間缺乏倫理，并不是他們所以使用那一套手段的原因，而是使用那一套手段的結果。共产党人无論在原則上或言詞上都贊成倫理观念与人道方法。他們相信自己是“暫时”被迫采用一些違背自己倫理見解的手段。他們也想到：如果自己不曾被迫采取違背自己倫理見解的行动，一定要好得多。除了他們以更长久而丑恶的方式背离人道外，在倫理观点上他們和别的政治运动的参与者并无很大的差别。

当代共产主义和其他运动在使用手段上之所以有差别，还有許多别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地是数量上的，或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以及共产党人的目的所造成的。

但当代共产主义有一項主要特征，它使共产主义所用的方法和别的政治运动所用方法迴然不同。驟然看去，这特征似和过去某些教会的特征相彷佛。它溯源于共产主义者要用一切手段以求促进其理想主义的目的。等到目的变为无法实現时，手段也就越来越粗暴。即使是为了达到理想主义的目的，他們所用的手段也是不能用任何道德原則来辯解的。誰运用了那一套手段，誰就是横行不法、残虐不仁的弄权者。以前的阶級、党派与所有权的形式虽不再存在或已无能为力，但手段并无根本改变。事实上，这些手段在目前正淋漓尽致地发揮其残暴性。

这个新的剝削阶級爬上政权的宝座后，打算抬出它的理想主义的目的来替非理想主义的手段作辯护。斯大林建設他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时，所用手段的残暴达于极点。由于这个新阶級必須表現得好像它的利益就是整个社会的唯一而理想的目的，由于它必須保持知識方面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壟断，这个新阶級必須宣称它所使用的手段是不重要的。它的代言人喊叫道：目的才是重要的，其他一切都算不得什么。重要的是我們現在"有了"社会主义。共产党人就这么替专制、卑鄙与罪恶作了辯解。

当然，目的必須由特殊的工具——共产党——来保证。党就成了一种居于統治地位的妄自尊大的东西，就像中世紀的教会一样。这里且引凡尔登名誉主教第擂克·馮·尼亨(Dietrich Von Nieheim)在1411年所写的一段話：

"当教会的存在遭到威胁时，它就不受道德律的約束了。以統一为目的，可使一切手段——无論其为不忠、背信、专制、买卖圣职、监禁或置人于死地——都变成了正当的行为。因为每一項圣职都是为了全社会的目的而存在的，个人必須为总善而牺牲。"

这一番話听来也好像是当代某些共产党人的口气。

在当代共产主义的教条主义中，有很多东西是封建的、盲信的。然而我們既不是生活于中世紀，当代共产主义也不是一个教会。当代共产主义强調意識形态上的与其他方面的壟断，这不过使它自己頗像中世紀的教会；两者的本质是各異的。教会只享有部分的所有权与統治权；充其量，它曾想通过对于心灵的絕对控制来使一个既定的社会制度永存不灭。教会曾迫害異教徒，甚至只是为了教条上的理由，在实际上并无直接的需要。但据教会宣称，这种迫害是想毁灭異教徒的身体，借此来挽救他們罪恶的、異端的灵魂。为了进入天国，一切世俗的手段都被认为是可取的。

而共产党人却首先要求实质上的或者說国家的权威。至于为了教条上的理由而实施思想上的箝制与迫害，不过是为了加强国家权力而作的輔助性举动。共产主义不同于教会，它不是制度的支持者，它是制度的化身。

这个新阶級并非突然兴起的，而是由一个革命的集团发展为一个掌握所有权的反动的集团。它所使用的手段似乎前后相同，实质上也已由革命的手段变成了暴虐的手段，由保护性手段变为专制的手段。

共产党人的手段在实质上是非道德的与不讲是非的，甚至它在形式上特别峻刻时也是如此。由于共产党的統治是十足极权主义的，它不容多擇手段。这种"不容多擇手段"的境况是共产党人所无法廢棄的根本情况，因为共产党人要保持絕对权力与他們自私的利益。

共产党人必須——即令他們并不想如此——身兼二职：既是所有权者又是暴君，且必須为着这一目的而运用許多手段。尽管共产党人可能具有巧妙的理論或良好的傾向，但制度的本身

非驅使他們去运用一切手段不可。只要遇有紧急情况，共产党人总是以道德的及智識的維护者自居，同时又是用尽一切可用之手段的实际家。

二

共产党人大談其"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新人"以及諸如此类的概念，仿佛自己在談着一些較高的倫理上的范疇。这些迷迷糊糊的概念只有一种实际的意义——团結共产党員并抗御外来的影响。但若当作实在的倫理范疇看，这些概念根本不存在。

既然不能出現特殊的共产主义的倫理或什么"社会主义人"，于是共产党人自己所培养出的划分等級的風气、特殊的道德概念与其他概念就更为强有力地发展开了。这些不是絕对的原則，而是一些隨时在变化的道德标准，深植在共产党阶級森严的制度中，居高位者（上层圈子）可以任意做一切事情，但同样的事若是下級人員（下层圈子）做了，就要受到处罰。

这种可变的、不完备的划分等級的風气和道德，已經历过漫长而多样的发展过程，甚至往往刺激这个新阶級作进一步的发展。这一发展的結果是替各个不同的等級产生了各自特有的一套道德标准，所有这些道德标准都服从于寡头政治的实际需要。这些等級性倫理的形成大体上是和这个新阶級的兴起相一致的；它的形成也就是这个新阶級对人道的真正倫理标准的摒棄。

以上各命題需要詳尽的說明。

像共产主义的其他各个方面一样，等級道德也是由革命道德发展出来的。起初，这种道德虽是一个孤立的运动的一部分，但共产党人宣称它比任何别的派别或阶級的道德更为合乎人

道。可是共产主义运动在开始时总像是一种具有最高的理想主义，并能作最无私的牺牲的运动，吸引全国最有才能的、最勇敢的人，甚至最卓越的知識分子，到它的行列里来。

这一項說明，正如本章中所提出的其他大部份說明一样，是指那些共产主义絕大部分是由于本国的情况而发展起来并获得了充分权力的国家（俄国、南斯拉夫与中国）。但把这項說明稍作修改后，也可以适用于其他国家里的共产主义。

无論在那里，共产主义开头总是一种对于美丽的理想社会的願望。因此，它吸引着鼓舞着具有高度道德水平以及其他方面出类拔萃的人們。但由于共产主义又是一种国际性的运动，它就像向日葵朝着太阳一般地傾向于运动的力量最强大的地方——至今为止主要是苏联。結果，即令是在别的国家里并未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也丧失了它們开头时所具有的特性，而取得了弄权的共产主义的特性。因此，西方各国以及其他地方的共产党領袖，都习慣于像苏联的共产党人一样，满不在乎地玩弄眞理与倫理原则了。每个地方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开头时也都有高尙的道德特性，个别的人員可能保持这些特性更为长久，而当共产党的領袖們采取非道德的行动和一意孤行的轉向时，上述高尙的道德特性便会引起危机。

有史以来，像共产主义这样的运动并不很多。它开始进行时有那种崇高的道德原则，它的斗士都忠貞、热誠而能干；他們相依为命，不只由于志同道合，甘苦与共，并且由于无私的爱、友誼、团結一致，以及只有在不成功即成仁的战斗中才会产生的那种战友們的溫暖与赤誠。彼此协力合作，同德同心；甚至以最大努力达到相同的思想感情；通过全心全意献身于党和工人集体以寻求个人乐趣并建立各自人格；为他人而热誠地牺牲自己；敬老扶幼；……这一切都是运动剛起头时或运动仍名副其实时眞

正的共产主义者的理想。

女共产党員也不仅是一个同志或战友。我們决不可忘記，她在加入这个运动的时候已經决定牺牲一切——爱情与母性的乐趣。在这运动里培养出一种男女之間的純洁、朴实而又溫暖的关系；本着这种关系，同志間的关切已成为不分性别的爱。忠誠、互助、連最秘密的心事也坦白表露出来——这些通常都是眞正的、理想的共产主义者的理想。

但只有当共产主义运动还年青、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果实时才眞是这个样子。

通向这些理想的道路是非常遙远而崎嶇的。共产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运动是由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与中心形成的。內部的純一不是一朝一夕之間达到的，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集团与宗派的猛烈斗爭才达到的。如果情况順利，获胜的那一个集团或宗派就是最了解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集团，在它接收权力的当时，也是最讲道德的。經过进德危机，經过政治阴謀与阿諛逢迎、互相誹謗、无緣无故的仇恨与野蛮的冲突，經过放蕩淫乱与心智墮落，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就緩慢了。在这个过程中，它摧毀了許多集团与个人，丢棄了不必要的东西，鍛炼出它自己的核心与教条、道德与心理、气氛以及工作态度。

当共产主义运动及其追随者眞正地革命时，他們曾一度达到了本章所描述的崇高道德标准。在这段时期內，共产主义的言与行是很难划分的，更精确地說，这时候居于領导地位的、最重要的、最眞实的、理想的共产党人誠摯地相信他們的理想，并渴望把这些理想在他們的工作方法与他們个人的生活中实現。这段时期，是在夺取政权的战斗的前夜；只有当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达到了这样一个独特之点时，才会有这样的阶段。

固然，这些只是一个派别的道德，但确是高标准的道德。共

产主义运动是孤立的，它常常看不到眞理，但不能說这运动就不是以眞理为其目的，也不能說它不爱眞理。

内部的德与智的融合，是为意識形态与行动的統一而作的长期斗爭的結果。沒有这种融合，眞正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简直想都不用想。若无心理、道德的統一，“思想与行动的統一”是不可能达到的。反过来也是一样。但这种心理与道德上的統一——从来不曾有什么法令規章对此作过規定，但它却自动发生，成为一种風气与自觉的习慣——其功劳比什么因素都更大，它使共产党成为一个无法摧毁的大家庭，使外人既无法理解又无法滲入这个党，使党的团結牢不可破，使全党的反应、思想与感情归于一致。这种心理与道德上的統一之存在——它不是一下子就达成的，而且若不是渴望形成它，它便不会形成——是比什么都更可靠的征象，足以說明共产主义运动已站稳脚跟，它已不是它的追随者和其他許多人所能抵抗的，它是强有力的，因为它已把整个党融为一人、一心、一体。这也就証明一个新的、純一的运动已經出現，它所面对的前途完全不是它在起头的时候所預見的那个前途了。

可是这一切，在共产党人一步步取得全部权力与所有权的过程中，慢慢地消失了，解体了，浸沒了。剩下来的只是空无所有的形式与毫无实质的仪节。

至此，在共产主义运动对反对派与非共产主义集团的斗爭中所产生的磐石般的內部团結，一变而为运动內部卑屈順从的謀士們与机器人似的官僚們的团結一致。当共产党爬上政权时，偏狭、卑躬屈膝、不完整的思考、控制个人生活——在过去，此举一度是同志般的帮助，但現在却成为寡头支配的一种方式——等級的森严与各顾私利、妇女作用的徒有其名和受到忽視、机会主义、自我中心主义以及暴行就压制了一度存在的崇高

原则。旧时存在于孤立运动中的奇異人性，慢慢轉变为特权阶級的偏狭而伪善的道德。于是，阴謀詭詐与卑躬屈膝代替了以往革命者的正直。昔日曾經准备为了别人、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一切、甚至不顾性命的英雄們，如果他們沒有被杀或被排挤失势，到了今天，他們也变成了抱着自我中心念头的懦夫，既无理想又无同志，甘願抛棄一切——道义、名誉、眞理与道德——以求苟全他在統治阶級与官僚集团里的地位。在革命前夕与革命期間，共产党人打算牺牲与受苦的英勇行徑是世上少有的。可是，在取得政权之后，他們竟一变而为庸庸碌碌的无耻之徒与干枯公式的愚蠢卫护者，却也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奇異的人性是替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力量并吸收力量的条件；而排他的、划分等級的風气以及倫理原則与品德的完全缺乏，又成了共产主义权力以及这个运动的維持的条件。道义、眞誠、牺牲、热爱眞理等一度是天經地义的东西；现在呢，处心积虑的謊言、諂媚、污蔑、欺騙与挑撥，已逐漸成为这个新阶級的黑暗、残忍与无所不包之权势的必然伴随者，甚至影响到这个阶級各个分子之間的关系。

三

誰若是不能領略共产主义发展的这一辯证过程，就不能理解所謂莫斯科大审判案，也无从懂得为何共产党人的周期性的道德危机——由于廢棄当年他們曾委身奉献的神圣原则所致——不会产生重大的意义，而普通人民或别的运动若有这种道德危机，可就不得了啦。

赫魯曉夫承认，斯大林清党大屠杀中遭殃者所作的"坦白认罪"与自我譴責，主要是靠逼供得来。他又宣称沒有对这些人

使用迷魂药，事实上却有证据证明用过此药。但逼使犯人"坦白认罪"的最有效的迷魂药，却含蘊在犯人自己构成的性格中。

一般的犯人，也即非共产党人，决不会进入神志昏迷状态，作发狂式的坦白认罪，祈求死刑作为自己有"罪"的报应。只有那些"蓋着特殊印記的人"——共产党人——才会这么做。起初，他們遭受党內最高領导秘密施予的打击与指控，其暴烈与卑鄙使他們在道德上大感震惊，他們簡直不能相信最高領导竟会这么卑鄙透頂，即使他們以前也曾偶尔发現最高領导的过錯。現在他們陡然觉得自己是被人連根拔起了；由共产党領导所代表的他們自己的阶級已背棄了他們；他們虽然是无辜的，而这个阶級却把他們当作犯人与叛徒釘上十字架。許久以前，党曾教育他們相信，而他們自己也曾宣称：他們本人每一絲每一縷都和党以及党的理想纏結在一起。現在，他們被連根拔起之后，发觉自己完全一无所有了。对于共产党这一小小宗派及其狹隘观念以外的一切，他們或許是不知道，或許早已忘記了，或許已經拋棄了。現在要他們来結交共产主义以外的事物已为时太晚。他們完全孤立了。

人是不能在社会之外孤立作战或生活的。这是人的不变的特性，亚里斯多德早已看出这种特性并加以解釋，称人为"政治的动物"。

由这样一个党派出来的人，一旦发觉自己在道德上已被摧毁与連根拔起，受到周密的殘暴的拷問，他除了用"坦白认罪"来帮忙他原屬的那个阶級与那些"同志"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他心里相信他的"坦白认罪"是那个阶級所必需的，借以抵抗"反社会主义"的反对派与"帝国主义者"。这种"坦白认罪"是被赶出党外的身敗名裂的牺牲者唯一可能作的"偉大"的"革命性"貢献。

每一名眞正的共产党人都受过教訓并以此教育自己和别

人；相信結成派系并从事派系斗爭，是对党以及党的目的所犯的絕大罪恶之一。当然，共产党若分成許多派系，就不能在革命中取胜，也不能建立党的統治地位。不惜任何代价并且不顧一切地維护統一，已成为神秘的义务；一心一意要掌握全部权力的寡头統治者們，就以这种义务为护符，来保卫他們自己。精神沮丧的共产党党內的反对者，即令曾怀疑过此事，甚至知道此事，但他仍不能摆脫这个神秘的“統一”观念的迷惑。此外，他还会想到：領袖們可能今天是某甲明天換成某乙，无論他們是罪恶的、愚蠢的、自我本位的、前后矛盾的或是好弄权势的家伙，总之都要烟消云散，只有“目的”能继續存在。这“目的”就是一切；目的不就是如此长存于党內嗎？

托洛茨基是共产党里一切反对派中的最重要人物，但他的推理并不比上文所說的更深刻多少。在自我批評的时候他曾大叫道：党是不会錯的，因为它是历史必然性和无阶級社会的化身。流放期間，他曾企图用历史上类似的往事来解釋莫斯科大审判的可怕的卑鄙，他指出皈依基督教前的罗馬，以及資本主义萌芽时的文艺复兴时期，都曾出現过背棄信义的謀杀、誹謗、撒謊以及丑恶的大規模罪行等无可避免的現象。于是他下結論說，在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时候，也一定要发生这类現象；这些都是仍存在于新社会中的旧阶級社会的殘余。但他用这种說法，什么都不能說明；他只能撫慰自己的良心，以为自己并未“背叛”“无产阶級专政”或苏維埃——即过渡到新的无阶級社会去的一个形式。假如他对这問題探討得更深一层，一定会看到：无論在共产主义或文艺复兴或其他历史时期，当一个所有权阶級为它自己开辟途徑时，当它遭遇的困难愈来愈增加，它的控制权愈来愈需要完密无缺时，道德上的考虑也就愈来愈不关紧要了。

同样的，那些不明白在共产党人取得胜利之后哪一种社会变革是眞正关鍵性的人，不得不把共产党人中各种各样的道德危机重新估价一番。对于所謂非斯大林化运动，或以前奉承斯大林的人对斯大林作无耻的、頗像斯大林方式的攻击，也不得不視为"一种道德危机"而加以重新估价。

任何独裁体制都无可避免地要发生大大小小的道德危机，因为它的追随者惯于认为政治思想的統一是最大的爱国品德与最神圣的公民义务，他們对于必然要出現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变与变化一定大为煩惱。

但共产党人却感觉并知道，在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轉变中，他們的极权主义的統治不但不会削弱，反而更会增强；这是一条无可避免的路；道德的或諸如此类的理由即使不算是碍手碍脚的东西，也只能算是次要的东西。实际的行动使他們很快就知道这一切。結果，他們的道德危机无論深刻到什么地步，很快就終結了。当然，共产党人若是想要达到他們梦寐以求的眞实目的——隐藏在理想目的下面的目的——那就只好不擇手段了。

四

共产主义在别人眼中看来是道德淪丧的，但还不能說它是脆弱的。一般說来，至今为止情况恰恰相反。形形色色的清党与"莫斯科大审判"加强了共产主义制度与斯大林的統治。无論如何，某些阶层——例如以紀德为最著名代表的知識分子——虽因此而鄙棄共产主义，并怀疑像今天这样的共产主义是否能实現他們所信仰的計划与理想；但共产主义并沒有削弱；这个新阶級变得更强、更巩固，摆脫了道德的顾虑，踏着共产主义信徒的鮮血前进。由别人眼里看来，共产主义在道德上是墮落了，但

由它自己的阶級和它对社会的控制看来，它在事实上却加强了。

要想使当代共产主义被它自己的阶級成員所鄙視，还必須具备别的条件。必須这革命不但吞噬了它自己的儿女，而且可以說是吞噬了它本身。必須参与这革命的最有头脑的人們領会到它是一个剝削阶級，它的統治是不合理的。具体地說，必須这阶級发觉在最近的将来根本談不到什么国家的消亡，什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必須这阶級承认建立这种社会的可能性是很容易給人駁倒的，正如容易給人证明一样。具备了这些条件，于是这个阶級所已經使用并正在使用以达成其目的及其統治的各項手段就成为荒謬、不人道、違背它的偉大宗旨——甚至背棄这个阶級的本身。这样一来，就会在統治阶級内部出現裂痕与动搖；而且再也无法遏止。換句話說，統治阶級为它自己的存在而作的斗爭，迫使它或它內部的各宗派摒棄現正使用的手段，或者不再认为他們的目标已經在望而且是眞实的。

在任何共产党国家中，至今还沒有发生像这里所說的純理論的假設的这种发展的希望，即使是在斯大林死后的苏联也是如此。在苏联，統治阶級仍然是一个紧密的阶級，对斯大林的手段所进行的譴責，即使是在理論上，已发展为防止苏联陷于个人独裁的暴政。赫魯曉夫在苏共二十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曾主張以“必要的恐怖政治”对付“敌人”，这和斯大林以暴政对付“优秀的共产党員”恰成对比。由此看来，赫魯曉夫并未譴責斯大林所用的手段，只是譴責把这种手段施于統治阶級高級分子。这个阶級的內部关系，自斯大林死后，似乎已有变化，这个阶級已足够坚强，能免于向它的領袖和特务机构的絕对控制投降。这个阶級和它所用的手段迄今并无多大改变，在道德的結合上还說不上內部有什么裂痕，不过，裂痕的初步征象已呈現出来了；在思想

的危机里，这种征象日益明显。但尽管如此，我們必須认識：道德解体的过程还几乎沒有开始；促成它开始的条件还几乎不存在。

寡头統治阶級既僭越了若干权利，就无法防止这些权利的碎屑落到人民手里。寡头集团若是大談共在斯大林統治下沒有权利，連共产党人也沒有权利，那么群众也会同时应声而吼道：他們也沒有权利——他們的权利更是被剝夺得一干二淨。拿破侖本是法国資产阶級的帝王，但当他的穷兵黷武以及官僚暴政使人无法忍受时，資产阶級終于反叛他。而法国人民也由此終于能得到一些利益。斯大林的手段（其中教条地假定有个"未来社会"也起了重要作用）是不会卷土重来了。但这不是說現在的寡头統治者們就会廢棄斯大林所用的全部手段，即使他們无法使用，也不是說苏联就会很快地在一夜之間变成一个法治的、民主的国家。

然而，有些事情已起了变化：統治阶級再也不能用什么只要目的好，手段一定对的理論来哄人了，甚至連它自己都哄不过去。它当然还要大談其最后目的——共产主义社会——因为若不大談这一套，就只好廢棄它自己的絕对統治了。在这种情形下，統治阶級是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每一次它采取了什么手段后，它却又不得不对使用这些手段表示譴責。一种更大的力量——害怕世上的公众輿論，害怕輿論的制裁会使它本身和它的絕对統治受伤害——将指揮这个阶級，箝住它的手。当这个阶級觉得自己已强大得足可摧毁本身的創造者或整个制度的創造者（斯大林）的迷信时，它同时也就給了它自己的理想基础以致命的打击。这个統治阶級虽保持完全的統治，但已开始廢棄并丧失它的意識形态，即使其获得政权的教条。这个阶級已开始分裂为許多宗派了。在最高层，一切都平安无事，但在最高层之下的深处，甚至在最高层分子之中，新思想、新观念已在萌芽，未

来的大風暴已在酝釀中。

由于統治阶級不得不鄙棄斯大林的手段，它将无法保存它的教条。手段在实际上是教条的表現，也是教条所依据的那种实际行动的表現。

促使斯大林的左右看出斯大林手段的危害性的，既不是善意，更不是人道，而是迫切的需要，才促使統治阶級变得較为“明理”一点。但这些寡头們为了避免使用极端殘暴的手段恰恰是撒下了对他們的目的怀疑的种子。目的一度作了使用任何手段的道德上的幌子。現在既鄙棄这种手段，这就令人怀疑到目的本身了。一旦那保証目的的手段給人揭露是有害的，那么目的的本身也就表明它永不可能实現。因为任何一个政策中的最根本事項首先便是它的手段——假定一切目的看来是好的。正如俗話所說，就連“通向地獄的路也是好意鋪成的”。

五

有史以来，还沒有过一个理想的目的是用非理想的、不人道的手段达成的，正如历史上沒有一个自由社会是由奴隶造成的一样。最能表現目的的实质及其偉大者莫过于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

假如必須要用目的来替手段开脫罪恶，那么一定是这目的在实质上有卑鄙的地方。眞正抬高目的，并使一切为目的而作的努力与牺牲有道理的，是手段，是手段的不断改进以臻于完美，合乎人道，与增进自由。

当代共产主义却連这种情况的起头之点都还未达到。它反而停步不前了，对于手段总犹豫迟疑，但对于它的目的却总是满有信心。

在历史上从沒有哪一个民主的政权——或在它存續的时候較为民主的政权——是主要地凭借对于理想目的所怀的願望而建立的。民主的或較为民主的政权都建立在看得見的、日常应用的、小的手段之上。伴着这些手段的应用，各个这种政权多少有点自动地达到了偉大的目的。另一方面，每一种暴政都企图拿它的理想的目的来替自己掩飾。但从来沒有任何一种暴政达到过偉大的目的。

絕对暴虐，或不擇手段，这是同共产主义的目标之大而无当性，甚至不現实性相一致的。

当代共产主义，利用革命手段，巳成功地破坏了一种社会形态而横暴地建立了另一种社会形态。起初，这种行动是受人类最美丽的、基本的人类理想——平等、博爱——所指导的；到了后来，共产党才以这些理想为幌子，运用一切手段，建立它的統治。

正如陀思妥也夫斯基在《奴隶》(The Possessed) 这部小說中借一个人物的口轉述书中主角习加里也夫的話：

> "……他那篇稿子写出了一桩精采的事，" 宛霍文斯基继續說道，……"社会里的每个人都监視別人，他有責任告密，出卖別人。每个人都屬于全体，全体也屬于每个人。大家都是奴隶，在奴隶身份上是一律平等的。他偶尔也会主張誹謗与謀杀，但主要的却是平等。……奴隶是必然会平等的。在历史上若沒有专制，就不会有自由与平等。……"

像这样，由于用目的来替手段辯护，目的本身就变得越来越遙远而不現实了，而手段上可怕的現实則变得越来越明显且令人无法忍受。

第八章 本　　质

一

在探討当代共产主义本质的各种理論中，从未有对于这一問題作过透辟的論述，也沒有一种理論表示如此做过。当代共产主义，是綜合历史的、經济的、政治的、意識形态的、国家的、及国际的种种原因的产物。对于共产主义的本质作任何片面分析的理論，都不可能完全正确。

当代共产主义的本质，若非在其发展过程中自行彻底暴露，局外人根本无从理解。因为共产主义的发展已进入其特殊阶段——成熟阶段，共产主义的本质才自行暴露出来，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才能自行暴露。自此以后，对共产主义的权力，所有权及意識形态的性质的显露，才成为可能。当共产主义仍在发展，且主要地仍是一种意識形态时，对其本质几乎完全无法看清。

正如其他的眞理一样，当代共产主义是許多作家、国家及运动的产品。共产主义多少随着它的发展，才逐步被透露出来。迄今为止，共产主义尚未能視为最后的定局，因其发展尚未全部完成。

在关于共产主义的大部分理論中，总有若干眞理在內。每一理論通常都能掌握共产主义的一方面，或掌握其本质的一方面。

对于当代共产主义的本质，有如下两种基本理論。

第一种理論认为当代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型的宗教。如上所述，我們认为共产主义既非一种宗教，也非一个教会，虽然事实

上这两項要素，共产主义兼而有之。

第二种理論认为共产主义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为現代工业或資本主义以及无产阶級与其需要的产物。我們曾指出这一理論也只有部份正确。当代共产主义，最初在工业发达的国家以一种社会主义的意識形态出現，而为工人群众对工业革命所遭受痛苦的一种反应。但从它在不发达地区得势后，即已完全变质，成为一个違反无产阶級大部分利益的剝削制度。

有人提出进一步的理論，认为当代共产主义是一現代型的专制主义，由若干夺得权力者所創造。由于現代經济的性质，在在需要集中性管理，因而使这种专制主义的絕对化成为可能。这种理論虽也有若干眞实性，即現代的共产主义是一現代的专制主义，必然要走向极权主义。但所有現代专制主义并非都是共产主义的变种，其极权化也沒有抵达共产主义的程度。

因此，我們不論探討哪一种理論都发現每一种理論都只能解釋共产主义的一面，或只能道出其部分眞相，而无法道出其全部的眞相。

作者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有关共产主义本质的理論也不能视为完整无缺。任何定义总有缺点的，尤其是对于复杂而变动的社会現象下定义时更是如此。

虽然如此，用最抽象的理論方法仍可能論述当代共产主义的本质，及什么是其中的最基本的因素，以及什么貫穿其一切表現与刺激其一切活动。深入了解其本质幷說明其各方面是可能的；但其本质本身早已自形暴露了。

共产主义及其本质不断地由一形态轉变为另一形态。沒有这种轉变，共产主义甚至不能存在。因而，对于这些轉变必須不断加以探討，并对已明显的事实作深一层的研究。

当代共产主义的本质是历史条件及其它特殊条件的产物。

但当共产主义强大以后，其本质的自身即变成一因素，并創造种种条件，以維持其本身継續的存在。因而，对共产主义的本质，显然必須依照在不同时期它的出現和活动所表現的形式及所处的种种条件来分別予以探討。

二

当代共产主义是現代极权主义的一种类型，这个理論，不仅流傳最广、而且也是最正确的。但对“現代极权主义”一詞的眞正了解，在討論共产主义的地方，倒不很普遍。

当代共产主义是具有三种基本要素以控制人民的一种极权主义。第一种是权力，第二是所有权，第三是意識形态。这些因素都被唯一的政党或——依照作者前面的解釋及用語——由一个新阶級所壟断。而在目前，則由該党或該阶級的寡头集团所壟断。在历史上，甚至当代历史上，从未有一种极权制度——共产主义例外——能将这些要素成功地同时并用，而控制人民到这种程度。

如探討并衡量这三項要素，則权力在共产主义的发展中，无論过去和現在，一直占有最重要地位。其它任何一种要素最后虽可能超越权力，但根据目前情势仍不能如此断定。我深信权力仍将継續成为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

共产主义起源为一种意識形态，其中含有共产主义极权的及壟断的性质。現在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共产主义对人民的控制中，这种意識形态已不再占据重要地位。共产主义作为意識形态的阶段，已大体上成为过去。共产主义能向世界表現的新事物已不多。但对于权力及所有权两种要素，就不能这样說。

在每一种斗爭中，甚至在人类每一社会行动中，可以說，不

論是物质的、知識的、或經济的权力都起作用。这一說法相当有道理。也可以說，权力，即爭取与保持权力的斗爭，是任何政策的基本問題及目标。这一說法也有相当道理。但当代共产主义不仅是这样的一种权力，而它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它是一种特殊型态的权力，在这种权力之內，集思想控制、权威及所有权于一身。而且这种权力的本身变成一种目的。

迄今为止，存在最久与发展最充分的型态苏維埃共产主义业已經历三个阶段。其它型态的共产主义也多少如此（只有中国型的还是例外，迄今仍停留于第二阶段上）。

这三个阶段是：革命的，教条的，与非教条的共产主义。大致說来，这些阶段中的基本口号、目标及代表人物是：第一阶段是革命或权力之夺取，代表人物是列宁；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或該制度的建立，代表人物为斯大林；第三阶段为"法治"或制度的稳定，代表人物为"集体領导"。

値得注意的是，这些阶段并非界限分明不可逾越，其全部要素在每一阶段中都可以发現。如教条主义之盛行，与"社会主义的建立"，在列宁时代即已开始，斯大林并未放棄革命，或反对干預建立制度的种种教条。今日，非教条的共产主义也只是有条件的非教条：他們决不会为教条的理由而舍棄絲毫的实际利益。正因为这些利益，它同时可以对絲毫有怀疑教条的眞实性与純洁性的人予以无情的迫害。因此，由实际需要与能力为出发点的共产主义，今天虽已卷起革命或自己的軍事扩張的風帆，但却未曾舍棄其中的任何一項。

这种将共产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的作法，只有粗略的及抽象的来看，才算是正确的。截然分开的阶段事实上并不存在，而这三个阶段也未能与各国某一特殊时期的情形完全吻合。

各阶段間的界綫常彼此重叠，且在各不同的共产党国家中，其出現的形态也互異。如南斯拉夫經过这三个阶段的时間比較短促，而且其最高阶层的代表人物也未曾更易；但在理論与运用的方法上，这种差别均极明显。

在全部三个阶段中，权力始終占一重要地位。在革命阶段，固然必需攫取权力；在建立社会主义阶段，也需利用权力来建立一新制度；而今天，則需要权力来保持这一制度。

从第一至第三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共产主义的眞髓——权力——也由手段变为自身的目的。实际上权力虽多少是一种目的，但共产党的領袖們，认为只有通过权力这一手段，他們才能达到理想的目的，而不肯承认权力的本身即为目的。正因为权力被作为使社会轉变为烏托邦的一种手段，因而就无法避免使其本身成为一种目的，并成为共产主义最重要的目的。在第一及第二阶段中，权力可能被視为一种手段，但到了第三阶段，权力是共产主义眞正的主要目的与本质这一事实，即无法再掩盖。

因为事实上共产主义不再是一种意識形态，它就必須保持权力以为控制人民的主要手段。

在革命中，正如在每一种战爭中一样，为了使战爭获胜，自然首先需要集中权力。进入工业化时期后，为了建立工业或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必須作許多牺牲，因而集中权力也被視为理所当然。但当这一切完成后，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权力即显然地已不仅是一种手段而且已变成目的，假如不是唯一的，也是主要的目的。

在目前，权力旣是共产党人的手段，也是他們的目的，以維持其各种特权及所有权。但由于这种权力与所有权都是特殊形式，只有借权力才能行使所有权。权力本身即为一种目的，也是

当代共产主义的本质。共它阶級可能不借权力的壟断以維持共所有权，或不借所有权的壟断以維持共权力。但迄今为止，由共产主义所形成的新阶級并不能如此，即使在将来也极少有这一可能。

在所有这三个阶段中，权力始終被掩藏起来，成为隐蔽的，不可見的，不提及的，自然的，和主要的目的。其地位之强弱視当时需要控制人民的程度而定。在第一阶段中，思想是夺取政权的鼓舞者及原动力；到第二阶段，权力作为对社会的鞭策，也为維持其自身而被行使；今天，“集体所有制”从屬于权力的冲动与需要之下。

权力成为当代共产主义彻头彻尾的化身，甚至共产主义要力图阻止这种傾向也不可能。

思想，哲学原則，道德考虑，国家，人民，历史，甚至一部分的所有权都可以改变或牺牲；唯有权力决不能如此。如果改变或牺牲权力，无異使共产主义舍棄其自身及其本质，个人可以如此，而阶級，党及寡头集团决不能如此。这就是它存在的目的与意义。

任何形态的权力，除作为手段外，同时即为其目的——至少对渴望权力者是如此。权力几乎是共产主义唯一的目标，因为这是一切特权的源泉与保证。凭借权力与通过权力的行使，統治阶級在物质上的特权与对全国財物的所有权，才能实現。权力决定思想的价值，并禁止或容許其表現。

由于这种原因，当代共产主义的权力与其它形态的权力不同，而共产主义与其他制度也有区别。

正因为权力是共产主义最主要的成份，因而共产主义必須是极权的，排它的与孤立的。如果共产主义真有其他的目的，則应使其它的力量有起来反对及独立行动的可能。

对当代共产主义应如何下定义是次要問題。每一个从事解释共产主义的人，均会面临如何給共产主义下定义的問題，即使实际情形并不强求其如此——在实际上，共产党人常将其制度，美其名为"社会主义"，"无阶級社会"，"人类永恒梦想的实現"等等，而反对的人，則視共产主义为无人性的暴政，恐怖集团的僥幸成功，与人类的浩劫。

在科学中，为简单說明起見，常利用某一已有的范疇来說明某一事物。但假如我們为省事起見，究竟应将当代的共产主义归入社会学的那一范疇？

近年以来，作者曾将共产主义与国家資本主义，或更确切的說，与极权国家資本主义相提并論。許多著作家，虽由其它立場出发，但見解大致相同。

在南斯拉夫与苏联政府决裂期間，这种見解为南共領袖們所采納。但由于共产党人，根据实际需要，极易改变他們甚至"科学的"分析，因而当南斯拉夫与苏联政府"和解"以后，南共領袖們又改变其見解，再度宣称苏联是一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他們宣称苏联对南斯拉夫的独立作帝国主义式的攻击是——照铁托的說法——一种"悲剧"和"不可思議"的事情，是由于"若干个人的专断"而引起的。

当代共产主义，絕大部分与极权国家資本主义相似。其历史淵源及所应解决的問題——如类似資本主义所完成的工业化变革，但借助于国家的机构——足以导致这样的結論。

假如在共产主义下，国家是眞正代表社会和民族的所有者，則控制社会的政治权力的形态必須随社会及国家不同的需要而变化。国家在性质上是社会中統一而和諧的机构，而不只是一个控制社会的力量。国家不能同时兼具所有者与統治者两层身份。但实际上在共产主义下，其情形正相反。国家是一种工具，

永远只服从独一无二的所有者的利益，或在經济及社会生活的共它領域中，也只是服从于同一方針。

西方的国家所有权，看起来比共产党国家更近似国家資本主义。将当代共产主义作为国家資本主义的說法，是由那些从共产主义制度迷津中醒悟过来的人，本于“良心上的痛苦”所提出；但由于他們无法为共产主义下定义，因而将其一切流弊与資本主义的弊害等量齐观。因为在共产主义之下，事实上已无私人所有权，而只有形式上的国家所有权，那末将一切弊端归諸于国家，似乎沒有比此更合邏輯。这个国家資本主义的观点也为那些认为私人資本“弊害較少”者所接受。所以他們喜欢指出共产主义是一种最坏的資本主义。

将当代共产主义視为某种事物的过渡之說法，事实上等于并未解釋共产主义。試問共它制度又有那种不是某些事物的过渡？

即使我們承认当代共产主义含有一种无所不包的国家資本主义的許多特点，共产主义仍有其本身的許多特点，因而认为它是一种特殊型态的新的社会制度，是更为恰当的。

当代共产主义有其自己的本质，不容与共它任何制度相混淆。共产主义虽然吸收共它制度的許多因素——封建的，資本主义的甚至奴隶所有制的——但同时它仍保持共个别的和独特的本质。

第九章　民族共产主义

一

在本质上，各国共产主义都是一样的；但在各个国家，表現的程度与方式却有所不同。所以我們可以說有各种共产主义制度，也可以說那只是一个制度的不同形式。

这种存在于共产主义国家之間的不同，最主要的是各国历史背景不同的結果，斯大林曾想用武力来消灭这不同，但徒劳无功。例如，就甚至最肤淺的观察也可以告訴我們，現今苏联的官僚制度与沙皇制度不是沒有連带关系的，如恩格斯所說，沙皇制度下的官吏們是个"特殊阶級"。这种情形，在南斯拉夫的政府中，也可以說大体相同。共产党既在不同的国家內得势，他們便面临不同的文化与技术水平，及不同的社会关系，并面临各国不同的知識分子。这种不同更有不同的特殊发展。因为共产党的得势，其一般原因大抵相同，又因他們要对共同的內外敌人从事斗爭，所以各国的共产党人，立即不得不联合奋斗，并且采取同一的意識形态作为根据。像共产主义的其他一切一样，一度曾是革命家的事业的国际共产主义，后来竟轉变为共产党官僚的共同地盘，而各自站在国家的立場上互相斗爭。过去的国际无产阶級，因此成了空話与空洞的教条。在这些官僚的背后，只有防卫得很好的赤裸裸的国家与国际的利益、个人的野心，以及各国共产党寡头們的計划。

权力与财产的性质，相同的世界观以及一致的意識形态，不免使各共产党国家看来彼此相同。但若把各共产党国家在程度

与方式上的不同一笔抹煞，或者认为不足重視，那却錯了。共产主义实現的程度、形式，或其目的正是每个共产党国家的一个特定条件，其意义完全与共产主义本质相等。所以不論任何类型的共产主义，不管它和其他形式如何彼此相同，都不免是民族共产主义。他为了保全自己必須适应国情。

在所有共产党国家中，政府与財产的形式，像其思想一样，很少不同，或者根本沒有不同。因为它具有相同的性质——极权——所以不会有多大的不同。但是他們希望获胜幷継續存在，那末各国共产党人就得使其权力在程度和方式上，适应各个国家的条件。

因此，各共产党国家不同的程度，大抵与各国共产党在取得权力的过程中所表現的独立程度相等。具体說来，只有苏联，中国及南斯拉夫三国的共产党人是独立地完成革命的，也就是說以自己的方式与速度取得政权，而开始"社会主义建設"的。这三个国家都是独立的共产党国家，甚至当南斯拉夫处于苏联最强烈的影响之下时——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即在所謂"兄弟的爱"与"永恒的友誼"的籠罩下，仍保其独立。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議中，据赫魯曉夫的报告透露，斯大林与中国政府之間好容易才避免冲突。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冲突，幷非孤立事件，不过是最为严重而首先发生而已。对于其他共产党国家，苏联則用"武装的教士"——軍队——强迫推行共产主义。在这些国家中，其发展方式和程度上的不同尙未达到南斯拉夫与中国的阶段。但是这些国家的統治官僚，一旦集合力量变成独立的集团，幷且一旦他們知道服从与抄襲苏联的結果将削弱自己，他們便想努力"效法"南斯拉夫，即謀独立发展。我們知道东欧各共产党国家之所以成为苏联附庸，幷不是因为由此可以得利，而是因为力量太弱小、无法阻止。所以只要他們一旦勢力强大，或

者創造了有利的条件，他們就会提出迫切要求，謀求独立，借以保护“他們自己的人民”免受苏联的支配。

共产主义革命旣在一国取得胜利，一个新阶級就起而当权。他們尽管是将其“利益”附屬于他国的同一阶級，却不甘以其辛苦获得的“特权”仅因意識形态上的一致，而让与他人。

那些以自己力量取得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必然要走上单独的特殊发展的道路。与其他共产党国家，尤其与最重要而最富有帝国主义性的苏联之間的分裂，便接着发生。在革命得胜国家中的統治官僚集团，早已在武裝斗爭中有了独立地位，并且早已尝到了权力在握与財产“国有化”的甜味。就哲学意义来說，他們已了解到、察觉到自身的本质，“自己的国家”与自己的权力，而以此为根据要求平等了。

但这并不是說这牵涉到一場冲突只发生在两个官僚組織之間。冲突还涉及臣屬国家中的革命分子，因为他們通常并不願意遭受支配，他們认为，共产党国家之間的关系，应当如教条中所述的那样十全十美。同时，一国的群众，他們生来渴望独立，也不能对此种冲突坐視而无动于衷。总之，这对国家是有利的：从此可以不納貢于外国政府；本国政府不再希望也不准抄襲外国方法，因此政府所受的压力也就变小了。这类冲突也引入外国的势力，引起其他情况和运动。但是冲突的性质与其基本势力，是一直不变的。在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之間，不論是紛爭以前，紛爭期間或紛爭以后，他們都不改变原来的态度。眞的，他們借以保障壟断权力的不同程度与方式的共产主义，使他們彼此都否认对方陣地中存在社会主义。到他們把紛爭解决以后，又再互相承认对方的国家內存在社会主义，并感到倘若要保存那些在本质上一致、并对彼此都极重要的东西，那末，彼此的差別是应該互相尊重的。

东欧共产党附庸国家的政府能够、并且事实上必須声明它們摆脱苏联而独立。无人可以断言，这种独立的要求将发展到何种程度，也无法断言将产生什么样的不和，其結果有賴于許多不可預知的国内外形势。但各国共产党的官僚集团势必要求有更完全的权力，那是不容怀疑的。这可由斯大林时代东欧国家反铁托过程来证明；这还可以由波兰与匈牙利最近尖銳地出現和流行的坦然强調“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来证明。这是苏联中央政府所最感困难的，因为甚至它自己在苏維埃各共和国內所設立的政府中，如烏克兰、高加索，都有民族主义存在；而那些在东欧各国所設立的政府中則更为强烈。苏联之所以現在不能，将来也不能，在經济上将东欧国家加以同化，是民族主义在所有这些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种民族独立的要求不消說必然具有很大的动力。只有以外面的压力，或者以共产党人方面对“帝国主义”与“資产阶級”的畏惧可加以阻止或压服，但决不能根本消除。反之，它們的力量将继續增长。

今后各共产党国家間的关系将采取何种形式，我們不能預言。尽管不同的共产党国家間的合作能在短时期內彼此合并或組成联邦，而彼此間的冲突仍可能造成战爭。苏联与南斯拉夫間的公开武装冲突之所以不致发生，并不是由于彼此都是“社会主义”，而是由于斯大林沒有兴趣去冒一場不可預卜規模大小的冲突的險。共产党国家間将来不論发生什么情况，仍須視寻常影响政治事件的所有那些因素而定。以“民族的”或“統一的”形式出現的各国共产党官僚的利益，和以国家为基础的有增无已的独立趋向，目前将对共产党国家間的关系发生重大作用。

二

民族共产主义的观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終結时才有意义。因为当时的苏联帝国主义，不但表現于对資本主义国家，并且对共产党国家也是如此。到苏联与南斯拉夫发生冲突，这一观念才显得突出。赫魯曉夫与布尔加宁的提出“集体領导”以否定斯大林的方法，也許可以緩和苏联与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关系，不过却不能解决問題。因为苏联的行动，不仅与共产主义有关，同时还与大俄罗斯——苏維埃——国家的帝国主义有关。这一帝国主义可以改变其形式与手段，但它却不能消失，这比其他共产党国家要求独立的願望还难消失。

其他共产党国家有同样的趋向。他們也企图根据他們的力量与条件，用各种方法变成帝国主义。

在苏联外交政策的发展上就有两个帝国主义阶段。初期的政策，几乎完全是通过在其他国家的革命宣傳，而扩張其势力。那时在最高級領袖的政策上，即有强烈的帝国主义傾向，如对于高加索的政策。但我以为，把这一革命阶段絕对地看作是帝国主义阶段，并沒有充分理由，因为当时是防卫重于侵略。

倘若我們不把革命阶段的政策看作帝国主义阶段，那末大体說来，苏联帝国主义的开始，当在斯大林胜利时期，即起始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工业化与新阶級的权力确立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这一变化已明白显出，当时斯大林政府已能有所行动，而放棄了和平主义和反帝国主义阶段的政策。并且，这还可以在外交政策的轉变中看出来，如以不讲是非和冷酷的莫洛托夫代替活潑風趣而相当有原则的李維諾夫，便是明证。

这种帝国主义政策的基本原因，完全隐藏于新阶級的剝削

与专制的性质中。为了这一阶級本身可以显出它有帝国主义性质，它有必要达到一定的力量，而在适当的时机有所表現。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苏联已具有此种力量，而战爭又使帝国主义的兼并有充分发揮的机会。例如波罗的海各小国，对于像苏联这样的大国的安全幷无必要，在現代战爭中尤其如此。这些小国也无力从事侵略，且曾为苏联的盟国；但是对于大俄罗斯共产党官僚貪得无厌的食欲来說，它們却是一口肥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一直是苏联外交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到大战时，它却与統治苏联的官僚利益发生了冲突。因此，共产国际的組織就失去了必要。共产国际的眞正解散虽是在大战的第二阶段与西方国家結成同盟的时候，但根据李米特洛夫的說法，这个念头早在波罗的海各国被征服后、与希特勒合作的时期就有了。

由东欧与法国和意大利各国的共产党組成的共产党情报局，本是在斯大林的倡議下建立的，共目的在于保障苏联在附庸国的控制力，幷加强共在西歐的势力。过去的共产国际，虽由莫斯科絕对控制，但至少在形式上还代表所有的共产党。所以共产党情报局比过去的共产国际更坏。共产党情报局是在苏联的眞正而明显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与南斯拉夫的冲突显出情报局是用来使那些因国內民族共产主义的成长而开始衰弱的共产党国家及共产党听命于苏联政府的。斯大林死后，共产党情报局終于解散了。甚至苏联想避免重大而危險的爭論，接受了所謂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立道路，纵然不說这就是民族共产主义。

这种組織的变化大有其深远的經济与政治的原因。因为东欧的共产党势力薄弱，而苏联的經济力量又不够强大，所以苏联政府要想降服东欧各国，就不得不用行政的方法；纵令沒有斯大林的横暴与专制，也是必須如此。苏联帝国主义必須以政治、警

察及軍事的方法，来弥补其經济上与其他方面的弱点。軍事形式的帝国主义只是比旧式沙皇軍事封建帝国主义更先进的一个阶段，这与苏联的內部机构也是相称的，苏联的內部机构就是以集大权于一人的警察与行政机构起主要作用。斯大林主义就是个人的共产党独裁与軍事帝国主义的混合物。

苏联帝国主义的形式发展为下列几种：設立股份公司，以政治压力使物价低于世界市場，从而吸收东欧各国的出口貨，形成人为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場"，对附庸国家与附庸党派的一切政治行动加以控制；把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祖国"傳統的爱轉变为对苏維埃国家、斯大林、及苏維埃措施的膜拜。

但是結果怎样呢？

苏联統治阶級內部因此完成了一个变化。就另一意义說，东欧各国也有同样的变化；新的民族官僚集团旣渴望能日益巩固其权力与財产关系，但同时由于苏联政府强霸的压力，他們已陷入困难。他們初时虽为了取得权力而否认民族特性，但是現在要想使其权力更有发展，这一行动却反成了阻碍。此外，在苏联政府方面，已不可能继續施行过度和危險的斯大林主义的武力鎮压与孤立的外交政策；同时在这普遍的殖民地运动的时期，也不可能使欧洲各国处于耻辱的奴役之下。

南斯拉夫的領袖們曾被苏联領袖們誣栽为希特勒党徒及美国間諜，那只是因为他們要保卫其依据自己的道路以建立并巩固共产主义制度的权利；但是，經过了长期的搖摆不定的爭論，苏联領袖們不得不表示让步。于是鉄托变成了当代共产主义中最重要的人物。民族共产主义的原則現在正式受到了承认。但是，正因为如此，南斯拉夫也不再是共产主义革新的唯一創始者。南斯拉夫的革命現在消沉了，从此开始和平而常規的統治。但它与昨天的敌人并沒有更亲密，并且两者間的爭論也未終止。这

只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如今，苏联的帝国主义政策已进入了以經济与政治为毛的阶段。这可由当前的事实看出来。

現在，民族共产主义已是共产主义的普遍現象。所有共产主义运动——除了苏联的共产主义运动是民族共产主义的反对目标——在不同程度上都受民族共产主义的支配。在以前，即斯大林得势的时候，苏联的共产主义也是民族共产主义。当时俄国共产主义，除了把国际主义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外，已放棄国际主义。現在，苏联的共产主义却不得不承认共产主义中的新現实，纵或它的承认并不十分明确。

因为內部的变化，苏联帝国主义也不得不改变其对外面世界的态度。过去对东欧各国，着重在政治上的控制，現在逐漸进而謀求經济上結合成一体。这一政策是通过重要經济部門的共同計划去完成的，当地的共产党政府因为自感內在外在力量都还薄弱，所以多对此自动表示贊同。

但是，因为其中含有基本的矛盾，这样的情形到底不能維持长久。一方面，共产主义的民族形式日趋强大；而在另一方面，苏联帝国主义却并未削弱。現在苏联政府与东欧各国、包括南斯拉夫在內的政府，正以协議与合作的方法来設法解决那些影响他們本质的相互間問題，即謀求保存权力与財产所有权的既定形式。但即使在財产所有权方面可能采取合作，在权力方面却不可能如此。虽然进一步与苏联一体化的条件已具备，但使东欧共产党各国政府走向独立的那些条件却发展更快。苏联既未放棄它在这些国家里的权威，而这些国家的政府也并未放棄其要想达到类似南斯拉夫的独立的要求。至于能独立到什么程度，那就要看国际与国內力量的情形了。

过去苏联对于共产主义的民族形式曾切齒反对，現在的表

示承认自含有巨大意义，同时对于苏联帝国主义也藏有重大的危机。

这项行动包含某种程度的討論自由；这也就是意識形态的独立。当前共产主义中若干異端的命运，不仅是倚靠莫斯科的寬容，还得要靠他們自己国家的潜力。在“志願的”与“意識形态的”基础上要求保持自己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影响，而与莫斯科分离的趋向到底不是可以遏阻的。

現在莫斯科本身就已不是往日的莫斯科了。他失去了对新思想的壟断权，也沒有規定唯一可行的“路綫”的道义上的权利。自从否定了斯大林后，它就不再是共产主义世界意識形态的中心了。如今，莫斯科的偉大共产主义帝国，及其偉大思想的时代已告終結，現在是平庸的共产党官僚統治的开始。

“集体領导”想不到在共产主义内外有許多的困难及失败。那末怎么办呢？斯大林帝国主义是太危險了，更糟的是竟无效能。在斯大林統治下，不仅人民，甚至共产党人也表不满，而且这是在国际局势十分紧張的时候发生的。

共产主义思想的世界中心現已不再存在了，并且处于全部解体的过程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統一受到不可救葯的損害，竟毫无挽救的可能。但是，就像从斯大林独裁轉变到“集体領导”并未改变苏联制度本身的性质一样，民族共产主义虽然增加了离开莫斯科而获得自由的可能，却也不能改变其本质；这种本质便是思想的完全控制与壟断，以及由共产党官僚之专享所有权。誠然，压迫已有緩和，对于財产的壟断也采取較慢的步驟，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但是民族共产主义仍不想，也不能改变成共产主义以外的制度，并且还有一种势力自动地拉它去接近其发源地的苏联。民族共产主义的命运是不可能同那些跟它联系在一起的其他共产党国家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分开的。

共产主义之作适应各个国家特定情况的修正，对于苏联帝国主义，尤其是斯大林时代的帝国主义，是一大危害；但对整个共产主义或其本质来說，却幷不然。相反地，在共产主义得势的地方，这种变化能够影响其方向，甚至加强其势力，使它能为外面所接受。总之，民族共产主义是与非教条主义一致的，那就是說，是与共产主义发展中之反斯大林主义阶段一致的。事实上，民族共产主义是这个阶段的基本形式。

三

民族共产主义幷不能改变各国之間当前国际关系及工人运动的性质。但它在这些关系中的作用可能有很大的意义。例如，作为民族共产主义的一种形式的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对于苏联帝国主义的削弱以及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主义的失势，都有过非常重大的作用。要求改变的动机，如正发生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尤其可在各国本身找到。首先是在南斯拉夫以南斯拉夫的方式出現；也是最先在这里完成改变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以民族共产主义的形式与斯大林相冲突，实际上这是在共产主义的发展中斯大林死后的新阶段的发端。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对于共产主义本身的改变有很大的影响，但对于国际关系或非共产主义的工人运动却不曾有根本影响。

有人以为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将能向民主社会主义发展，或能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間的桥梁，那是沒有根据的。对于这一問題，在南斯拉夫的領袖中間意見就不一致。当苏联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的时期，他們很希望能与社会民主党人亲善。但是到了1956年与莫斯科握手言和的时期，铁托宣布共产党情报局和社会党国际都不必要，虽然社会党国际在共产党

情报局猛烈攻击南斯拉夫时曾为南斯拉夫作无私地辯护。南斯拉夫的領袖們一味实行所謂积极共处政策（这項政策大体与他們当时的利益相符合），于是他們便宣称这两个組織，即共产党情报局与社会党国际都“偏于极端”，只因为那是两个集团的产物。

南斯拉夫的領袖們不仅将其願望与現实混为一事，并且也把一时的利益与深远的历史性的及社会主义的分歧混在一起。

无論如何，共产党情报局是斯大林为建立东欧軍事集团而产生的。而社会党国际活动多在西欧国家組織中，其与西方集团或大西洋公約有連带关系，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纵无西方集团，社会党国际也是存在的。社会党国际主要是发达的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組織，在这些国家里有政治民主和类似的各种关系。

軍事的联盟与集团只是暫时的現象，但西方的社会主义与东方的共产主义却是比較长久而基本的趋向。

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截然不同，这不仅是在原则上不同的結果（这方面无关紧要），而且是两个适相反对的經济及知識力量的結果。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倫敦开会的时候，馬尔托夫与列宁間的冲突所涉及的有关于党員資格的問題，有关于中央集权的多少与党的紀律問題；杜次溪（Deutscher）正确地称它为历史上最大分裂的开始，其意义的重大实非当时創議人所能預料。自此以后，不仅形成了两种运动，还形成了两个社会制度。

除非两种运动的性质或造成两者之間不同的条件能够有所改变，则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分裂是无法縫合的。半世紀来，两者之間虽也有一时的和个别的妥协，但大体說来，他們的不同只有增加，他們的性质只有更趋独特。今日的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已不止是两个运动，且是两个世界了。

脫离莫斯科的民族共产主义，虽然可使这个裂痕較为和緩而不趋于恶化，但要縫合却不可能。例如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的合作，只是表面而非眞实，只有客气而无誠意，所以两方面都不能获得切实重要的結果。

为了完全不同的理由，甚至西方与亚洲的社会民主党間也不能联合一致。他們在本质上，原則上，都无多大的不同；所不同者是在实踐方面。为了国家的立場，亚洲的社会党仍然得与西欧的社会党分立。即使西欧社会党人也反对殖民主义（虽然他們幷未居于領导地位），只因他們屬于发达的国家，他們总是对不发达国家維持剝削者的立場。亚洲社会民主党与西方社会民主党的不同，可說是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社会主义运动队伍中的不同。它們彼此之間的具体形式必須严格划分，但就今日所能推断的說，它們在本质上的接近是明显而必然的。

四

与南斯拉夫类似的民族共产主义，其在非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中，是能有重大国际意义的。幷且，其意义的重大也許竟超过眞正执政的共产党。最主要的例如法国与意大利的共产党，就有这种情形，因为两国的共产党在工人阶級中占有极大多数；再加上在亚洲的几个共产党，于是它們就成了非共产主义世界中仅有的几个意义重大的共产党。

但直到現在，民族共产主义在这些共产党中尚未显出重大的意义与影响。然而，这是不可避免的。最后，它們必將使这些共产党发生深远而根本的变化。

这些共产党必須与社会民主党人竞爭，因为后者能通过他們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口号与活动，去打动不滿的群众跟他們走。

这不是非共产主义世界中共产党終于脫离莫斯科的唯一原因。莫斯科及其他执政的共产党常有出于意外的倒行逆施，也許是次要的原因。这些倒行逆施的事使这些和其他沒有执政的共产党感到"良心上的危机"，因为他們常常被迫唾棄以往所贊美的一切而突然改变其路綫。无論是反对派的宣傳或行政上的压力，都不能从根本上阻止非共产主义世界中各国共产党的轉变。

这些党派所以与莫斯科分离的基本原因，可能在它們所活动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性质中找到。如果很显然——看来是可能的——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級能通过議会方式而改善其地位，并改变其社会制度本身，該阶級便将不顾它的革命傳統与其他傳統，而放棄共产主义。只有少数共产党教条主义者会把这工人离心之事淡然置之；而各該国认眞的政治領袖們就将竭力設法避免，甚至不惜削弱其对莫斯科的关系。

在这些国家中，因議会选举，曾使共产党获得了許多选票，但这却不能代表共产党的眞实力量。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滿与失望的表示。尽管現在还有許多群众坚决追随共产党領袖，但有一天他們看清楚，領袖們是在为了官僚制度、"无产阶級专政"及与莫斯科的联系，而牺牲其国家的制度与工人阶級的实际前途时，他們就会輕易离棄这些共产党領袖。

自然，这些都只是假定。但是，即在今天，这些共产党已感到处境困难了。倘若他們眞想成为議会主义的信徒，那末他們的領袖就得放棄其反議会的性质，或者改变而为民族共产主义；这样一来，由于它們既未当权，他們的党就不免发生分裂。

这些国家中的共产党領袖，他們正被迫以民族共产主义的观念与形式来作試驗。他們不得不如此做是由于下列的因素：以民主方式来改造社会与改善工人的地位的可能正日見增加；莫斯科打倒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大轉变終于破坏了意識形态中

心；受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西方正在深广而經久的社会与軍事基础上趋向統一；由于西方集团武力的增强，使得苏軍提供“兄弟援助”的机会愈来愈少；非有另一次世界大战，新的共产党革命是无可能了。同时，害怕終于会变成議会主义，害怕与莫斯科破裂，使这些領袖做不出任何眞正有意义的事。并且东西两方間日趋深刻的社会差異发生着无情的作用。因此聪明的意大利共产党領袖陶里亚蒂感到惶惑了，坚强的法国共产党領袖多列士在动摇了。党的內外生活都正开始給他們提供另一条道路。

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中强調，如今議会政治可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其用意即在便于“資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因势制宜，鼓动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作，形成“人民陣綫”。从他的言論看，由于导致共产主义加强的那些变化和世界的和平局势，他以为这类办法是切合实际的。所以他默认，在发达的国家中，共产主义的革命显然已无可能，并且，共产主义要在現形势下再事扩張，势必要冒引起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險。因此，苏联今日的政策已降为維持現状，共产主义也退化到以新方式逐漸巩固其新地位。

但在非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中，实际上已开始有危机。倘若他們改变成为民族共产主义，那就冒着放棄共本质的危險；倘若不作改变，那末就有失去其党徒拥护的危險。于是在这些共产党中，代表共产主义精神的領袖們，为了要脫出这个矛盾的困境，便只好用狡猾巧詐手段和蛮不讲理的方法。他們也許不可能阻止党的轉向与分裂；但是他們却不得不与显然导致新关系的国內外的眞正发展趋势冲突。

共产党国家以外的民族共产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棄絕共产主义本身，或使共产党解体。在今日非共产党国家中，这样的可能性正在增大，不过，显然只能采取与共产主义本身分裂的

路綫。因此，在这些共产党中的民族共产主义早晚将得到胜利，但必須艰难而迟緩地，經历不断的变动。

即令民族共产主义有意于激励共产主义与增强其性质，但在沒有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中，它实际上是侵蝕共产主义的異端外道。民族共产主义本身就是矛盾的。它的性质与苏維埃共产主义相同，但它想脫离出来，而变成自己国家的东西。实际上，民族共产主义是衰落的共产主义。

第十章 今日世界

一

为了更清楚地确定当代共产主义的国际地位，我們必須略述当前的世界情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結果，使沙皇俄国变成了新型的国家，或是說变为具有新型社会关系的国家。在国际上，美国的工业水平及速度与西欧各国的差異已加深；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这种差異变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鴻沟，以致現在只有美国的經济結构未曾有巨大的变动。

战爭不是使美国与其余世界之間造成这条鴻沟的唯一原因；这不过是加速这条鴻沟的形成而已。美国所以能迅速进步的原因，无疑地在于其国內的潜力，在于其自然与社会的条件，及其經济的性质。原来美国資本主义发展的环境与欧洲的不同，并且在欧洲資本主义开始衰落的时候，美国正在飞跃的发展。

今天这道鴻沟已达到这样的寬度：美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 6 %，但其生产的貨物与劳务却居世界总量 40%。在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美国的生产量占世界总量的3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增加到 50%。欧洲(除去苏联)的情形恰巧相反，1870 年时欧洲生产居世界产量 68%，到 1925—1929 年間，降到 42%，到1937 年更降至 34%，到 1948 年降至 25%(根据联合国的資料)。

現代工业在殖民地經济中的发展也非常重要，这使它們当

中大多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終能获得自由。

在第一次与第二次大战期間，資本主义經历一次經济危机，其程度之深，影响之大，只有那些为教条主义所支配的共产党，尤其是苏联共产党，才不承认此事实。若与十九世紀的危机相对比，1929年的大危机显示，今天的这类灾禍实足危及其社会秩序以至全部国民生活 发达的国家——首先是美国——就必須設法逐漸摆脫这危机。美国运用了各种方法，終于实行了全国規模的計划經济。这个变更，对发达的国家及其余世界，实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性，虽然在理論上并未为人們所充分认識。

在这期間，不同形式的极权主义在苏联及納粹德国之类的資本主义国家有了发展。

德国与美国不同，他不能以寻常的經济手段来解决其內部与向外扩張的問題。于是战爭与极权主义（納粹主义）成了德国壟断資本家的唯一出路，他們自願服从民族优越論的好战政党的驅使。

至于苏联的走向极权主义，我們曾經說过是有其他的原因，那便是为了它的工业改造。

可是，还有一个不甚显明的要素，这对現代世界可說是革命性的要素。这要素便是現代战爭。战爭虽不至引致眞正的革命，它却引致实质的变革。不管战后駭人的破坏是怎样，它使世界的关系及各国內部的关系都起了变化。

現代战爭的革命性质，不但表現于促进技术发明，并且最重要的，是使經济与社会結构发生了变化。在英国，第二次大战，暴露和影响了各种关系；使其达到了大規模的国有化成为不可避免的程度。在印度、緬甸及印度尼西亚，則由战爭成了独立国家。西欧的开始走向統一也是战爭的結果。并且，这使美国与苏联登峰造极，成为經济上和政治上的两大强国。

现代战争对于国民生活与人类的影响，实比以前的战争更为深远。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現代战争必是总体战。无論經济、人力以及其他方面，莫不受到牵連，因为生产的技术水平已十分提高，使国家的任何部分或經济的任何部門都不能超然局外。第二、因为同一技术的經济的及其他原因，世界已在极大的程度上成为一个整体；这里的小小变化常在那里发生反响。于是，每一現代战争都有成为世界大战的可能。

这些无形的軍事与經济的革命，其范圍与意义实非常巨大。这种革命，比靠武力所完成的更为自然；那就是說，它不用有一套意識形态和一个龐大的組織去推动。所以此类革命可以使現代世界的各种趋向納入較有秩序的軌道。

像今日的世界，由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来的，显然与前已大不相同。

人类从物质中心及宇宙間取得的原子能是最显著的特色，但这却不是新时代的唯一标志。

共产党官方关于人类前途所作的預言說，原子能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象征，正如蒸汽为工业資本主义必备的象征和动力一样。我們虽认为这是极其天眞而歪曲的理論，但另有一点却是眞实的，原子能已在各国与整个世界引起了变化。当然这些变化并不是趋向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变化，如共产党"理論家"所期望的。

原子能这一发見，并不是一国的产品，而为許多国家无数才智之士百年来的成就。原子能的不仅是科学上而且是經济上的应用也是許多国家共同努力的結果。倘若世界不是已成为一体，那末原子能的发見与应用都是不可能的。

原子能的效用首先是使世界更趋于統一。因此这就得完全摆脫一切过去沿襲下来的障碍——各种所有权关系与社会关

系，尤其是排它性的与孤立的制度与意識形态例如斯大林生前和死后的那种共产主义制度。

二

世界大势之趋向統一是我們时代的基本特征。这并不是說，世界早先沒有經由不同的道路走向統一的趋势。在十九世紀中叶，就有以世界市場把世界統一起来的趋势。这也是資本主义經济与民族战爭的时代。通过民族經济与民族战爭，那时已达到了某种世界統一。

以后由于不发达地区前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破坏，以及发达国家及其壟断企业对它們的分割，世界的統一又再进了一步。这就是在壟断資本主义、殖民征服与战爭的时期，那时，壟断企业的內部联系和利益常比国防更有决定性的作用。当时世界統一的大势大抵由壟断資本之离合集散而造成。这是比市場的統一更为高度的統一。某些国家大量輸出的資本深入、盘踞各地而支配了全世界。

今日世界統一的大势显見于其他領域；在生产的极高水平上，在現代科学上，在学术思想及其他思想上都可看到。但要統一趋势再向前进，那就不可能仍在排它的国家基础上，或者把世界分成个别而壟断的势力范圍所能办到。

走向这种新統一，即生产統一的大势，是建筑于前期成就的基础——也即市場統一与資本統一——之上的。但这些基础却与那已紧張而不适当的民族的、政府的关系，尤其是社会的关系彼此冲突。以前的統一是由民族斗爭或势力范圍的爭夺战而达成，而現今的統一则必須破坏前期的社会关系，只有这样它才能成功。

今后世界生产的調整与統一之态势如何，是用战爭抑或用和平的手段，恐怕誰都不能断言。但是这一大势的不可阻擋，那是毫无疑問的。

第一个統一方法就是战爭，这是以武力来促成統一，也就是由这一集团或那一集团来控制。但这样的結果，势必遺留下災禍、互相冲突、彼此不公的新火种。以战爭求統一的方法必然要犧牲弱者和失败者。战爭纵能建立有秩序的一定的关系，但必仍有未解决的紛爭，而加深彼此的誤解。

因为今日的世界冲突，主要是以制度的对立为基础，故其性质为一种阶級斗爭，而非民族与国家間的对立。这便是时局所以非常严重而紧張的由来。将来的战爭都将不止是政府与政府間及民族与民族間的世界大战和內战。不但战爭本身的情況令人惊惧，并且其对自由发展的影响也是非常可怖的。

以和平方法来达到世界統一，虽比較緩慢，却是唯一稳妥健全而正当的道路。

当前世界的統一将由制度的对立而达成，看来与前期統一之由（民族的）对立而获致者不同。

这并不是說現今一切的冲突只由制度的冲突而来。自然还有其他的冲突，包含以前各期的冲突在內。經由此种制度的冲突而达到世界生产統一的大势，現在已經明白地，积极地表現出来了。

但若以为世界生产的統一在最近的将来便可达到，那却不合事实。这段过程要經过一个长时期。因为这需要在經济上与其他方面居于人类領导地位的国家进行有組織的努力才能办到，何况生产的完全統一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初期的統一决不是什么最后的統一；如今世界生产的統一也不过是一种趋势，至少最发达的国家是向往生产統一的。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終結已經証明这制度对立的大势是遍及世界的。所有处于苏联势力下的国家，以及德国、朝鮮的一部分大体上都是同一制度。西方的情形也是这样。

苏联領袖对这一过程是完全了解的。我記得在1945年某一机密集会中，斯大林說道："在現代战爭中，胜利者要将其制度强加于人，这是过去战爭所沒有的。"他說这話时战爭尚未結束，同盟国間之友爱、希望及信任正达到最高峰。在1948年2月，斯大林又对我們南斯拉夫人及保加利亚人說："它們，西方国家要在西德建立起他們自己的国家，我們則要在东德建立起我們自己的国家，这是不可避免的。"

今天要对斯大林生前死后的苏联政策作一評价，这不仅是时髦的，也是相当合理的。然而这些制度并非由斯大林发明，而其继承人也与他一样对此抱有信心。所以自斯大林死后，所变更者只是苏联領袖处理不同制度間关系的方法，而不是制度本身。赫魯曉夫不也是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其"社会主义世界"、"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好像是一种特別不同的組織嗎？实际上，这不过表示其坚持制度的对立，坚持共产主义制度本身的格外排它与其独霸的統治而已。

因为西方与东方之間的斗爭主要是制度的冲突，所以必然是表現为思想斗爭的形式。其間虽然有暫时的妥协，但是思想的战爭却并不因此稍減，这不过是麻醉敌对陣营使其不觉的手法。物质、經济、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冲突愈为尖銳，使人觉得好像完全是思想的冲突。

除了共产主义与資本主义的对立外，尙有第三类国家，他們

都是刚从殖民地而得到独立的，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緬甸及阿拉伯国家等。这些国家，为了摆脱經济的隶属关系，正力謀建設独立的經济。但在他們内部夹杂着几个时期与許多制度，尤其是两个現行的制度。

这些轉变中的国家，主要是为了共自己民族的理由，他們忠实地拥护国家主权，和平，互相諒解等类似的口号。但是他們到底不能消灭两个制度的冲突。他們只能設法加以緩和。并且，他們正是两个制度的战場。所以他們的努力虽极有意义和高尚，但在今日却不能发揮决定性的作用。

这里値得注意的是两个制度各想以其自己的形式来統一世界。他們虽然都认为有世界統一的必要，但他們的立場是截然相反的。因此，今日世界統一的大势是表現于两个敌对势力的斗爭中，其斗爭之激烈为和平时期前所未聞。

如众所周知的，这一斗爭之思想与政治的表現便是西方民主主义与东方共产主义。

由于政治的民主与較高的技术及文化水平，这种漫无組織的傾向統一的趋势，在西方表現得較为强烈，同时西方还是維护政治自由与知識自由的战士。

在这些国家中，这种或那种特定的所有权制度使統一的趋向受到阻止或者得到鼓励，这要看实际情形而定。但是統一的要求是很普遍的。今日妨碍这种統一的最大阻力是壟断制度。他們依据其自己的利益而要求統一，但其所借以达成統一的是已經陈旧的方法——用划分势力范圍的形式。与之对立者，例如英国工党，也力主統一，其方法則不同。要求統一的趋势在英国也很强烈，因而促其实行国有化。此外，像美国那样也在实行更大規模的国有化，不过其方法并未变更所有权的形式，而是将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归政府掌握。倘若美国眞能使其經济完全

国有化，那末現今世界統一的趋势自将大受激励。

四

社会与人群的規律之一就是扩大生产并使之完美。这一法則已在当代的科学、技术及思想等水平上自行证明，世界生产正趋于統一。一般說来，若使人达到更高的文化与物质水平，这一趋势将更为不可抗拒。

西方要求世界統一的大势表现在經济，技术及其他需要上，并在这些因素后面，还有政治的所有权与其他力量。苏联陣营的情形是不同的。东方的共产党国家，纵然假定其并无其他理由，但因其比較落后，也不得不在經济上、思想上孤立自处，而以政治的手段来补偿其經济及其他方面的弱点。

說起来奇怪，但这却是眞实的情形：共产主义的所謂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实为世界統一的最大阻碍。因为这个新阶級的集体与全面的控制已造成了一个阻碍世界統一的孤立的政治經济制度。这个制度纵能有所变化，但极为緩慢，并且几乎完全不能与其他制度混合交流而趋向团結。它的变化只在为了增强其自身的势力。这个制度既导致一种类型的所有权、政府、及思想，它本身必然是孤立的，也势必是排它的。

即令苏联的領袖們希望統一世界的实现，但他們所想像的只能是多少与其自己相同的，而且属于他們的世界。他們虽高唱制度的和平共处，但决不是說各种制度交流混合，而是一个制度靜存于另一制度之旁，直至另一制度，即資本主义制度，归于失敗或者內部崩潰为止。

存在着两个制度間的冲突并不意味着民族的及殖民地的冲突已告終止。相反地，两个制度的基本矛盾却通过民族及殖民

地性质的冲突表現出来。例如关于苏伊士运河的斗爭，虽然幸未轉变为两个制度間的战爭，但是斗爭依然存在：这便是埃及的民族主义与碰巧以老殖民国家英、法为代表的世界貿易間之爭执

因为这些关系，所以国际生活各方面极为紧張是必然的。冷战已成了現今世界和平时期中的正常状态。冷战的形式虽已有改变并正在改变中；它时或緩和，时或紧張，但却已不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加以消除。这必須先消灭更深的东西，即把植根于現今世界，現行制度，尤其是共产主义的性质的东西加以消灭才行。今日造成局势日益紧張的冷战，其本身实为其他更深刻和早已存在的矛盾因素的产物。

我們今日所处的世界是一个不安定的世界。科学向人們揭示，这是一个令人茫然和高深莫测的世界；它又是一个面对現代战爭武器威胁，而令人震惊于宇宙毁灭将要到来的世界。

这个世界終須以某种方式改变。它不能老是这样子，一方面分裂而另一方面却不可抗拒地要求世界的統一。从这紛爭中所最后出現的世界关系，既不是理想的，也不免于爭执。但是一定比今日的世界关系好。

但是，現今制度的冲突并非表示人类将走向单一的制度。这种冲突只表示世界之更进向統一，更准确地說，即世界生产的統一，将通过制度間的冲突而达到。

世界生产統一的趋势，并不能使生产的形式到处相同，那就是說不能使所有制与政府等都趋相同。生产的統一只表示消除傳統的与人为的障碍，而使現代生产活跃和更有效率，这是說要把生产更圓满地适应于地方的，自然的，国家的，以及其他的情况。这种統一的趋势必将使世界生产潜力得到更好的調整和利用。

所以世界上沒有流行单一的制度是一件幸事。相反地，不同的制度太少实为一种不幸。尤其眞正精糕的是：不論哪种制度，都有排它的和孤立的性质。

社会单位、国家与政治制度間彼此的日趋不同，以及生产效率的日趋提高，是社会的法则之一。人們于是互相結合，与其四周的世界相适应，但在同时，却也日益个别化。

未来的世界可能日趋繁复，同时也更为統一。最当前的統一，可能是多种形式与人格的配合，而不是形式与人格的划一。至少到此时为止，共趋势是这样的。形式与人格的划一，意味奴役与停滞，而不是生产比今日更有高度自由的意义。

一个国家，倘若对于世界行程和趋向，不能有眞正的认識，那末它就得付出重大的代价。它将必然落后，結果不管其人口与兵力有多大，仍不得不与世界的統一相适应。誰也不能逃避这形势，正如过去沒有一国能够拒絕資本的进入，并經由世界市場而与其他国家发生关系一样。

这也就是今日自給自足或排它的国民經济，不管其所有权的形式或政治秩序、甚至技术的水平是怎样，必将陷于不可解决的矛盾与停頓的由来。并且，这在社会制度与思想等方面也是如此。凡是孤立的制度只能供应极低的生活；它不能解决由現代技术与現代思想所引起的問題而向前迈进。

世界的发展偶然地推翻了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理論，即一国可能建成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它使极权主义的专制政治更加增强，即加强了新剝削阶級的絕对統治。

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一国或許多国家內建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或任何其他种类的社会，而与整个世界相隔离，其結果势必造成专制与暴政的强化。并且，还使該等国家求取經济与社会进步的国民潛力大为削弱。反之，国家建設与世界上进步的

經済及民主的希望相协調，才能普遍給人民以更多的面包与自由，而貨物的分配更为公平，經済的发展也步調正常。要达到这一点的条件就是必須改变現有的財产及政治关系，特別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那些关系需要改变，因为統治阶級的壟断制度对于国家的与世界的进步，纵然不是唯一的、也是最严重的障碍。

五

因为其他的原因，世界統一的大势也影响到財产关系的变化。

政府机关在經济上日益增强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以及对所有权的掌握扩大，也可說是一种世界統一的大势。自然，这在不同的制度与国家中有不同的表現；并且，在某些地区，例如在共产党国家中，形式上的国有化制度，因其本身实隐藏着一个新阶級的壟断与极权統治，甚至竟成为世界統一的障碍。

在英国，由于工党的国有化运动，其私人所有权，更正确地說是壟断所有权，已在法律上丧失其神圣不可侵犯性。20%以上的英国生产力已經国有化。而在斯堪的納維亚半島諸国，則除了国家所有制以外，更有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形式在发展中。

政府在經济上作用的日益增强，是近来殖民地及半独立的国家的显著特色；无論該国之有社会党政府（緬甸），或議会民主政治（印度），或为軍事独裁（埃及），其政府都提供大部分投資，管制出口，掌握大部分出口資金等。政府到处都以經济改革的倡議者出現；而所謂国有化更經常地成为所有权的一种形式。

在資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美国，情形也并无不同。不仅誰都可以看到自 1929 年大危机到現在，其政府在經济上的作用日趋

增大，并且很少有人否认这种作用是势所必至。

沃克（James Blaine Walker）在其所著《美国工业史話》①（The Epic of American Industry）中强調說：“美国政府与其經济生活間关系的日益密切是二十世紀显著特征之一。”

沃克指出在1938年美国国民收入約有20%已社会化，但到1940年，这百分比至少已达到25%。政府对国民經济的系統的計划开始于罗斯福总統。同时，政府人員数目及政府业务，尤其是联邦政府的，也日趋增大。約翰逊（Johnson）与克罗斯（Kross）在其所著《美国經济的起源与发展》②（The Origins &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Economy）中，也有同样的結論。他們肯定經理机构已与所有权相分离，而政府則有如債权人，其势力大为增加。他們說：“二十世紀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的势力在經济事务上的不断增加。”

又如克拉夫（Shepard B. Clough）在其所著《美国方式》③（The American Way）中，曾列举数字以证明此种論点。如他所述，联邦政府的支出与公債，有如下表：

年份	联邦政府的支出（单位：百万美元）	公債（联邦）（单位：千美元）
1870	309.6	2,436,453
1940	8,998.1	42,967,531
1950	40,166.8	256,708,000

克拉夫在該书中所說的“經理权的革命”，是指职业的經理人員的兴起，老板們沒有了他們簡直对事业无法經营。經理人員的数目，作用与团結正在美国继續增强。現在如洛克菲勒，約

① 紐約哈普尔公司（Harper）1949年版。

② 紐約普倫提斯—霍尔公司（Prentice—Hall）1953年版。

③ 紐約克罗韦耳公司（T. Y. Crowell）1953年版。

翰·瓦納馬克尔，查尔斯·施瓦布等那样的大企业天才家，不再出現于美国了。

芬索德(Fainsod) 与戈登 (Gordon) 在所著《政府与美国經济》① (Government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中指出：政府已在經济中发挥了作用，各社会团体也想在經济生活中利用这种作用。但是，現在这里却有些主要的不同之点。上述作家所写的政府管制权力，不但出現于劳工范圍，且及于生产方面——如运輸，天然气，煤炭及石油等关系全国的經济重要部門，无不受到干涉。他們說“新的广大的变化，从公用事业的扩展与对自然資源及人力資源的保护日益关切等情况，也可明白看到。而在銀行与信貸方面，在电力以及低价房屋的供应上，公用事业尤为重要。”他們认为政府所发揮的作用，比較半世紀，甚至十年以前，远为重大。“这些发展的結果产生了一种‘混合經济’，在这种經济制度下公用事业，一部分由政府管理的私人企业，以及比較不受政府管制的私人企业全都并存。”

上述作家和其他作家都列举此种发展的面面观，同时，更指出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如社会福利、教育、及各种类似的福利都是由政府机关供給的，而政府所雇用的人員也作相对的及絕对的不断增加。

我們可以了解到，这种发展，曾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軍事需要而大为促进。但是，大战以后，却未減退，并且以大于战前的速度继續发展。这不但在民主党执政时如此，甚至在 1952 年当选总統的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政府，虽其口号为恢复私人創造力，却仍不能从根本上作任何变更。在英国的保守党政府执政时期情形也是相同的；除了鋼铁工业以外，并未能解除其他工

---

① 紐約諾頓公司 (W. W. Norton)1941年版。

业的国有化。保守党在經济上的作用，与工党政府的作用比較起来，虽然并未增加，却也未有根本的削弱。

这种政府对經济的干涉显然是久已深入人心的客观趋势所造成，自凱因斯以来，所有认真的經济学家都主張国家对經济有干涉权。現在这多少已成为遍及世界的事实。国家干涉与国家所有权实为今日經济上一种主要的因素，在有些地方且是决定性的因素。

由上所述，我們几乎可以得到这样的結論：即在东方制度下，国家起着主要作用，而在西方制度下，私人所有权或者壟断企业与公司的所有权起着主要作用；两者在事实上并无差别和根本矛盾。而且，由于私人所有权在西方的地位正日趋沒落，国家的控制力大为增加，像这样的結論似乎更有根据了。

但事实却是不然。因为其間除了制度的不同以外，国家所有权与国家在經济中所起的作用也有主要的差別。固然，国家所有权，在表面上，多少都出現于两种制度之中，但他們是两种不同的、甚至矛盾的所有权形式。这也适用于国家在經济中的作用这一点上。

沒有一个西方政府对經济的关系是像一个所有者。事实上，西方政府既不是国有財产的主人，也不是由稅收所得之款項的所有人。因为政府常有变更，所以它不能成为一个所有者。关于財产之經理与分配，他必須受議会的监督管制。在財产的分配中，政府須受各种势力的支配，所以它不是一个所有者。它所做的只是对于不屬于他的財产，代为經理与分配，不論办得好坏。

但在共产党国家中，情形却不同。政府有权經理并分配国家財产。这个新阶級，或其执行机关（党的寡头統治），便自作为所有主，并且也眞是所有主。像这种經济上的壟断，連那最反动

的資产阶級的政府也梦想不到的。

总之，西方与东方在所有权上表面的相似点实在是眞正最深的不同点，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因素。

六

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权的形式可能就是西方与苏联相冲突的主要原因了。那时候，各种壟断企业即发揮了重要得多的作用，它們不容許世界上任何一部分，特别是苏联，摆脫它們的支配。至于共产党官僚集团之成为統治阶級則只是近来的事情。

在苏联与各国的交涉上，所有权关系常是重要的因素。苏联对其特殊的所有权形式与政治关系，只要有可能，就不惜以武力来强制推行。不管它与世界各国的貿易关系发展到何种程度，它也跳不出貨物交換的圈子，这是在民族国家时代所能做到的发展。这种情形，在南斯拉夫与莫斯科决裂时期，也是如此。因为除了貨物交換以外，南斯拉夫也不能发展任何一种重要的經济合作，虽然它曾經而且依然希望能够如此。所以該国的經济还是孤立的。

此外还有使此种情形与关系更加复杂的因素。纵令西方对世界生产統一的大势加强，这并不能說有助于不发达国家；事实上，这不过更加强一国——美国——的，或者至多是数国的优势而已。

因为正由于交換的关系，不发达国家的經济与国民生活受到剝削，而被迫臣服于发达的国家。这就是說，在不发达国家，倘若想生存，那就必須以政治手段把自己关閉起来借以自卫。这是一法。另一办法便是接受发达国家的外援。此外沒有第三

条路。直到現在仅有第二条路正在开始，援助的数量还很小。

今日美国工人与印度尼西亚工人彼此間的悬殊，实比美国工人与美国的富有股东之間的更大。根据联合国的資料，在1949年，美国居民每人平均所得至少是一千四百四十美元，但印度尼西亚工人则不过是共五十三分之一，即二十七美元。并且大家公认，在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之間，物质及其他方面的悬殊并未减少，相反地，却有增加。

西方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間的不平等主要表現在經济方面。由总督与地方貴族实行的傳統的政治統治已成过去。現在，政治虽然独立而經济尚未发达的国家，其民族政府通常是他国的附庸。

今日誰也不願接受这种隶屬关系，正如誰也不願放棄那由扩大后的生产力所能得到的利益一样。如要美国的或西欧的工人（且不必說所有主），自願放棄由高度技术与更多的生产工作所得到的利益，固是不可思議的事；正如要劝告貧困的亚洲人民，說他們应該乐于接受如此微小的工作报酬，同样是不可思議的。

政府間的互助和各国人民間經济及其他不平等的逐漸消除，必須由需要而产生，以期成为善意的种籽。

目前，經济的援助大抵只給予那些购买力与生产力都很低、已变成发达国家的負担的不发达国家。今日两个制度的冲突，对于眞正經济援助的扩展是主要的障碍。这不仅由于巨大經费用于軍事一类的用途；也由于当今的各种关系仍是生产发展与統一大势的阻力，結果，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以及发达国家本身的进步都受到阻碍。

在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間物质的与其他的差異，也表現于他們的国內生活上。有人以为西方的民主只是表現富有国

家共同对貧弱民族的劫掠，这說法是完全不正确的；西方国家，远在其取得殖民地超額利潤以前，早已是民主的，虽则当时民主水平比今日的低。西方国家今日的民主与馬克思和列宁生时的民主之間唯一的联系，是在于两个时期間的继續发展。过去的民主与現在的民主之間的相似点，比起自由的或壟断的資本主义与現代的国家主义之間的相似点来，当不会大好多。

英国社会主义者比万（Aneurin Bevan）在其所著《免于恐惧》(In Place of Fear)中說道：

"我們必須把自由主义的用意与其成就分别清楚。自由主义的用意是贏得权力，借以实行工业革命所造成的財产的新形式。但其成就則使人們，不論其有无財产，都贏得了政治权力。①

"……以历史的眼光看来，在普选制度之下，議会民主的作用实在于将財富特权暴露于人民之前而受其攻击。这是指向財产权力心臟的一把劍。議会便是爭論之比武場。"②

比万的观察适用于英国。也可普遍适用于其他西方国家，但却只能以西方为限。

在西方，使世界走向統一的經济手段占主要地位。在东方，共产党方面，占主要地位以使世界統一的却是政治手段。苏联只能以征服的方式来达到"統一"。由此点看来，連新政权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任何事物。依照苏联的观念，被压迫的民族只是指那些被其他国家政府，而不是苏联政府，所加以統治的民族。苏联政府之所以不惜援助它們，甚至貸款給它們，无非为它的政治需要。

苏联經济尙未达到足以促进世界生产的統一的程度。苏联的矛盾与困难大多来自内部。纵与外界脫离，其制度本身尙能

---

① 西蒙与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公司，紐約1952年版，第9頁。

② 同上，第6頁。

存在。这虽費很大的代价，但其成功是靠普遍使用武力。这样的情形自不能持久，总有一天到达极限。到了那天，这将是政治官僚集团或新阶級的无限制专政之終結的开始。

当今共产主义最多不过能用政治手段——用国内的民主化和对外面世界更求接近——来达到世界統一的目的。然而，这还是十分遙远的事情。这是否眞有其可能呢？

共产主义对其本身和外面世界的认識到底是怎样的呢？

在壟断时代，經过列宁修正的馬克思主义，对沙皇俄国及同类各国所处的内外关系的观察，一度相当正确。得到这认識的鼓励，列宁所領导的运动終于战胜。在斯大林时代，这同一意識形态，又經过一番修正，它对于这个新国家在国际关系上的地位和任务的推断也近于实际，相当正确。当时的苏維埃国家或新阶級的內外地位甚为优越，一切可以如願以偿。

但是今日的苏联領袖們却不容易这样来自謀安排了。他們不再能看到当今世界的现实。他們所看到的世界不是眞实存在的世界。它只是一个在过去曾經存在的，或者是他們想当然存在的世界。

因为死抱着陈腐的教条，所以共产党領袖們以为其余的世界将停止不动，而在冲突斗爭中自趋毁灭。但这却未曾发生。西方在經济上与知識上都进步了。他們在受到另一制度威胁的危險时，确实联合起来了。殖民地被解放了，但幷沒有变成共产党国家，也不因获得自由而与其旧日的宗主国断絕关系。

西方資本主义将經过經济危机与战爭而崩潰的情况幷沒有发生。1949年时，維辛斯基以苏联領导的名义，在联合国中預言美国与資本主义的一个新的經济大危机就要开始了。但是适得其反。这幷不是由于資本主义之好或坏，而是由于苏联領袖們所指責的資本主义已不再存在了。苏联領袖們看不到印度、阿拉

伯国家与其他类似的国家已获得独立，直至他們为自己的利益而证实其外交政策上苏联观点的时候才恍然大悟。苏联領袖們根本不曾知道而至今也不懂社会民主主义。他們只知拿那衡量过在共本国决斗場中社会民主党人命运的尺度，来衡量社会民主主义。苏联領袖們的思想是基于这一事实，即他們本国并未像社会民主党人所預見的那样发展，因而他們論断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既不合实际而又"大逆不道"。

至于談到他們对于基本冲突——两个制度間的冲突或生产統一的基本趋势——的估計也是如此。在这儿他們的估計又不准了。

他們认为这种冲突是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一种斗爭。一个当然是他們自己的制度，他們說在那里已沒有阶級，或者阶級已在消灭的过程中，并且說他們的制度是国家所有制。另一个是外国的制度，他們力言在那里有激烈的阶級斗爭与經济危机，由于所有的物資都屬于个人私有，并且力言那里的政府只是一小撮貪婪的壟断資本家的工具。因为他們对世界的观察如此，所以他們相信倘若西方上述种种关系能够不起支配作用，那末今日的冲突便可避免。

困难就出在这里了。

纵或如共产党之意，西方沒有上述种种关系的支配，冲突还是要継續不止的。也許这样一来，冲突还更要严重。因为不但所有权的形式势将不同；还有彼此間的不同的、相反的願望問題。而在这些願望的后面还站着現代的技术与所有各国重大的利益，以致各团体、各党派、各阶級都想依据其自己的需要来解决同一問題。

当苏联領袖认为西方国家是壟断資本家之盲目的工具时，其錯誤正如說他們自己的制度是无阶級的社会、而那里所有权

都属于社会一样。诚然，垄断企业在西方国家的政治上居于重要的地位，但今日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同，甚至可說已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同，壟断企业的地位完全变了，也沒有以前那样的重要了。因为在背景上已出現一些新的更为主要的东西；这就是趋向世界統一的不可抵抗的願望。現在，通过国家主义与国有化政策，即通过政府在經济中的作用，这种願望表現得更为强烈，超过了过去由壟断企业的势力和行动所表現者。

如果到了这种地步，有一个阶級、一个政党或一个領袖完全阻塞批評，或掌握絕对权力，那末他对現实的判断必然陷入不切实际，自負而虛伪的境地。

这就是今日共产党領袖們的情形。他們不能控制其自身的行为，却被現实所支配。这样倒有些好处，他們現在比过去成为更实际的人物。但是，这样也有不利的地方，因为这些領袖們根本缺乏現实的甚至近乎現实的見解。所以他們得花更多的时間为自己辯护不接受現实而攻击現实，却費很少时間設法去适应現实。他們只知依据陈腐的教条来作无意义的行动，到了經过較成熟的考虑，他們时常抱着流血的脑袋退却。我們希望这种情形能在他們之間多多出現。誠然，倘若共产党人对世界作实际的解釋，尽管他們会失败，但是他們将得到收获，而成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一部分。

无論如何，世界总要变的，并且将依照其向来行进和继續行进的方向走向更多的統一、进步与自由。現实的力量与生命的力量比任何暴力更为强大，比任何理論更为真实。